

# 比较

NO.6, 2011

57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楼继伟**

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

**雅诺什·科尔奈**

·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理论研究

**国际经济政策和改革委员会**

反思中央银行业务

**斯蒂文·平卡斯 詹姆斯·罗宾逊**

光荣革命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迈克尔·波尔多 安吉拉·瑞迪什 休·罗科夫**

为什么加拿大多年来没有发生银行危机

**小约翰·科菲**

评级改革：好的、坏的和丑恶的

**许宪春**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 关于短缺和过剩的市场理论研究

---

雅诺什·科尔奈

### 1. 导论<sup>①</sup>

#### 直观印象

打开英文版维基百科有关“短缺经济”（shortage economy）的网页，你会看到一张 1980 年代的照片，人们在波兰的一家食品商店门外排起长队。<sup>②</sup> 而今天在波兰购物的人看到的则是琳琅满目的货架、来自国内外的品种繁多的商品。

---

\* 本文自英文版翻译而来。原作为匈牙利文（Hiánygazdaság – Többletgazdaság），收录于作者的研究文集《对资本主义的思考》（Gondolatok a kapitalizmusról），由布达佩斯的 Akadémiai Kiadó 出版。

① 本文是对作者以前的一篇论文的修改和完善：Közgazdasági Szemle（Kornai, 2010b）。感谢几位同行的帮助，特别是 Atila Chikán 和 Zsolt Mátysz 在数据收集和问题整理方面的工作。还要感谢诸多同行的宝贵意见：Daniel Brooks, Zsuzsa Dániel, János Gács, Dóra Györfly, Mária Lackó, Aladár Madarász, Zsolt Mátysz, Ágnes Nagy, Éva Palócz, András Prékopa, András Simonovits, Domokos Szász 和 István János Tóth。特别感谢英文译者 Brian McLean 一贯的出色工作。我高度评价几位亲密同事在信息、数据和文献搜集以及文章编辑上给予的细致合作，他们是 Rita Fancsovits, Ildikó Magyar, Andrea Reményi 和 Katalin Szécsi。感谢布达佩斯学院提供的思考环境和有效支持，让我克服了写作中的若干困难。

② 参见 Wikipedia（2010）。

1999年我到中国访问，以迎接我的《短缺经济学》第二版的出版。该书的编辑和几位熟悉其内容的学生带我到百货商场和食品店参观，其中一位提醒说，“现在您应该写一本新书，讨论过剩经济，而不再是短缺经济”。

我不会真的去写这么一本书，但我希望在一篇论文的框架内，把有关过剩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勾勒出来。其核心思想可以表述如下：正如短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典型特征那样，过剩经济（surplus economy）恰恰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标志。<sup>①</sup>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研究工作始于“分析前的认知过程”（pre-analytical cognitive act），即为分析工作准备原始材料。他称其为洞察力，洞察力可以带来对事物的新认识（Schumpeter, 1954, 第41~42页）。我相信，这种分析前的洞察力包含在好奇心中，研究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经济学家就是带着这样的好奇心来仰视资本主义市场上的丰富供给。我认为，直观印象非常重要。或许正是通过把资本主义与另外一种经济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对立面）进行对比，让我获得了某些特别的认识，而那些习惯于生活在资本主义中的经济学家同行们则没有注意到，也未能将他们从传统观点中解放出来。

和我讨论这一议题的主流经济学家通常只赞同我的部分看法。他们很容易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短缺经济，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又为什么应该被称为“过剩经济”呢？商店和工厂仓库里肯定有额外的存货，产能也往往有富余，但这些过剩是必需的。生产商会生产那么多产品，贸易商会囤积那样多存货，是因为市场均衡的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并不处于均衡状态，而资本主义经济是均衡的。虽然存在上下波动（目前的波动幅度就很大），但均衡毕竟是长期趋势。

我们之间仅仅是词汇上的口舌之争吗？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市场均衡，是否等于我说的过剩经济？两者是否没有本质区别？那样的话，我应该就此停笔，因为名称本身并不值得争论。

虽然他们看到的和我看到的是同一现象，但双方理解的含义却不相同，这是因为观点的差异。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现实表现——大量闲置的产能、丰富充实的货架和四处寻觅工作的劳动力——我给出的是全然不同的解释。每

---

<sup>①</sup> 我很犹豫是否采用这一表达方式。在英语中，除了“surplus”一词外，我还考虑过其他词汇，如 plenty、glut 和 slack 等。“surplus”似乎最适合这里描述的现象。

个生产商或贸易商都在独立进行决策，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确定具体的存货和产能储备水平，但如果把商店里所有待出售商品和产能储备可能生产的所有产品加起来，将大大超出全社会可能购买的全部商品的数量。宏观经济学家可能认为，总就业量是已接近自然就业率的水平，可很多人依然感觉找不到工作，如果他们能够参与就业，社会的产出水平也会得到改善。

如果我的看法正确，资本主义制度的确是过剩经济，那将具有重大意义。它会影响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模式，会给资本主义的许多特征带来新的认识。从这个角度讲，本文的分析可能有助于更全面地从实证的角度去理解资本主义。<sup>①</sup>

此外，我还会得出一些规范角度的结论。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产能过剩、存货增长或过度供给感到不安，将这些资源视为浪费。但我认为，过剩经济虽然也有几方面的有害副作用，却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优越性之一。

## 为澄清概念所做的初步尝试

人们对科学研究的要求是，采用具有明确定义的概念，推导出一系列论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供给”和“需求”这样的基本概念没有什么异议，萨缪尔森著名的经济学教材的早期版本曾在其中一章引用过如下箴言：“你甚至可以把鸚鵡训练成政治经济学家，它只要学会两个词汇就行：供给和需求”[Samuelson, 1980 (1948), 第52页]。然而这两个概念却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惑，微观经济学中的其他几个标准概念也同样如此。只有在对我探讨的现象进行大致描述之后，才能对这些概念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得出完整的概念体系。我将分两个阶段来完成上述工作，在导言中对有关概念的解释并不十分严格，我知道大多数读者会按照通常的含义来理解这些概念，与我打算介绍的内容有差别。因此，这里首先对下列概念做些解释。

• 我所说的“过剩”大致等于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所说的“过度供给”，也就是代表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

---

<sup>①</sup> 这里使用的“实证”(positive)一词是科学哲学上的概念，强调对现实的客观描述和解释，与“规范”(normative)研究相反。

• 我所说的“过剩经济”，如果必须用标准化的术语来描述，我希望称其为“过度供给经济”。与之对应的“短缺经济”，则是“过度需求经济”。前者是一种普遍存在过度供给现象的市场状态，后者是一种普遍存在过度需求现象的市场状态。

在做完上述这些解释之后，我希望已与经济学家读者们建立起了正确的沟通，让大家能够跟上我的论述思路。在下文继续解释自己的理论时，我还将对有关概念以及它们涉及的测算问题给出更精确的定义。

## 本文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位置

本文的每句话恐怕都有前人的成果为基础。经济学的各个学派都有很多言论涉及市场问题，自我感觉最好的是主流经济学家：他们毫不怀疑现有的概念框架和局部现象分析背后的理论基础，在教科书和研究文献中将其视为既定的前提。

本文的研究可以视为挑战：在某些重要问题上，我提出了与主流学派不同的观点和思考方法。但遗憾的是，我不能简单地加入某个现成的、与主流学派有根本或部分差别的“异端”学派，在他们现有的理论架构上填上一笔，也不能直接沿用他们的术语。

不过我并不感到孤独。尽管我的整体思考框架是源自独创，但其中很多重要元素却来自前人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我的主张与主流经济学中的法则一致或相似，在其他一些要点上，则与这个或那个非主流学派存在联系。我会很高兴地在恰当的地方指出这些借鉴和共识之处。

本文的写作有几方面的诱因。首先，目前仍未平息的经济危机促使所有负责任的经济学家反躬自省，我们必须搞清楚用于分析经济运动的工具是否合适。对我本人而言还有其他几个动机。50多年前，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经济管理中的过分中央集权化》（*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Kornai, 1957）时，我开始认识到，长期存在的短缺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我后来的著述中，有关短缺、过剩、均衡和非均衡等问题也频繁出现例如<sup>①</sup>。这方面的议题看来将伴随我一生的思考。不过，本文的论

---

<sup>①</sup> *Anti-Equilibrium, Economics of Shortage, The Socialist System* (Kornai, 1971, 1980, 1992).

述并不仅仅是重提我过去的思想。这个议题仍在继续，而我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在此期间却有了成长。我希望自己的分析工具在不断更新和打磨之后已有所进步，我希望看到，这篇文章重塑了我早期的分析框架，其构造更加精细，某些观点得以修正，许多细节被彻底地重新加工。

我早年的研究主要是关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运转，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主要作为其对立面进行比较研究。如今的研究重心有了转移，主要是分析资本主义。本文不但试图开发新的分析工具，而且在分析对象上超越了以前的作品。<sup>①</sup> 我将试图把半圆形的作品完善，把缺失的部分用曲线补充上。<sup>②</sup> 我希望说服自己（或许也包括读者），本文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也能够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 研究对象及其结构

这里讨论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仅仅是出于对比的需要，才会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内容。<sup>③</sup>

现代资本主义通常是一种混合经济：既有私人所有制和市场机制调节的领域，也包含相当数量的公有制和官僚机构调节的活动。

本文的前五章主要讨论市场领域的问题，第6章讨论非市场领域的问题。

研究仅限于产品和服务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也就是实体经济部分，没有详细论述货币经济的部分，即金融业、货币交易、信贷和金融资产投资等，也不涉及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本文对这方面的问题仅会点到为止。

我承认，在讨论产品、服务和劳动力市场时，完全忽略金融产业（如货币、信贷、利率、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及其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依然决定对二者予以明确区分。本文的写作篇幅有限，并不是要撰写一本有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巨著。

---

① 本文提到了我以前的很多著述及其内容，读者们却未必完全清楚。因此我会试图进行简要介绍，以便读者能够跟进。我还必须指出，《社会主义体制》（*The Socialist System*, Kornai, 1993）一书将有助于对本文的理解，目前的研究可以视为其后续。

② 不幸的是，某些关键的部分仍缺失。下一节将会强调，本文未涉及货币领域的问题，对市场运转的解释是不完整的。

③ 我在本文要表述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内容，都包含在《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

虽然把资本主义的一些关键部分排除在了论述范围之外，但需要涉及的领域仍然非常广泛。对一些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我的论述也必须相当简略。这些问题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每个都值得进行专题探索。

为方便读者，这里介绍一下本文的内容结构。

第2~6章讨论基本场景，其中，第2~5章描述现象及其产生和重复产生的因果关系，第6章讨论其影响并对其进行评价。第7章讨论基本场景之外的特殊场景。文章最后，读者们自会清楚我所说的基本场景和特殊场景的含义。

## 2. 产品和服务市场：过剩的再生产机制

### 经济史上的一个案例：美国的电信系统

我首先介绍经济史上的一个案例，它所代表的现象将在下文进行普遍意义上的讨论。这是关于美国电话服务的发展历程（Grover 和 Lebeau, 1996；Atkin、Lau 和 Lin, 2006），故事从1980年代初开始，当时几乎所有通话都在固定电话上进行，庞大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处于接近完全垄断的地位。

此时首先在技术上产生了重大革新，移动电话在1980年代后期快速普及（King 和 West, 2002），<sup>①</sup>后来还出现了更多技术革新，这些将在下文再讨论。

1984年，市场结构也发生变化，根据美国的联邦反垄断决议，AT&T公司被逐步拆解。此后，随着公司的合并与分拆，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几经改变，但市场构成的基本布局却保留下来。这个市场既不是垄断市场，也非完全竞争市场，而成为少数几家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形成的垄断竞争市场。

市场结构的这个特点与产业发展互为因果。创新接踵而至，移动电话不但能传递声音，还能发送文字信息和图片。便于携带的手机上增添了各种新功能：文字信息、图片和视频的传送，图像的存储以及计算器等等。

另一个创新方向则与传统的电话设备无关，通过 Skype 软件和其他类似网

---

<sup>①</sup> 与美国领先、欧洲追赶的通常规律不同，移动电话的普及表现出相反的方向。

络，人们可以用计算机进行语音甚至视频通话。

计算机和电话的功能已走向融合，还表现在其他各种形式上，如流行的 iPhone 手机和 iPad 便携电脑及其他竞争厂商的产品，都可以实现手机通话和其他信息传递与娱乐功能。每次创新热潮都给这个产业带来了新的生产商和服务提供商，有的老牌企业则被边缘化甚至淘汰出局。不过，市场的主要特征依然没有改变：少数大企业掌握统治权，彼此竞争、补充与合作，也极力打击对手。

从供给方面很难给这个产业划定清晰的边界，它包括整个供应网络、开发创新产品的研究机构、技术设备的制造商、电信服务的提供商、设备和程序的销售商以及软件开发商等。由于电信业与计算机、娱乐等产业的融合，产业边界已变得模糊不清。

需求方面的边界也同样被打破。在过去，你可以很清楚地区分人们对于电话、邮件、电报、图片摄影、学习和各类特定信息服务的不同需求。但如今，任何一条科技路线都能满足多方面的需求。边界的渗透让我们不可能明确界定哪些“供应群”与哪些“需求群”相对应。

任何一家企业都适用规模报酬递增的规律。产业进入需要的初始投资和固定成本规模巨大。销售额越大，固定成本的分摊面就越广。因此，所有的企业都在努力游说，让尽可能多的客户购买自己的设备与服务。企业收入的增长仅仅受制于销量的多少，而不是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

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的进程不断上演，创造的速度超越了破坏。鼓励产业进入和扩张的力量极其强大，而产业退出和淘汰却存在强大阻力。已经进入产业的厂商即便出现亏损，也会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例如，随着移动电话的普及，固定电话服务受到排挤（图 1），但其使用者的流失速度非常慢，与移动电话用户的扩张速度完全不成正比。增加一名手机用户，并不代表减少一名固定电话用户。这两个电信网络已经并存了相当长的时间，把二者打通的技术手段正在研发之中。各种类型的电信技术及其衍生发展，制造了规模极大的过剩产能。或者说，在电信服务业存在明显的过度供给现象。

这不过是几十年时间里在电信业所发生的产业变化。如果市场研究者们曾试图在这个漫长历程中任一时点采访生产商和服务商的负责人，询问对方能否为远超过实际客户数的对象提供电信服务，答案恐怕是由衷的肯定。这是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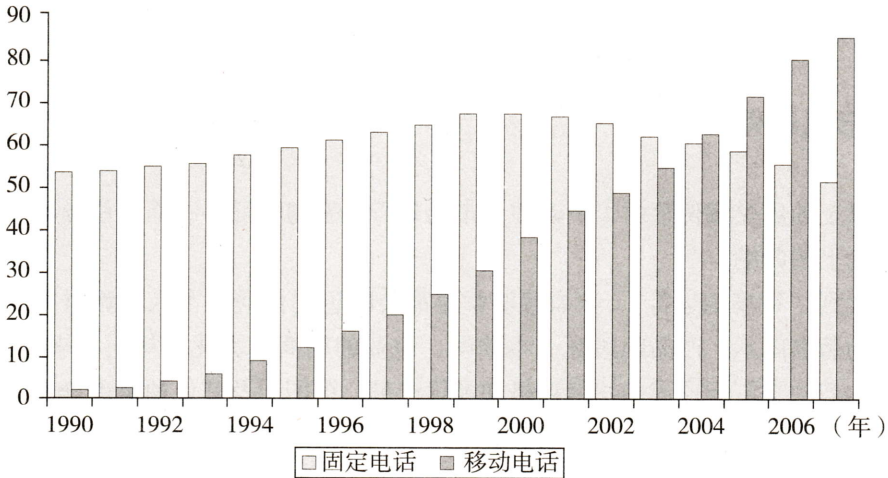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每 100 名居民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数 (1990 ~ 2007 年)

资料来源: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2007)。

典型的过度供给症状, 我们可以认为电信市场处于长期的过度供给状态。

接下来, 我们再对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 1980 年代的情况 (表 1)。当时的很多居民长期装不上电话, 要么需要数年时间排队等候安装, 要么不得不利用其他门路加塞。成功装上电话的人则发现, 打电话是件恼火的事情, 线路经常过于繁忙, 接通需要很耐心的等待。如果有人向国有电信企业的负责人提出同样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能力给更多的用户提供服务? 回答肯定是响亮的“没有”。他们还会特别提醒说, 排队等着装电话的人多着呢!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 电信业处于长期的过度需求状态。

表 1 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每 100 名居民的固定电话用户数 (1980 ~ 1988 年)

国家	1980	1984	1988
保加利亚	10.2	15.6	21.3
匈牙利	5.8	6.6	8.2
波兰	5.5	6.4	7.8
罗马尼亚	7.3	8.4	9.8
前苏联	7.0	9.6	12.3
美国	40.8	46.8	50.8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09a)。

于是我们看到，电信业在一种经济制度下表现为过剩经济，在另一种经济制度下表现为短缺经济。<sup>①</sup>

## 供给形成过程

以上的历史案例显示了资本主义市场运行的普遍特征，下面的任务则是进行理论上的归纳。

提到“市场的运行”，所有经济学家都会联想起任何一本入门教材中都会出现的著名图示：产品的边际成本曲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需求曲线，以及它们的交汇所形成的均衡价格和最优产量。该图示及其他抽象理论所描述的是企业从财务角度进行决策的静态场景，但我们这里要将其超越，我们需要突破经典模型的大多数严格约束及其静态特征，关注市场的动态发展，为此不得不采取没有那么精细的描述式的论证。

首先从供给开始，其路径是个动态过程，在以下几方面发生变化：

- 市场的参与者在持续发生改变，包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单位和企业的集合以及每个生产商和供应商：不断有新企业的进入、现有企业的合并与分拆以及退出等。这个集合的构成呈现经常的变动。<sup>②</sup>

- 可供买方选择的产品和服务的具体种类在持续发生改变。随着产品的多样化发展，选择空间从长期来看在不断扩大。新产品陆续面世，而老产品逐渐消失。从个别生产商和供应商那里就能看到产品种类的不停变化，如果从企业群体、整个产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将更加明显。

- 在产业部门或宏观经济层面把数据汇总起来，会发现短期波动和长期波动持续存在。从历史角度来看，还存在长期的持续增长。

随着产品种类的不断改变，持续的过剩将会出现：没有被买家采购的产品，或者没有被厂商利用的产能。这些滞销的存货与闲置的产能的形成同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过剩是如何形成的？过度供给的现象为何会普遍出现？有四方面的作用可以为此提供解释。

---

<sup>①</sup> 为保持客观，我需要补充指出，制度的改变与技术的飞跃同时发生，特别是移动电话的引入。即使没有技术的飞跃，制度改变也可能促进电话服务的普及，但程度如何难以判断。

<sup>②</sup> 参见 Bartelsman 等人 (2004)，该研究包含 OECD 各国的详细的企业组成状况。

(1) 垄断竞争。在张伯伦 [Chamberlin, 1962 (1933)] 和罗宾逊 [Robinson, 1969 (1933)] 的开创研究之后, 不完全竞争理论已被主流经济学接纳。这一重要理论证明垄断竞争企业存在过剩产能, 为我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在确定产量水平的时候, 垄断竞争企业的行为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表现不同, 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它们不会充分动用自己的产能。<sup>①</sup>

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市场结构不完美时的表现, 其正式的说法是“垄断竞争”(采用“寡头”一词可能更准确, 但研究文献里采用“垄断”的居多)。<sup>②</sup>

参与垄断竞争的企业在与对手争夺客户的时候不但可以通过价格优势, 也能利用与价格无关的其他条件: 更好的质量、更殷勤的服务以及送货上门等额外的服务等。最重要的是可以引进新产品, 这个问题还将做单独考察。<sup>③</sup>

(2) 需求的不确定性。让我们看一个零售商店的案例, 这是家常见的出售某些特定种类产品的商店, 如家用电器和其他电子产品, 包括电冰箱、笔记本电脑、电视机以及打印机电缆线等。这是家零售店, 过剩现象以存货的形式出现。但我想指出的是, 这并不限于零售业, 也适用于所有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我们的分析并不只针对产品库存, 也包括那些能够立刻或在很短时期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剩产能。换句话说, 采用零售业的案例不过是为了更直观起见。

再回到这个案例上。该商店无法准确预测有多少客户来光顾以及客人们都要寻找何种产品。但店主希望, 尽量不要让客户空手而去。我们把得到满足的客户占所有来访者的比例称为该商店的“安全水平”,<sup>④</sup> 假设店主已知哪些种类的产品会对来访者产生吸引力, 但不清楚需求的总量和具体构成, 那么很明显, 店主希望实现的安全水平越高, 他需要保持的存货量就越大。

---

① 多马的一篇杰出论文用图示描述了垄断竞争的这个特点, 与本文的主题有关: 为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系统性地出现过度供给现象 (Evsey D. Domar, 1989)。我发现许多研究成果都在某些方面和我自己的研究思路有类似之处, 并能够借用一二, 但多马的论文是唯一一篇让我感觉到完全相通的, 而不仅是细节。

② 我不知道有什么统计数据可以显示, 某个国家在某段时期内有多大比例的商品和服务交易是发生在完全竞争类型的市场中, 我只能猜测, 这个比例可能相对比较小, 垄断竞争应该居于统治地位。

③ 魏茨曼的模型 (Weitzman, 2000) 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比较, 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变量 E, 指“销售努力” (selling effort)。魏茨曼的研究显示, 垄断竞争要求生产商和销售商做出较高的销售努力, 而计划经济中的 E 值较低。

④ 或许可以用其他办法来表示“安全水平”, 这取决于测算的时期长短, 例如, 感到满意的购买量占全部意向购买量的比例, 而不是满意的人数与全部客户人数之比。

有关企业运营的研究提供了几种从数量上分析这一问题的模型。<sup>①</sup> 商店所需要的库存规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

- 尽管需求存在不确定性，但优秀的卖家仍然知道其大致构成、规模和波动幅度（Ramey 和 West，1999）。
- 存货通常采取分批式和突进式的办法更换，而不是陆续的更换。卖家所需要的存货水平往往是与供应商共同商定。
- 每个空手而去的客户都意味着损失，但堆积时间太久的存货也是浪费。这两种成本需要仔细权衡。

本文是针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而非存货管理。不过，从零售业的实践中还是可以看到，有些商店在订货和库存管理上比同行更有效率。许多生产商和销售商完全没有精心制定的存货策略，纯粹是依靠经验产生的直觉。然而对于一家在严酷的垄断竞争市场上打拼、试图维持和提高市场地位的销售商来说，最主要的武器之一仍然是保持较高的安全水平，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而这可以通过规模较大且精心挑选的存货来实现。

在较高的安全水平上满足客户需求，这是过剩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由于每家商店自身的利益，总体上出现了过度供给的状况，这指的是某个行业内所有卖家的总和。

除零售业以外，这一理论对生产企业面临的存货与产能储备问题同样适用。

传统的企业经营模型研究者希望找到适用的商业策略，他们可以将安全水平视为给定，然后推导出与之匹配的库存和产能储备的规模和构成。而本文采取的实证研究方法的思路相反：在库存和产能储备给定后，推导出能够在多高的安全水平上满足需求？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对这些指标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不同表现进行观察和测算，实在令人汗颜。但我相信，安全水平在过剩经济中较高，而在短缺经济中较低。<sup>②</sup>

---

<sup>①</sup> 有关存货和产能储备的研究文献很丰富，涉及多个学科，特别是微观经济学、企业运营和管理科学等（如 Chopra 和 Meindl，2003，第 11 ~ 12 章；Toomey，2000）。这些数学模型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如随机过程理论和随机程序理论等（Prékopa，1995）。

<sup>②</sup> 在短缺经济中，由于购买方的普遍接受，差距被缩小，这是因为几乎不可能在商店里找到某些需要的商品。这个现象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因为长期沮丧而放弃寻找工作的人。

场上，需求恒等于供给，卖方何来竞争动力呢？那将陷入一种麻木的静止状态。正是由于过剩的存在，让买方有所选择，竞争才成为可能，才会被激发，因为卖方都希望消除过剩。反过来，竞争与对抗又在持续地创造新的过剩。

(4) 规模经济。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和年轻经济学家们深信不疑）的简化模型中，生产商的平均成本曲线都被假定为“U”形。产量超过曲线最低谷之后，边际成本会上升。因此，企业不愿意让产量超过某个水平。这不是外加的约束，而是企业自身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而不愿意再增加产量。

在边际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的时候，情况有所不同，或者说，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后者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非常普遍，当生产商、服务商或零售商的固定成本在全部成本中占据较大比重时就会出现。产量越高，单位产品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此时不存在对提高产量的内部约束，只有外部约束发挥作用，主要是指需求量的限制。企业在不得不停止增加产量时，并非是出于自身的成本考虑。

规模经济会在两个时间维度上导致过剩产能的出现：长期和短期。面临垄断竞争的大企业对新产能大胆（甚至莽撞）投资，主要的动力是它们认为工厂越大，规模经济效应就越显著。尽管整个产业可能因产能的闲置而受损，新的大型工厂仍然会持续建成。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下文将进行讨论。

在短期内，大多数面临规模收益递增的企业都没办法把产能利用到最大限度，虽然这样做最有利，但通常来说需求方面的约束会极大地限制产量。于是，决策者们能切身感觉到没有利用的产能的确是“过剩”的产能，企业的利益要求他们尽可能地增加产量，同时也有能力增加产量。在规模收益递减的时候，决策者对形势则有不同的判断。虽然从物质和技术上说，他们也可以增加产量，但利润却会减少，因此在达到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后会毫不犹豫地停止增产。<sup>①</sup>

以上，我分别介绍了四种不同的作用力。在本文中，它们的共同点是对过

---

<sup>①</sup> 规模收益递增的重要性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重视，尤其是考尔多（Kaldor, 1981）和阿瑟（Arthur, 1994）。规模收益递增在几个方面产生影响，我只是提到了过剩产能的方面。另外一本名著（Helpman 和 Krugman, 1985）则分析了它对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影响。

场上，需求恒等于供给，卖方何来竞争动力呢？那将陷入一种麻木的静止状态。正是由于过剩的存在，让买方有所选择，竞争才成为可能，才会被激发，因为卖方都希望消除过剩。反过来，竞争与对抗又在持续地创造新的过剩。

(4) 规模经济。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和年轻经济学家们深信不疑）的简化模型中，生产商的平均成本曲线都被假定为“U”形。产量超过曲线最低谷之后，边际成本会上升。因此，企业不愿意让产量超过某个水平。这不是外加的约束，而是企业自身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而不愿意再增加产量。

在边际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的时候，情况有所不同，或者说，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后者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非常普遍，当生产商、服务商或零售商的固定成本在全部成本中占据较大比重时就会出现。产量越高，单位产品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此时不存在对提高产量的内部约束，只有外部约束发挥作用，主要是指需求量的限制。企业在不得不停止增加产量时，并非是出于自身的成本考虑。

规模经济会在两个时间维度上导致过剩产能的出现：长期和短期。面临垄断竞争的大企业对新产能大胆（甚至莽撞）投资，主要的动力是它们认为工厂越大，规模经济效应就越显著。尽管整个产业可能因产能的闲置而受损，新的大型工厂仍然会持续建成。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下文将进行讨论。

在短期内，大多数面临规模收益递增的企业都没办法把产能利用到最大限度，虽然这样做最有利，但通常来说需求方面的约束会极大地限制产量。于是，决策者们能切身感觉到没有利用的产能的确是“过剩”的产能，企业的利益要求他们尽可能地增加产量，同时也有能力增加产量。在规模收益递减的时候，决策者对形势则有不同的判断。虽然从物质和技术上说，他们也可以增加产量，但利润却会减少，因此在达到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后会毫不犹豫地停止增产。<sup>①</sup>

以上，我分别介绍了四种不同的作用力。在本文中，它们的共同点是对过

---

<sup>①</sup> 规模收益递增的重要性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重视，尤其是考尔多（Kaldor, 1981）和阿瑟（Arthur, 1994）。规模收益递增在几个方面产生影响，我只是提到了过剩产能的方面。另外一本名著（Helpman 和 Krugman, 1985）则分析了它对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影响。

剩经济的影响，导致了长期的过度供给现象的再现。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两种、三种甚至四种作用同时出现，互相影响和加强，对供给过程产生合力，推动过度供给的形成。

在观察其中某种作用时，大多数研究者会假设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这对设计数学模型较为方便，主流经济学家们还到处宣传这个观点。但更全面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行为的主要特征并非普遍适用。“公司”不是一个毫无人格特征的无形机构，其决策是人制定的。在现代的大企业的决策中，老板（包括比较有发言权的重要股东）和高层经理人都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利益经常存在冲突，决策结果取决于彼此间的相对力量的大小及达成怎样的妥协。时间因素也需要考虑：他们争取眼前利益的愿望有多强烈，又在多大程度上看重长期收益。

决策者的动机不能用“利润”一词来简单描述，也来自对权力、威望和改善公众形象的渴望，尤其是成为市场份额最大占有者可能带来的尊重和荣耀。<sup>①</sup> 这些动机往往是一致的，但也可能发生冲突。如果企业的决策者并不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不仅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受到其他动机的影响，上文描述的四种作用也同样适用。奋力拼搏的企业家们眼前看到的不见得只有利润最大化，竞争精神、争当第一的愿望，也能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同样重要的还有追逐权力带来的扩张冲动：“让我们成为最大、最强！让我们来统治市场！”除其他动机外，企业家们的行为还来自本能、生命力以及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等 [Keynes, 1967 (1936), 第 161 ~ 162 页]；Akerlof 和 Shiller, 2009]。在我的《短缺经济学》一书中，这种动力被称为扩张冲动 (Kornai, 1980)。

企业决策者们受到各种行为模式的影响，每个决策者的组合倾向都不相同。<sup>②</sup> 但即使决策者不考虑利润最大化或不仅是考虑利润最大化，也受到其他驱动因素的影响，以上四种作用机制仍然适用。

---

<sup>①</sup> 行为经济学的许多著作分析了经理人的行为背后的动机。除各种经济心理研究以外，还有大量研究各种动机的心理学理论。经济学家们还没有把这些新的心理学发现充分利用起来。

<sup>②</sup> 很难找到一群人中的“平均值”，因为那样会否认个体的异质性。这对心理学家甚至作家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经济学家们却需要慎重对待，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那些忽略决策群体的异质性的模型（参见 Kirman, 1992）。

## 需求形成进程

需求的形成同样是个动态过程，不但受买方的偏好、收入或财富的影响，也取决于任何时点的供给等因素，这一点对目前讨论的话题尤其重要。例如，新产品的出现会唤起新的需求，让老产品显得过时。虽然主流经济学家们深信不疑，实际上却不存在交汇于某点的两条独立曲线，因为供给在任何时候都是需求的主要解释变量之一，反之亦然。

供给和需求的形成过程相互影响，如果它们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平行，以相似的速度增长，其交互作用依然存在。不过，本文的目的是解释为什么在过剩经济中需求会落后于供给，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还会有多余的供给出现。

上节介绍了抬升供给过程的一些作用力，下面则讨论打压需求过程、制约需求扩张的某些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抵制雇员的加薪要求符合雇主的利益。对劳动的报酬不能超过工作的边际收益，这在雇主们的考虑之中。<sup>①</sup> 如果雇主能够把工资压低到该水平之下（或许可以通过长期失业来实现），就能进一步节省成本。反之，如果雇员的加薪要求实现，则会侵蚀企业利润。但无论争夺的结果如何，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工资的任何膨胀都会受到雇主利益的反向制约，最终导致雇员的收入水平会制约产量的扩张。

随着产量和生产率的长期增长，雇员的收入也会提高。但工资具有粘性，不能很密切地反映产量和生产率的增长。于是，我们会看到需求落后于生产的积极扩张的趋势。

这个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联系（《资本论》，尤其是第23章和第25章）。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我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但我承认在这个论点上存在相似之处。<sup>②</sup>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带来的供给扩张并不

---

① 或许可以支付更高水平的工资，例如对某些具有特殊技能或忠诚的雇员群体支付所谓的效率工资。本文将在讨论劳动力市场那章再进行讨论，这里只是强调即使效率工资也要物有所值，不能上涨过高。

② 我在以前的多篇文章中做过详细阐述（包括 Kornai, 2008）：我在哪些问题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针对某些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应用这些方法，以及在哪些问题上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是由于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或制约供给水平。扩张的刺激来自企业所有者与经理人的固有利益，这种固有利益同时又给需求的增长设置了障碍。导致过剩的驱动因素是在微观层面上产生的。<sup>①</sup>

以上介绍的是利益冲突机制造成的影响，如果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受到的预算约束较为严厉，效果将更加显著，它会限制过度增加支出和放松工资约束。

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从看似矛盾的方向影响着供给的形成过程。一方面，企业和家庭的预算约束必须足够硬，以防止需求的过度膨胀。另一方面，人为地保护落后企业、放松预算约束，又会继续增加过剩产能。不是因为我的描述和解释的逻辑出了问题，才导致了相反的结果，而是客观上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影响。

## 定价过程

根据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价格是解决供需失衡的必要手段。出现供给过剩的时候，价格必然下跌，从而提振需求。价格变化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个功能，但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但是由于随机误差的影响，还源自系统性的扭曲。

定价本身也是个动态过程，不能像瓦尔拉斯的试探理论描述的那样，被视为向均衡价格水平趋近连续过程。在价格到达均衡水平前，供给和需求都已经改变了，我已经指出，这种变化是在不断发生。所以并不存在向某个特定目标的趋近，目标本身就在变动中。

人们现在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价格具有粘性，一些较为明智的主流经济学家（Mankiw, 1985；Blinder 等人，1998，Bils-Klenow, 2004）和有的非主流学者，如后凯恩斯主义（Lee, 1998）都能赞同。价格粘性有很多原因：对供需关系的变化存在滞后反应，企业不愿意承担调价带来的附加成本（所谓“菜单成本”）等。

垄断竞争市场中的价格由卖方决定，买方要么接受，要么转向其他卖方。<sup>②</sup> 价格粘性具有不对称的特点：下调更为困难。即使感受到供给过剩，卖

---

<sup>①</sup> 其他人的论述中有类似的分析（Bhaduri, 2007）。

<sup>②</sup> 价格制定者和价格接受者的划分是西托夫斯基引入的（Tibor Scitovsky, 1985），他特别指出，垄断竞争市场的卖方制定价格，造成了多种影响，包括闲置产能和存货的堆积。

方仍然担心利润下跌，而不愿意永久性地降价。<sup>①</sup>所有企业（和货币政策制定者）都会对通货紧缩及其对宏观经济的破坏感到恐惧。我希望强调价格粘性的这个不对称性，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普遍的不对称性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普遍的不对称性就是过度供给占据主导的倾向。

在供给、需求和价格的共同运动中，价格变化不但不能消除普遍存在的过度供给现象，还会继续诱发其产生。价格波动往往局限在过剩经济的典型范围内。

### 3. 产品和服务市场：概念工具和测算方法

我现在兑现之前的承诺，开始介绍概念工具，讨论对现象的观察及其测算方法。

供给和需求到底是指什么？那些曾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些概念的人，或许可以不要那么自信。<sup>②</sup>“过度”一词也已多次出现，但我还没有准确描述是什么东西过度，过度供给是相对于什么标准而言？

#### 容易理解的假想案例

(1) 一家处于过度供给状态的服务企业。首先请设想，我们现在去采访一家服务企业（例如酒店）的经理人。<sup>③</sup>这家酒店是在过剩经济中经营。酒店业习惯采用的经营指标是“客房入住率”或其对立指标“空房率”，均以百分比表示。我们要问这位经理，“您下周能够实现和希望实现的客房入住率有多高？”下面是几个附加条件：

- 下周的客房价格由酒店自己决定。
- 问题仅针对一个很短的时期，酒店在短期内的接待能力是固定的，由可

---

① 比较容易通过临时降价和促销来处理存货。

② 我曾经在《反均衡》(Anti-Equilibrium, Kornai, 1971)一书中提到这些被广泛接受和采用的术语的问题，指出其定义含糊不清。我的思考没有激发出太多反应。在40年之后回顾当年的写作，我认为自己的看法依然是正确的。结合后来增加的知识，我在这里再次表述自己的批评意见以及在概念和方法论上的改进建议，希望这次能获得更大的反响。

③ 本文有关供给的讨论都是针对企业，但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个体的生产商、贸易商和服务商。

用的客房数目决定。仅从实物角度考虑会得到一个理论上的产能，但经常还要克服其他障碍，如维护和技术等问题，会导致某些房间无法提供服务。考虑到这些后，经理人会给出一个现实的产能。<sup>①</sup> 在这个案例及下面的研究中，如果现实产能被百分之百地利用，则视为全部利用。<sup>②</sup> 回答者会根据对现实产能的冷静分析进行回答，而我们感兴趣的也是提供服务的实际意愿，而非梦想或奢望。

- 不要求对方预测可能实现的业绩，或者说希望来多少客人。让他假定找房间的客人会在任何一天的任何时候出现，或者说，他要考虑的是，仅从酒店的角度来看，愿意接待多少客人，希望实现多高的入住率。

我当然希望酒店爆满，把现实的接待能力都充分利用起来——如果对方不这样回答，那才出人意料。于是在下周，我们会得到酒店的实际入住率，假定其平均水平为75%，显然，对过度供给的量化描述应该是25%。

我们假定，对某个城市的所有酒店都进行这样的采访，并收集实际入住率，看到的都是过度供给状态。然后，我们就能得到对这个局部市场的供需情况的准确描述。把酒店经理人的预先测算汇总起来，即能得到某个星期的供给量，把事后的实际入住率汇总起来，即能得到需求量。在这个案例中，总供给显然超过了总需求。我们不需要向顾客询问需求水平，因为普遍存在的过度供给表明，需求量等于实际交易量。

这一结果可以称为“短缺法则”（rule of the shorter side）。假如存在过度供给，需求就处于短缺方，实际交易水平始终等于短缺方的水平。

这个法则对观察和测算方法具有重要影响。从实际交易和销售数据中，只能估计出短缺方的规模。对过剩方的测算需要用其他方法。在我们设想的案例中，采取了最简单的方法来估算过剩方：询问酒店负责人希望销售的房间数量。如果考虑到酒店希望把所有房间都销售出去，所提的问题或许应该改为请

---

<sup>①</sup> 美联储会定期公布产能利用指标，其定义是：“美联储编制的产能利用指数采用的是可持续的最大产量（sustainable maximum output）的概念，指一家工厂根据现实的工作计划、考虑到正常的检修期、在劳动力和原材料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最大产量。这一概念基本对应生产函数的最大投入点，代表可持续的最大产出，而非短期内的不可持续的更大值。例如，某家企业可以推迟日常的维护，或者在短期内超负荷生产，但从长期而言是不可持续的”（Morin - Stevens, 2004, 第3~4页）。

<sup>②</sup> 尽管实际产能通常低于100%，还是可以假设有超过100%的产能的情况。例如在这个案例中，为应付太多的客人，酒店可以推迟日常维护工作。

他们预先测算实际的供应能力。

回到之前的话题，“过度”的定义涉及怎样的参照标准。这个案例给出了清晰的回答：供给超过了实际交易量，而实际交易量等于需求。

(2) 在过度供给状态下，一家销售库存商品的贸易商。<sup>①</sup> 零售活动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如单位的物质条件或员工的生产效率等），但供给的主要约束还是现有的库存。我们要测算一段时期内（如一周时间）的供给水平，而不是限于某个时点，这和上面的服务企业的情况相似。我们向这家贸易商的经理人所提的问题是：在普通的价格水平上，贵公司能够并愿意向客户销售多少产品，包括期初的存货和这一周内新增的存货。可以预想，回答应该是“全部存货”。<sup>②</sup> 贸易商能够并愿意销售的数量可以视为市场的供给。

为了得出清楚的结论，还需要加上如下两个条件：

- 要新增的库存在采访前已经预订。我们要求回答者假定，在未来一周不再调整存货订单，维持原来的对于“短期”的解释。

- 第二个条件针对我们——思想试验的设计者。我们假定，所有产品到这一周的周末都还有存货，没有产品被卖光，或者说，所有产品的需求均不足。

如果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到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就能准确测算出过度供给的规模有多大，它就等于期末的存货。这个结果可以用简单的等式来表达：

供给 = 期初存货 + 新增存货

需求 = 实际交易或销售额（短缺方）

过度供给 = 期末存货

期末存货是卖家事前希望卖出去但未能实现的部分，是事后得到的结果。

(3) 处于过度供给状态的一家生产企业。我们再进行一次假想采访，这次的对象是生产某种有形的耐久产品的企业（如汽车厂）的经理人，我们已知采访是在过度供给的市场中进行。

如何设计问题才能发现供给量，这次比前两个案例要困难。与前两次采访相同的是，我们的问题仅涉及下一周这个很短的期限，我们询问的对象是销售人员。问题、假设和条件与贸易商的案例基本相同，我们要问，这家汽车厂根据现有的成品和将来一周将完工的汽车数量，能够并愿意销售多少辆汽车？注

<sup>①</sup> 贸易商可以发挥服务中介的作用，本文未考虑这种特殊情况。

<sup>②</sup> 商店的全部存货到这一周末被卖光显得有些夸张，就像本文开头介绍的华沙的食品店那样，那会严重挫伤客户。但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中很难发生，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意：成品的完成速度不再改变。于是我们能得到下周可用于销售的总的供给量。过度供给的规模（未能售出的汽车数量）将等于期末的存货。

如果接受采访的经理人是负责安排生产的，我们会根据完全不同的假设提出不同的问题。对于汽车这样复杂的产品而言，在一周这样短的时期内进行估计是不合适、不符合习惯的，因此我们要问这位经理人对下个季度的看法。

这次采访及其背后的条件与第1个案例（服务企业）类似，受访者需要假设有足够多的订货，因此，愿意生产多少产品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答案会尽可能接近这家工厂的实际生产能力。如果产量在接近实际产能的时候，满足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那将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回答。如果出现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对汽车厂而言往往如此），则更是如此。

后面的结论也和服务企业的案例相似。如果收到的订单太少，最后的产量就会小于实际的产能，或者由于销售状况不能得到改善，产量目标就会被下调。于是在季度末，我们会看到企业未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全部产能。事后得出的闲置产能的规模可以被视为过度供给。

请注意，生产企业面临两种类型的过度供给：希望出售却未能实现的存货，以及希望利用却未能实现的产能。两者都是指汽车，但这两个确定的汽车数量却不能加总。前者是场地里停放的现实的汽车，后者则仅限于想象，是对没有实现的生产愿望的量化描述。从不同视角看，未能出售的存货与未能利用的产能都可以视为过度供给，但把它们加起来就不太好解释了。

以上是通过假想的采访对有关概念进行描述。幸运的是，现实生活中有人就类似问题进行过真实的采访。

表2是对工业产能利用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者分析了34个国家从1978~2008年的数据，表2的数据来源包括13个国家和超过100个观测值，具体的数据是每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中值。

表2 产能利用率的国际比较（1978~2008年）

国家	中值	观察值数量	标准差
比利时	79.0	121	2.89
加拿大	81.3	152	4.11
法国	84.4	130	2.02

续表

国家	中值	观察值数量	标准差
德国	83.6	154	3.51
意大利	75.7	154	2.70
日本	79.0	153	8.11
荷兰	82.5	147	2.58
新西兰	89.2	153	2.13
挪威	82.4	138	2.70
葡萄牙	78.9	126	2.49
西班牙	79.8	154	3.03
瑞士	83.8	154	3.33
美国	80.4	145	3.91

注：数据显示的是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观测值数量”一栏表示某个国家在一个季度内获得的数据的数目。

资料来源：Eter-Graff-Müller (2008, 第8页)。

下面的图2反映的则是美国的产能利用水平的时序指标。该报告的作者特别指出，实际利用水平是与长期的可持续生产水平（即实际产能）进行对比（也可参见 Corrado 和 Matthey,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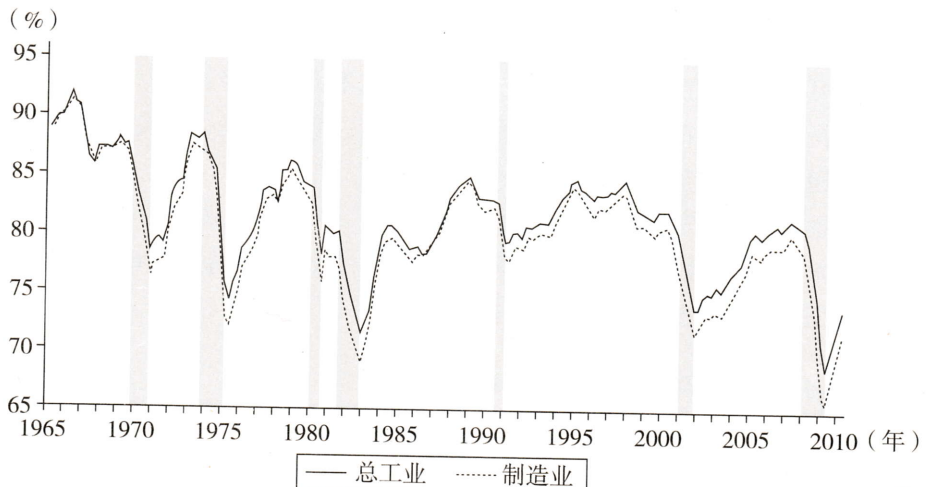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的产能利用率 (1965~2010年)

注：灰色的柱状区域代表衰退期。衰退期根据 NBER 的定义确定。

资料来源：Federal Reserve Statistical Release (2010)。

另一个案例是法国的时间序列图（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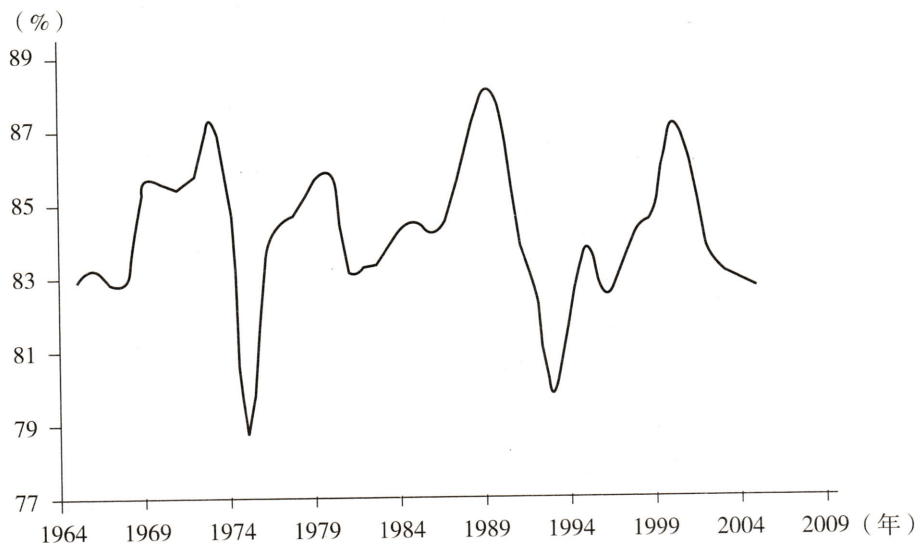


图3 法国的产能利用率（1965~2005年）

资料来源：Allain-Canry（2008）。Olivier Allain és Nicolas Canry 提供了数据资料，对此我深表感谢。

从这些图表中可以清晰明快地得出如下结论：

各国的产能利用率不同，年度间的利用率有波动，但从未接近90%的水平。这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存在普遍、长期的大规模闲置产能的观点。

表2和图2、图3显示的是工业产能的利用率。有人正对住房存量的利用率做类似的调查。从本文的研究目的出发，业主自有住房和出租住房的出售和出租数据可以加总：其总数可视为住房产业的未利用产能。图4明确显示，美国在任一年份的这一加总比率从未低于8%，在2004年更升至12%，这同样意味着存在相当大比例的过度供给。

### 第一个难点——供给和需求的持续的共同调整

以上介绍的三个简化案例提供了“过度供给”的概念定义及其测算方法，当然我有意识地对此进行了各种抽象，以便尽快审视测算的结果。接下来，我希望与读者一起研究实际情况，分析真实的商业活动的情形，它们与上面三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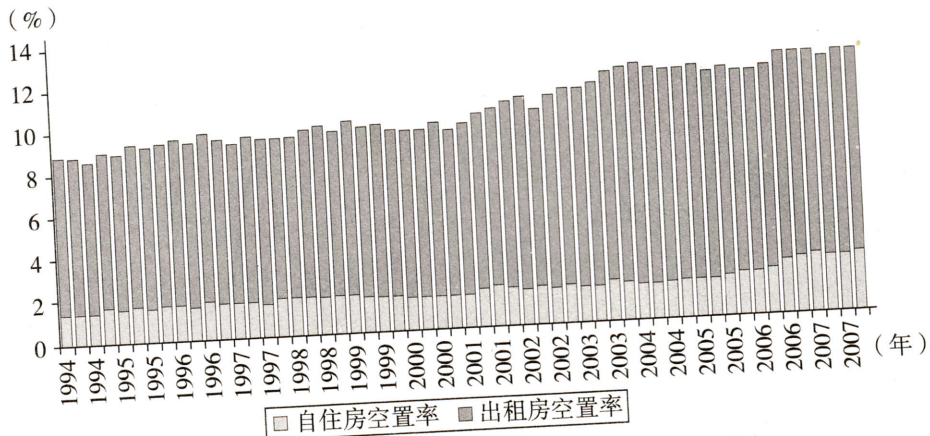


图4 美国的出租房和自住房空置率 (1994~2007年)

资料来源: U. S. Census Bureau (2010)。

理想化的简单案例存在很大不同。

我不是担心观察者或统计者可能犯的错误及其引起的随机误差。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在某些情况下,不可能“客观”地坚持采用以上的定义和测算方法。

这样一个难点已经在前面的第2章中有所触及,描述需求的形成过程。我们现在再从测算的角度来同时观察供求两方面的变化。

对每个卖方和买方而言,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变化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过程。生产商和贸易商的销售倾向在不停改变,针对现实情况不得不做出调整,这个过程哪个时刻才代表“真实”的供给呢?市场研究者们往往会问生产企业的经理人计划生产或销售何种产品,然后把计划与实际的生产和销售进行对比。实际结果可能大于或小于计划。<sup>①</sup>问题在于,我们要搞清楚经理人在接受提问的时候正处于决策形成过程的哪个阶段。有关的需求信息会怎样影响供给形成的过程?经理人越是靠近供给对需求做出必然调整的最后时点,他制定的计划与实际产出就越是一致。

买方的购买愿望符合同样的逻辑。这样的愿望会在哪个时点转变为“真实”的需求?客户在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购买?在什么时候进入商店?在什么

<sup>①</sup> 例如广泛使用的商业调查数据 (Business Tendency Survey, OECD, 2003)。



时间发现没有找到预定的物品，转而购买替代品？或者在不久之后，会在什么时候去第二家或者第三家商店购买其他商品？

我们可以追踪每个卖家或买家的这些决策过程，但如果希望将某个时点或短期内的大量买方或卖方的购买或销售意愿加总起来，就会把不同性质的成分相加。<sup>①</sup> 其结果导致，总数的概念会变得模糊不清，在没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出合理解释。

我们利用酒店业的案例做一番详细阐述。如果某个城市来了 20 位客户，其中 10 位寻找四星级酒店，另 10 位寻找二星级酒店，他们都如愿获得了服务。但如果所有 20 位客户都想找四星级酒店，而其中 10 位最后只找到二星级酒店，那么，就只有 10 位客户的需求得到满足，另 10 位感到失望。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酒店业的入住率这一实际统计指标是相同的。不管是什么情况，只要每位客户都能找到房间入住，按“短缺方法则”，实际的房间入住数都反映了客户的总需求。然而，这一总数掩盖了某些客户未能获得理想服务的事实。

## 第二个难点：过度供给与过度需求同时发生

在本章开头的讨论中我进行了简化，假设在每种交易中需求都是短缺方，排除了过度需求的可能性。结合“短缺方法则”，很明显，在这样的案例中那些描述性的统计数据反映的是需求量，因为我们已知是在讨论过度供给的市场。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不能如此肯定，可能同时存在过度供给与过度需求的现象。某些酒店接待的客户可能很少，而有的客户同时又没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酒店。还有，每天都在发生调整。例如，我们可以编制覆盖某个城市的所有酒店的入住率的数据表，但仅靠这个报告并不能证明供给能否满足需求。

过度供给与过度需求的现象不但可以并存，还会发生相互作用。某个拥有过剩产品的卖方可能缺乏资金，从而无法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他的需求因此下降，导致另一位卖家的供给过剩，形成连锁反应（Clower, 1965, 1967; Leijonhufvud, 1968）。因此，过度供给现象会产生溢出的乘数效应。

---

<sup>①</sup> 异质性问题在前文也提到过，它给供给和需求的记录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如果微观上的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数据能被分别统计，那会是件大好事，可以对这些现象的分布进行描述，分析其随机特征。

### 另一个调查：观察生产的障碍及其微观约束

前一小节分析了过度供给与过度需求并存的问题。下面介绍的规范国际比较可以有助于对它们的理解和观察，但需要正确解释采用的方法。

数十年以来，每个季度，26个欧洲国家的26家国际商业研究机构都会对若干工业企业的某些经理人代表提出以下问题：<sup>①</sup>

目前限制你的产量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 不存在
- 劳动力短缺
- 原材料或设备短缺
- 财务约束
- 其他因素（请具体写出）

这里以匈牙利的调查结果为例（图5和表A1）。在得出与本文有关的结论前，有必要再次看看研究者们到底在问经理人什么问题。为了进行比较，请大家看看上文的第3个假想案例。问题的内容存在本质的差别！这里的研究者不是要求26个国家的经理人预先估计自己的最大产量，假如存在足够多的需求，他们能够生产多少产品。这里的问题不是关于供给能力，而是针对预先估计的产量。研究者也没有问，假定企业有生产500件产品的能力，也有这方面的外部条件，他们是否愿意生产500件产品。或者说，这里没有问他们在不考虑需求的情况下，能实现多大的供给量？

相反，这里的研究者的提问隐含地假设，生产经理在制定产量目标时会考虑各种障碍，并得出一个现实的、可以完成的计划。按照本文的研究思路，这可以在供给形成过程的晚期阶段形成。这里的研究者是在供给形成过程中提问，通常会有哪些因素制约产量，也就是说“假如你的预测做得不错，一般会考虑到哪些障碍因素？”这不是调查中的问题的原话，我将其解释出来，是为了看清问题设计背后隐含的假设。

---

<sup>①</sup> 调查方法参见 OECD（2003）和 Nilsson（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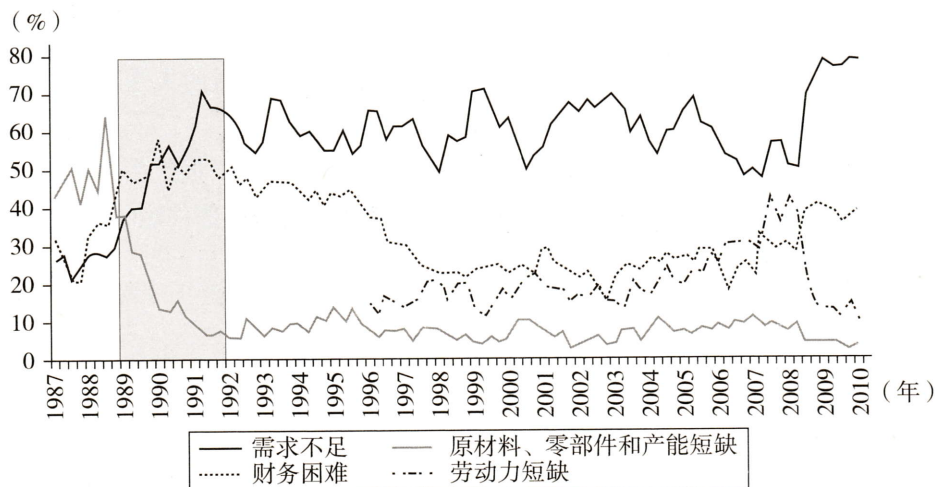


图5 影响匈牙利的制造业产量的因素 (1987~2010年)

注：受访者要回答哪些因素影响了产量，可以提到多个因素。为简明起见，本图仅包含少数时间序列的数据。纵轴代表提到某个因素的相对频率。图中的灰色实线代表原材料、零部件和产能的短缺，具体是指，在每个调查期，我们选择五个变量（有关原材料、零部件和产能短缺）中的最高值（最高的相对频率），或者说是至少提到其中一种因素的人的最高比例。图中的灰色区域代表的是体制转轨的时期。数据是每年的第一季度。

资料来源：Direct communication of Kopint-Türki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Market Research, Budapest)。该图基于附录表 F.1. 的数据绘制而成。

这个敏感而有趣的问题带来了敏感而有趣的回答，<sup>①</sup> 但没有反映出原始的供给能力（会达到实际产能的边界）在微观层面会有何种需求约束。于是，这一调查数据无法让我们直接得到微观层面的过度需求或过度供给的规模，没有也不能为本研究有关过剩经济和短期经济的基本问题提供清楚而直接的答案。

但无论如何，通过谨慎的分析，从这些数据中还是能为我的研究课题找到一些间接的启示。请注意，在匈牙利的数据里，提到投入困难和需求不足问题的人的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图5的灰色区域代表的是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时间趋势线明确显示，到体制转轨之前，社会主义短缺经济中的企业实现连续生

<sup>①</sup> 在这26国进行的调查不是为了测算过度供给或过度需求现象的规模或分布，而是为商业周期波动提供帮助。

产和增长所遇到的障碍主要来自资源方面：劳动力尤其是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原材料和零部件的短缺是最常见的问题，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至少提到一个投入方面的问题。需求不足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提到此类障碍的人在1989年前不到受访者的三分之一。

在体制转轨后，答案的分布比例基本上颠倒过来。到21世纪头10年，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提到需求方面的障碍，关注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人则变得非常少。<sup>①</sup>

### 第三个难点：从过剩存货中区分出“必要”的部分

回到讨论主线，我们继续看概念和测算的问题。

在第3章开头的简化案例中，未售出的期末存货被视为过度供给。也许读者并不在意，但我有责任指出，这样的理解存在问题。

在存货和产品更新保持固定节奏的时候，如果某个时期的未售出存货增加，显然存在过度供给。但之前我曾强调，需求并非固定不动，而是在不断变化中。保持一定的存货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供给和需求的变化。

那么在何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存货过多、出现了持续的过度供给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再谈谈第1章曾提到的安全水平的概念，这个指标在下面的讨论中用B来表示。例如，人们可以认为，如果90%的客户能在商店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仅有10%必须用其他物品替代或者空手而去（ $B=0.9$ ），那么这家商店的存货水平就是充足的，而没有过多。但是，如果买不到合适商品的客户的比例下降到了9%（ $B=0.91$ ），存货就过多了，存在持续的过度供给。但坦率地说，这样的说法有些主观臆断。为什么B应该等于0.9，而非0.85或0.96呢？安全水平B并不是给定的，而必然是待定的：它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要受第2章所介绍的共同驱动和调整机制的影响。<sup>②</sup>

因此，安全水平必然是待定的，越过安全水平之后，存货量就超出了必需，开始出现过多的存货量，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其视为过度供给。

① 有必要指出，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在资本主义转轨完成中仍然是个问题。

② 与此论点一致的是，有些企业会执行明确规范的存货和订货规则，从而影响对客户的安全水平B。

在这一数量分界线待定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确信存在某些重要的相互关系。

- 除了习惯的延续和进货的安排外，安全水平随存货的结构合理性而提高。如果给定存货的规模与结构，安全水平随进货的弹性和便利程度及订单的执行速度而提高。<sup>①</sup> 这些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人们设计了各种研究商业运营的模式，用于详细地量化分析这些联系。

- 如果企业的存货政策允许实现较高的安全水平，这既会给卖方带来影响（如加强竞争优势），也会给买方带来效应（如提供更多的选择，增加找到最合适的商品的机会等）。

以上的讨论仅仅是针对过度供给，因为这是本文的中心议题，但论述的思路同样适用于过度需求的情况。如果所有希望购买、也有财力购买的客户来商店后都空手离开（ $B=0$ ），存货水平显然太小。但如果经验研究显示，实际的需求规模和结构会导致安全水平  $B=0.3$  或  $0.4$ ，又该得出什么结论？存货水平依然太少吗？我需要重申：存货水平过低的分界线在哪里，这依然是个待定的问题。

回到定义的问题：以上的讨论已足以对“多余”、“过度”这样的特征描述产生质疑。对我来说，我希望在本文中回避是否面临过多存货或过多产能的问题，当然有时未必成功。

在以前的《短缺经济学》（Kornai, 1980）一书中，我采用“宽松”（slack）一词来表示这里所说的“过剩”的含义。后来，我有了更多的时间与讲英语母语的人接触，也阅读了更多英文的日常报道。我现在感到“slack”带有贬义，有松弛的含义，让人感觉至少有部分存货和产能是多余的。于是我一直试图寻找一个更中性的词汇，以避免对判断的误导。我还有意地不做结论，闲置的产能、多余的存货和缓慢的流转是应该被视为浪费，还是属于聪明的储备、对不可预测的需求的特别应对办法。

尽管我坚持认为“过度”的数量分界线是待定的，但并不代表未售出的存货规模以及因此未能满足的客户比例就无关紧要。这些可以观测到的联系通过适当的方法可以进行量化分析。

---

<sup>①</sup> 日本广泛采用即时生产策略，如果必要的投入品能够及时送达，而不用建立存货，则可以在较低的总体存货水平上维持连续生产。

例如，对存货的构成就可以进行颇有启发价值的分析（如 Chikán, 1984），我们来看看表 3。

表 3 投入存货和产品存货之比，国际比较（1981 ~ 1985 年）

国家	制造业投入存货和产品存货之比（1981 ~ 1985 年）
<b>社会主义国家</b>	
保加利亚	5.07
捷克斯洛伐克	3.07
匈牙利	6.10
波兰	4.49
前苏联	3.16
<b>资本主义国家</b>	
澳大利亚	1.36
奥地利	1.06
加拿大	0.92
芬兰	1.92
联邦德国	0.71
日本	1.09
挪威	1.10
葡萄牙	1.66
瑞典	0.81
英国	1.02
美国	1.02

资料来源：由 A. Chikán 整理，发表于 *The Socialist System* (kornai, 1992, 第 250 页)。

表 3 的计算基于如下理论：不管是在哪种经济制度下，生产和销售都需要保持连续性以及避免受冲击，因此要保持存货，包括投入的存货和产品的存货。然而，两者之间的比例会反映经济制度的特点：哪方面需要更充足的存货储备？从表 3 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存在短缺经济，因为投入品的采购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而普遍的短缺导致销售相对轻松，投入品存货相对于产品存货的比例非常高（Farkas, 1980）。相反，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

这一比例要低得多。这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投入品发生短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产品存货会更多堆积，因为销售更加困难，生产商希望给买家提供更快的服务与更多的选择。

#### 第四个难点：不合理的加总

我们来看由相关的产品或服务组成的局部市场。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模型中，习惯将“净过度供给”列入价格变动的解释变量。如果这个变量为正值，价格会上涨；如果为负值，价格会下跌（在瓦尔拉斯的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是“拍卖商”，在奥斯卡·兰格的理论中则是价格管理办公室，也是根据拍卖商的规则来调节价格，直到均衡的达成）。

要得到“净过度供给”，只需要把过度需求的值（为正值）和过度供给的值（为负值）简单加起来即可。

初看起来这似乎很符合逻辑，背后却存在重大错误。假如我们是在分析一个机场的运输情况：离开机场的飞机的上座率如何？此时的过度需求是指，有的旅客无法在期望的时间坐上航班。过度供给则是指，有的飞机只搭载了一半的乘客。净过度需求是指，在给定时间内，买不到票的乘客人数减去空座位的数量。然而这个加总值没有丝毫意义，对于那些未能在早上9点登上布达佩斯去哥本哈根的航班的乘客来说，告诉他们晚上7点的航班还有座位，足以提供安慰吗？他们可能在当天下午有重要的会面。

在理论模型和实证计量中，把过度需求当作净值来处理是常见的做法。<sup>①</sup>但是反思表明，应该严格限制使用“净过度需求”或“净过度供给”这样的指标。

以上讨论的所有测算方面的难点都提醒我们应慎重采用加总的做法。实际上，深入地思考表明，应该完全禁止这样的加总。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上面讨论的几个问题，纯粹从加总的视角来看：

(1) 不可能把期末存货与闲置产能加总起来，因为它们代表着不同性质的供给可能性。在这两种过剩中，闲置的产能更为重要，因为存货的规模更容

---

<sup>①</sup> 加总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分析所利用的非均衡模型中尤其突出，参见 Portes 和 Winter (1980)；Portes 等人 (1987)。有关讨论参见 Davis 和 Charemza (1980)；Brabant (1990)。

易控制，而产能更为持久，也更难缩减。

(2) 供给和需求的形成都是动态的过程。每个卖家或买家的销售倾向或购买倾向在过程中都可能发生变化或成为事实。在某个时间点进行横截面测算的时候，把尚未完成的不同性质的购买倾向或销售倾向加总起来是不对的。

(3) 最后一个或许也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利用“净值”来对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进行抵消，是完全错误的做法。

以上观察当然也适用于更低或更高的分析层级。这一论述思路直接表明，在解释宏观层面的数据时需要最大的谨慎。对于某个特定时点的某个特定经济体，不可能得到宏观层面的供给和需求数据。

必须承认，我不太清楚应该在哪里阐述自己对实际 GDP 和潜在 GDP 之“差额”的思考。这个指标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被广泛采用，同样是反映过度供给的指标，类似于某个生产企业或某个产业的过剩产能。看起来，上文提到我对更低层面的加总指标的担忧和反对，对这一宏观指标同样适用。这个问题显然还有待进一步澄清。对我而言，我现在既不敢接受也不敢否定这个被广泛采用和重视的指标。

我还可以列举更多统计和观测上的困难和异常状况，但以上缺陷已足以解释我为什么愿意用“短缺经济/过剩经济”这一组概念来描述特定国家的普遍市场状态，而不是采用“过度需求经济/过度供给经济”这一组许多人认为更容易理解的概念。

## 测算和概念工具的实用建议

根据上文的论述，我已不指望测算出在给定市场和给定价格水平上，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水平是多少，不指望能量化估计过度供给或过度需求的规模。我不会尝试用一个关键指标来总结某个市场的普遍状态。

但这并不代表彻底放弃测算任务。虽然不能用汇总的关键指标，但仍有可能利用几个局部指标来反映过剩经济和短缺经济的典型特征，以及它们在给定时间的状态及其变化。

这里先列出此类指标的几个例子。

- 生产商和服务商的产能及其利用率。



- 存货周转率，存货的构成比例的相对变化以及相对于销售额的变化。
- 让生产商回答，生产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哪些？
- 排队和等待的时间，排队者的购买意愿与实际销售量的对比。

以上指标的例子会在本文的好几个部分出现，表明它们是在实践中可行的测算办法。

也可能找到其他指标来反映过剩和短缺现象的某些特征。我们的富有创造力的经济学家、市场研究人员和统计学家们可以设计出更多的观察与测算方法。但不幸的是，往往不能从实际的观察和测算中总结出理论，这一理想过程在实践中经常是以相反的次序完成：把某个基于假设的理论作为出发点，然后对现象进行观察和测算，那时才能进行统计分析。

上文提到的所有测量方法会得出不止两种不连续状态：过度供给与过度需求。它们会报告某个现象的频率或程度：闲置产能已达到 10% 或 30%，存货可以满足 3 个月还是 23 个月，排队等待的时间是 3 个月还是 3 年，这些并非无关紧要。

根据这些和其他类似指标，我们有可能对过剩现象和短缺现象的分布及其变化规律进行分析（还可以根据它们的频率或程度进行细致的分类），发现分布的随机特征。通过对这些指标的仔细研究，可以对某个给定市场的一般状态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 编制合成指标或“综合指数”

我们还可以尝试，对涉及某个国家整体经济的过剩现象或短缺现象编制出“综合指数”。这样的综合指标可以用于几方面的目的，其中最常见的例子包括：

- “自由指数”是为了反映某个国家在某个年份的企业和个人权利的自由状态（Freedom House, 2010）。
- “腐败指数”反映的是某个国家在某个年份的腐败事件发生的范围和严重程度（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0）。
- “商业环境指数”反映的是商业领域的决策者的“心情”，对于自己预期的乐观或悲观程度（参见 Clavel 和 Minodier, 2009；Erkel-Rousse 和 Minodier, 2009）。

这些测算的原始目的是某种现象的总量或频率，但难以实现直接测量，只能考虑测量一系列局部现象。于是人们设计出这样的函数：解释变量是反映局部现象的局部指数，被解释变量则是“综合指数”。<sup>①</sup>

这样的“综合指数”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从局部的构成指数中求得。最简单当然也最粗略的做法是计算出局部指标的平均值，作为综合指数。有时采取因素分析的方法，权重最大和解释力最强的因素被当作综合指数。

本文的目的不是设计能够对系统性的短缺或过剩进行测算的“综合指数”。我甚至都不愿意承认，通过对那些现象的简明思考肯定能得到这样的指数。这一工作需要反映市场状态的局部指标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我只是想强调，简单的加减并不适合计算那些系统性的复杂现象，它们在统计上很难追踪，有必要重新借鉴人们在处理不能由关键指标反映的其他综合现象时的经验。

在本章结尾，回顾对澄清概念和测算方法的讨论，我要再次强调概念和测算工具保持“中性”的重要性，它们既可以应用于过剩现象占据优势的市场，也适用于短缺现象占据优势的市场。在观察和测算市场的实际状态时，保持中性也是应该的，而不要受人们自己对某个经济制度的价值判断或爱憎情绪的影响。

## 4. 劳动力市场：不断产生过剩的机制

### 概念定义和测算方法

在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深入分析前，需要对概念和有关测算方法进行梳理。我希望沿用产品和服务市场采用的办法，因此，必须弄清楚本文的概念工具与统计指标之间存在何种持续联系。<sup>②</sup>

---

<sup>①</sup> 我在很早以前的研究中首次提到这点 (*Growth, Shortage and Efficiency*, Kornai, 1982)。后来，我和几位同事开始了一项重要研究，设计短缺的局部指标，最终测算了反映短缺的综合指数。体制转轨到来后，该项目随之结束，参与者转向了其他研究。匈牙利短缺经济的终结使这个研究失去了迫切性。直到现在思考过剩现象的综合测算时，我才想到应重新考虑。

<sup>②</sup> 国际上通用的定义参见：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10) 版。

在出现短缺现象的时候，情况相对简单。统计上报告的岗位空缺数就是劳动力短缺很好的反映，另外还报告有登记失业人数，显然是劳动力过剩的基础数据之一。然而，在劳动力市场过剩的情况下，量化分析需要做更多工作。

首先，根据本文的宗旨，我们要搞清楚需要测算哪些指标，并将其与现有的数据进行对比。我们的研究是针对某个经济体，针对给定时间内全国范围的情况。我们假定这个国家的总人口数为  $Q$ ，可以划分为四个群体：

(1) 有些居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就业。例如，儿童不能参加工作，只有 14 岁以上的人在统计上被视为有劳动能力的人。但经济史也表明，用法律来禁止童工是近代才出现的事情，许多落后国家今天仍然有大量儿童从事工作。有的居民由于身体或精神上的限制也不能参加工作。也需要注意，不能把官方承认的身体或精神障碍的所有情况都自动视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因为其中很多人实际上可以从事工作，只是缺乏必要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这其中包括那些由于疾病及身体或精神障碍而被工作排斥的老人。然而，并非所有的老人都不能工作，哪怕超过官方的劳动力统计所划定的最高工作年龄的人。例如，本文的作者在写作时尽管已年满 83 岁，仍然感觉自己完全有劳动能力。以上每个没有劳动能力的群体后面的补充内容表明，这些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疑问。我们把不能参加工作的居民人数用“ $N$ ”来表示。

(2) 第二个群体是指有劳动能力，但由于某些原因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去寻求就业机会的人。我们称这个群体的人为“不积极劳动力”，用“ $M$ ”表示。有各种原因影响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去寻找工作：

- 可以从其他途径获得生活来源（私人财富、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或者政府救济等）。

- 可以依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人员。

- 由于习惯而不愿意参加工作，对女性而言尤其突出。

- 女性就业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需要在她们的工作时间内解决看护问题，如托儿所、幼儿园、放学后的看护中心、老年人看护机构等。

- 在很长时间内寻求就业未获得成功，于是停止找工作。这些人被称为“沮丧的劳动力”（discouraged workers），在匈牙利的劳动统计中视为“消极失业者”（passive unemployed）。

这些打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重叠，很难说那些不去找工作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自愿还是因为环境的束缚，这个问题处于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心

理学的边缘地带。束缚可能是来自社会习俗（女性就应该照顾家庭的观念），也可能是缺乏工作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没有托儿所或费用太高）。那么，一个找工作的人最后放弃希望，“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边界点到底在哪里？

我得承认，以上两个群体，即没有劳动能力和有劳动能力但不积极参加工作的群体的分界线不见得是绝对的，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重大区别。

(3) 官方统计中记录的“登记失业者”，用“U”来表示。政府采用严格的标准来区分积极找工作的失业者和放弃找工作“消极失业者”，例如在接受询问前的四个星期里是否曾积极寻找工作等。很自然，这里存在主观臆断的危险，为什么非得是四个星期，而不是三个或五个星期呢？当然，这样的主观判断对任何统计记录过程都是难以避免的。

(4) 最后，官方统计中记录的在某个时点正在就业的群体，用“E”来表示。

在官方统计中，就业者和积极找工作的失业者之和被称为人口中的“经济活跃群体”，在英文的研究文献中称其为“劳动力”，其数量用“A”表示， $A = E + U$ 。人口中其他部分被称为“非劳动力”，用“B”表示， $B = Q - A$ 。

从本文的宗旨出发，过剩劳动力（用“T”表示）不但应该包括官方登记的失业者，也涉及人口中有劳动能力但不活跃的部分， $T = M + U$ 。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他们是“劳动力后备军”，在市场需要的时候可以被重新招募。在商业周期的上升阶段，市场会吸纳一部分过剩劳动力，不但会导致失业人数减少，还会让一些已经退出市场的人重新变得活跃起来。战争期间这个现象更加明显，所谓的后备军会被真正地动员起来，政府将强制人们参与生产性的活动。

官方统计在区分经济活跃人群与不活跃人群时有不同的划分标准，表4对这些概念上的区别做了更清楚的总结。

本文的概念框架在一个关键点上与官方的统计定义有所不同：政府并没有经常报告有劳动能力但不活跃的人群数量。在某些研究文献里，出现过“能参加工作的年龄段”的人群，通常是指14~74岁的人。但这样的分类与我的研究目的也不相同，因为在这个年龄段中的某些人绝对不会参加任何工作，而在74岁以上的人群中也有某些人有劳动能力，但不处于活跃状态。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假定用统计上可以观察的指标“b”代表经济上不活跃的人群所占的比例，并把它作为指标“m”的替代指标。“m”是指有劳动能力但经济上不活跃的人群所占的比例，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但在统计上缺乏数据。利用这个指标，我将在下面对一个特定国家的时期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寻找广泛适用的制度性特征。我的假设主要是基于对问题的逻辑思考，我推测不能参加工作的人数是相对固定的，主要取决于人口结构和健康指标。另一方面，在有劳动能力的人中间，是否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社会和经济因素。选择的结果非常清楚地反映在我建议的指标“M”中（目前没有做直接统计），但官方统计等于是在这个变量上面增加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数值（不能参加工作的人口数量“N”），反映的是其总数“B”， $B = N + M$ 。

表 4 本文所使用的概念与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使用的概念之间的联系

本文所使用的概念	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使用的概念	
	能参加工作的人口 (N)	
过剩劳动力 ( $T = M + U$ )	$\left\{ \begin{array}{l} \text{不能参加工作人口} \\ (M) \\ \text{失业人口} (U) \end{array} \right.$	经济上不活跃的人口 (B)
		经济上活跃的人口 ( $A = U + E$ )
短缺劳动力	就业人口 (E) 空缺岗位 (V)	空缺岗位 (V)
总人口 ( $Q = N + M + U + E$ )		总人口 (Q) ( $Q = B + A$ )
相对指标 (%)		相对指标 (%)
过剩比例 ( $t = T/Q$ )		经济上不活跃的人口比例 ( $b = B/Q$ )
有工作能力但经济上不活跃的人口比例 ( $m = M/Q$ )		经济上活跃的人口比例 ( $a = A/Q$ )

续表

本文所使用的概念	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使用的概念
失业率 ( $u = U/Q$ )	失业率 ( $u = U/Q$ ) 或 ( $u' = U/Q'$ )
短缺比例 ( $v = V/Q$ )	空缺岗位与失业人口之比 $v = V/Q$ , 或 $v' = V/W$ , $W$ 表示可供就业的岗位 总数

注：官方的劳动力市场统计通常会报告表中用括号标注的指标，如  $u'$  和  $v'$  等，不过  $u$  和  $v$  的数据也很容易推算出来。在测算劳动参与率时，官方的劳动力市场统计并没有将人口总数  $Q$  作为分母，而是采用的  $Q'$ ，代表 14~64 岁的人群中有劳动能力的人。

未来的一个研究任务将是在实证研究中区分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群与有劳动能力但不活跃的人群，这些数据是可以观测的，并没有什么测算上的困难。

## 体制转轨给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在本文开头，我提到波兰的一个场景，短缺经济时期的人们在食品商店门口排起长队，货架上空空荡荡。在今天的波兰和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货架上的商品已经琳琅满目，顾客们也对此习以为常。

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同样的变化。经济上较为发达的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在 1989 年以前遇到过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体制转轨则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大量工作岗位消失，失业长期持续。几年时间里，经济活跃的人数显著减少。在产品市场上，人们很容易接受过剩经济的出现，但在劳动力市场却很难，这一转变经常令人难以忍受。

对于我这样的东欧经济学家而言，亲身经历这样的变革迫使自己重新思考劳动力市场的状态与经济制度之间存在的关系。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冷漠态度令人遗憾，我甚至认为，没有哪位关注劳动力市场的西方学者在探寻失业原因的时候曾试图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进行比较研

究。西方的学术会议讨论者认为，即便在所谓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会存在失业，这是不需要证明的。但直到今天，每当我读到经常被引用的“自然失业率”的说法时，仍然不禁会感到烦心甚至愤怒。<sup>①</sup> 自然失业率？由森林、动物、岩石和地震这些成分组成的大自然曾经宣布过，失业是应该存在的吗？数十年来，我一直在尖锐地批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朋友还是对手都应该注意到，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存在长期的劳动力短缺，而不是长期失业和大量的劳动力过剩。

接下来我想用一些数据来描述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经历的剧变。不幸的是，没有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反映体制转轨前的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与之后的 20 多年用同样的测算指标进行对比。不过，从这些图示和表格中依然能明显看到变化的剧烈程度（图 6 来自 Kornai，1992，第 209 页）。

图 7 反映的是图 6 中的指标在 2009 年的水平。

请注意图 6 中的劳动参与率，与类似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图中用虚线包围的部分）的水平都更高。

对比图 6 和图 7 则可以看到体制转轨带来的显著变化：用虚线包围的小集团被打破了，前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的劳动参与率指标不再显得特别突出（它们目前的状况用小圆圈代表）。可以看到，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已混合在一起，基本上与经济发展阶段类似的资本主义国家接近，还有个别国家的劳动参与率偏低。

不幸的是，以前没有做过覆盖多个国家的综合调查，以测算当时的劳动力短缺程度。至于其他数据，这里找到一个基于波兰的调查的图表（来自 Kornai，1992，第 242 页）。图 8 的时间序列终止于 1988 年，该曲线显示了空缺岗位相对于失业人数的比例。以对数距离表示的纵轴表明，在 1988 年，相对于每位找工作的人，有 86 个以上的空缺岗位。

表 5 显示的是经济不活跃人口、失业人口以及空缺岗位的时间序列，包括若干前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当前的情况。

---

<sup>①</sup> 请注意，这里的议论并不针对“自然失业率”理论的内容。引起我烦恼的并不是研究本身，而是这个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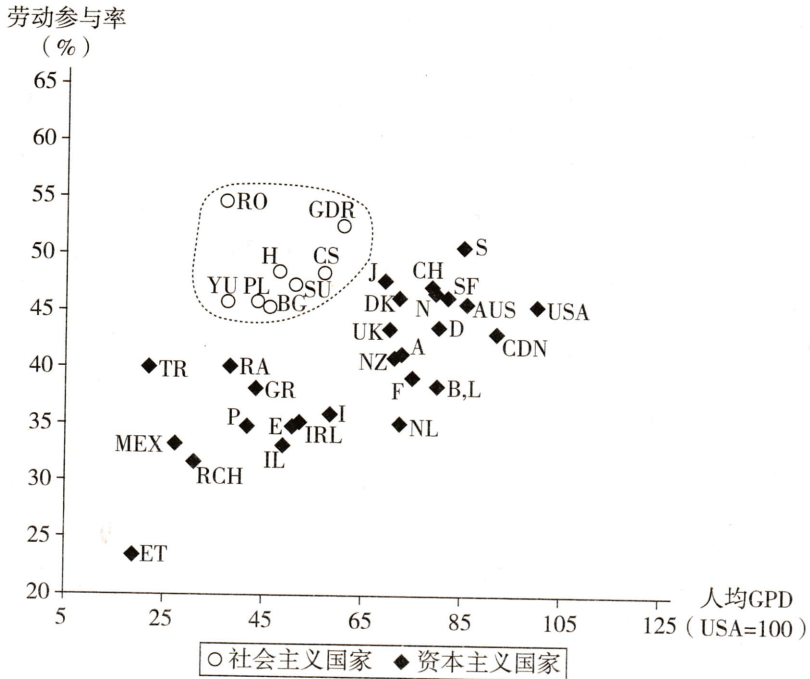


图6 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1980年）

注：图中包含的国家包括（按人均GDP为序），埃及（ET）、土耳其（TR）、墨西哥（MEX）、智利（RCH）、罗马尼亚（RO）、南斯拉夫（YU）、阿根廷（RA）、葡萄牙（P）、希腊（GR）、波兰（PL）、保加利亚（BG）、匈牙利（H）、以色列（IC）、苏联（SU）、西班牙（E）、爱尔兰（IRL）、捷克斯洛伐克（CS）、意大利（I）、民主德国（GDR）、日本（J）、英国（UK）、新西兰（N）、丹麦（DK）、奥地利（A）、荷兰（NL）、法国（F）、瑞士（CH）、挪威（W）、比利时（B）、卢森堡（L）、联邦德国（D）、芬兰（SF）、瑞典（S）、澳大利亚（AUS）、加拿大（CDN）和美国（USA）。社会主义国家用圆圈表示，资本主义国家用菱形表示。纵轴表示的劳动参与率的计算方法是：经济活跃人口与14~84岁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之比。

资料来源：Kornai（1993，第209页）。科洛（János Köllö）负责收集数据并绘制图示，人均GDP的数据来自一篇论文（Éva Ehrlich，1985，第100页）。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GDP和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来自ONU编辑的一本年鉴，社会主义国家的数据来自克姆孔（Comecon）编辑的一本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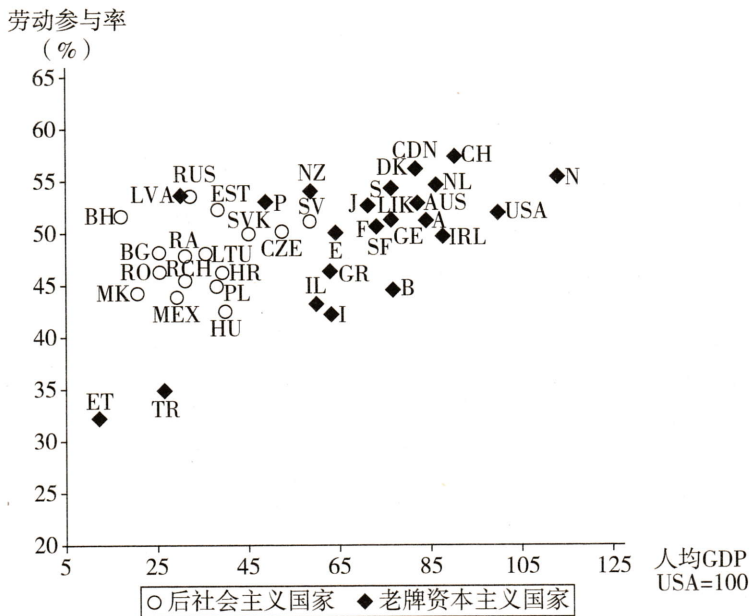


图7 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 (2009)

注：图中包含的国家包括（按人均GDP为序），埃及（ET）、波黑（BH）、马其顿（MK）、保加利亚（BG）、罗马尼亚（RD）、土耳其（TR）、墨西哥（MEX）、拉脱维亚（LVA）、智利（RCH）、阿根廷（RA）、俄罗斯（RUS）、立陶宛（LTU）、爱沙尼亚（EST）、克罗地亚（HR）、波兰（PL）、匈牙利（H）、斯洛伐克（SVK）、葡萄牙（P）、捷克（CZE）、斯洛文尼亚（VS）、新西兰（NZ）、以色列（IL）、希腊（GR）、意大利（I）、西班牙（E）、法国（F）、日本（J）、芬兰（SF）、德国（GE）、英国（UK）、瑞典（S）、丹麦（DK）、比利时（B）、澳大利亚（AUS）、加拿大（CDN）、奥地利（A）、荷兰（NL）、爱尔兰（IRL）、瑞士（S）、美国（USA）和挪威（N）。后社会主义国家用圆圈表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用菱形表示。纵轴表示的劳动参与率的计算方法是：经济活跃人口与14~84岁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之比。卢森堡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纳入本图。

资料来源：人均GDP来自World Bank（2010）；劳动参与率的计算数据来自ILO（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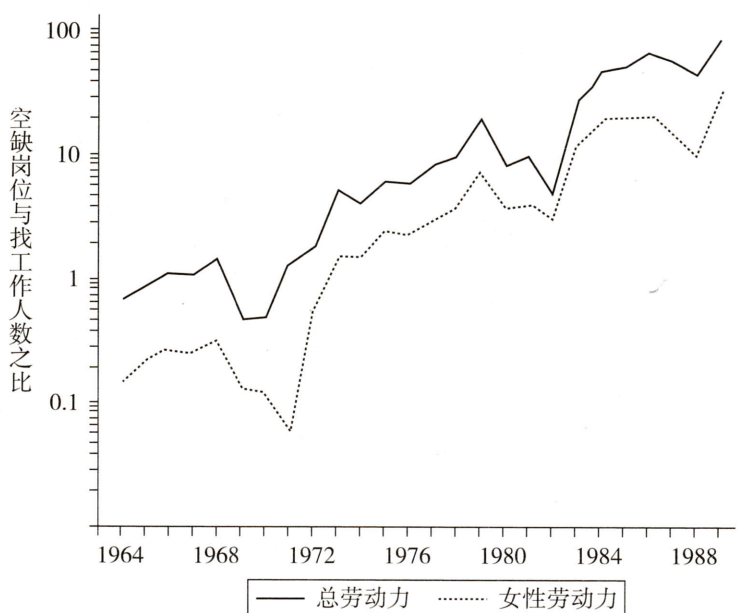


图8 相对于每位找工作的人的空缺岗位数 (1964~1988年)

资料来源：该图来自 Kornai (1993, 第 215 页)。由 János Köllönd 基于 Fall-enbuchl (1982, 第 33 页) 和 R. Holzmann (1990, 第 6 页) 的数据绘制而成。

表5 东欧国家的经济不活跃人口、失业人口以及空缺岗位 (1989~2008年)

年份	捷克			爱沙尼亚		波兰			拉脱维亚		
	<i>b</i>	<i>u</i>	<i>v</i>	<i>b</i>	<i>u</i>	<i>b</i>	<i>u</i>	<i>v</i>	<i>b</i>	<i>u</i>	<i>v</i>
1989	53.34			47.10	0.30	54.05		0.12	46.49		
1990	53.05		0.40	47.89	0.34	54.45		0.12	47.39		
1991	52.18		0.75	48.73	0.78	54.77		0.08	48.35		
1995	50.77	2.02	0.96	52.50	4.73	56.08	5.90	0.08	52.72		
2000	50.47	4.45	0.57	53.30	6.57	55.62	7.25	0.03	55.04	6.62	
2005	49.98	4.02	0.83	52.01	3.87	54.75	7.97	0.12	52.18	4.32	0.53
2006	49.96	3.63	1.21	50.58	3.01	55.18	6.14	0.17	50.88	3.50	0.84
2007	50.22	2.69	1.36	50.25	2.38	55.06	4.25	0.17	49.72	3.13	0.89
2008	50.40	2.23	4.46	49.47	2.86	54.35	3.18	0.10	38.53	4.01	0.47

续表

	立陶宛			匈牙利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1989	49.30			56.14			51.69		59.02	
1990	49.65			56.38			51.50		58.88	
1991	50.01			56.83		0.21	50.71		58.56	
1995	51.63			59.96	4.03	0.37	53.87	6.05	52.63	3.46
2000	52.98	7.68		59.49	2.62	0.42	52.13	9.03	52.68	3.07
2005	53.53	3.89	0.23	57.91	3.00	0.41	50.63	7.94	50.40	2.85
2006	53.88	2.64	0.58	57.46	3.15	0.30	50.67	6.55	50.27	2.94
2007	53.42	2.06	0.58	57.46	3.15	0.30	50.67	6.55	50.27	2.94
2008	52.92	2.84	0.67	57.75	3.29	0.21	50.14	4.4	49.8	2.26

注：三个指标都是根据劳动力市场指标和总人口计算得出的。根据表4的定义，表中的三列包含每个国家的下列指标：经济不活跃人口比例， $b = B/Q$ ；失业率， $u = U/Q$ ；空缺岗位率， $v = V/Q$ 。这三个劳动力市场指标都根据总人口数进行了调整，以进行更好的比较。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没有官方的空缺岗位统计。表中只显示了整个时间序列数据的部分观测值。

资料来源：经济不活跃人口数、失业人口数和总人口数来自 ILO (2010)；空缺岗位数来自 OECD (2010)；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关于空缺岗位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自 Latvijas Statistika (2010) 和 Statistikos Departamentas (2010)。

该表清晰地反映了下面的变化过程：

- 体制转轨之后出现了劳动参与率的剧烈下降，具有劳动能力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增加，可能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人们发现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失望情绪蔓延。

- 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在体制转轨前没有持续进行失业统计，只是零星地做过几次。<sup>①</sup> 不过，这个指标在 1989 ~ 1990 年之后快速提高，达到与西方国家接近的水平。

- 我已介绍过所能找到的反映体制转轨前劳动力短缺状况的一个指标。即使在体制转轨后最严峻的年份里，空缺岗位仍然会出现，但表5中反映出来的空缺岗位数已变得很少：劳动力市场的短缺现象不再会密集出现了。

<sup>①</sup> 这是指工厂之外的失业，而非“工厂大门内的失业”，后者指有的员工拥有正式的雇佣合同，却并不认真工作的情况。

## 凯恩斯式失业

为什么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劳动力短缺，而且这种现象会长期维持？这不是因为执政当局希望执行“完全就业”的政策。在这个现象背后不存在统治集团的特殊决策，或者是作为中央计委瞄准的目标。劳动力的短缺源自这个体制内在的特征和倾向。

我这里用非常简化的形式描述一下自己以前的研究所做的分析（特别是《社会主义体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其领导人深受扩张冲动（凯恩斯的动物精神的一种表现）的影响，对投资有着无法满足的胃口：企业的经理人希望完成尽可能多的投资，而毫不计较成本。他们对投资的过度偏爱是由于缺乏硬性的预算约束。尽管负责投资资源配置的官僚体系会形成某种形式的制约，还是会发生过度投资，投资失败造成的损失则由政府来承担。

这样的投资饥渴已几乎足以解释：增长和上级机构促成的增长冲动迟早会吞噬全部劳动力储备。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投资增长可以依赖从农业向工业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还有让家庭妇女更多走向就业，但这些储备劳动力迟早会被全部吸干，增长最终会遭遇劳动力瓶颈。

在经典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政府对价格和工资实行严格控制。劳动力市场的紧张情况不会像市场经济里那样造成显著的通货膨胀效应。虽然价格和工资也会上涨，但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影响，企业对成本的敏感度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同行。

同时，创新的推进则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劳动生产率陷入停滞，或者仅能出现间歇性的增长。扩张冲动要求增加劳动力，可是劳动力的经济活跃度存在社会可以忍受的一个极限。于是，劳动力短缺成为了大规模的长期现象。<sup>①</sup>

这与凯恩斯所描述的失业机制形成了镜像或反例（但稍后我会谈到，准

---

<sup>①</sup> 事实上，“长期”这个说法有疑问，因为劳动力短缺情况下的经济增长并未维持很长时间，到可以使用“长期”一词的时候，原有的体制已走向崩溃。这其实也是旧体制崩溃的原因之一，劳动力储备的枯竭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不能实现创新和生产率的快速提高，自然就导致停滞。

确地说并不是反例)。在社会主义国家,动物精神及其带来的宏观需求膨胀是由如下因素导致的:(1) 国有制;(2) 政府支付成本,预算约束软化;(3) 对价格和工资进行管制。如果这三个关键因素被历史进程改变,如下因素占据主导地位:(1) 私有制;(2) 政府拒绝扶持亏损项目,强化预算约束;(3) 价格和工资市场化,那么生产商虽然还是希望生产更多产品,也希望有更多的劳动力来进行生产,但他们会遇到需求和财务上的约束,这些约束将限制他们无限度地把生产扩大到劳动力供给的极限。<sup>①</sup> 即使剩余劳动力增加,也会在一时间段的迟滞后才能反映到雇员的工资水平上,工资依然具有粘性(参见 Blanchard 和 Gali, 2007)。

在使用“镜像”这一比喻的时候,我同时注意到它并不十分确切,至少从学说史的角度看是如此。凯恩斯的理论把失业作为周期现象: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导致需求不足,从而引起就业率下滑。而我的分析是对长期现象的对比: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表现为长期劳动力短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存在长期劳动力过剩。即使在经济上升期,大多数西方国家依然存在劳动力过剩:积极寻找工作但未能得到岗位的劳动力,以及有劳动能力却没有登记为失业的人,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可能让他们重新回到就业中。凯恩斯的理论有助于理解这一长期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而我的结论强调劳动力过剩存在长期性、持续性的特点,与他的讨论对象并不一致。

还有其他机制也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过剩现象的产生和延续发挥了作用。有些机制同时发挥作用,有些存在重叠、相互影响。<sup>②</sup> 这些解释机制将在稍后进行介绍。恐怕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其中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机制正是凯恩斯式失业(Keynesian unemployment)产生的原因,它表现为一种不变的作用方向:失业在逐渐增加,经济活跃人群的数量在减少。当然,这种作用的加速或减速会受到其他因素(如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劳动力过剩增加带来的效应显然被需求和预算约束的放松所缓解了。

---

<sup>①</sup> 参见非均衡模型: Benassy (1982) 和 Malinvaud (1977)。

<sup>②</sup> 有关就业、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成果很多。本文并不试图对其进行总结或者挑选,文中提到的研究都是与本文的主题直接相关的。

## 结构性失业

所谓结构性失业是深藏于资本主义制度内的一种机制导致的。<sup>①</sup> 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和创新过程（第2章详细讨论的创造性破坏）在不断产生新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在不断消灭旧的岗位。但这两种运动过程并不完全同步。在某个地方失去工作的人未必能找到在其他地方新创造的工作，他们也未必符合新岗位的要求。

产品中应用的新技术要求掌握某些特殊技能，员工们目前掌握的技能在许多方面可能不符合要求，于是，有些技能过时的员工将成为过剩劳动力。适应和掌握新技能需要花费时间，在此期间你可能找不到工作。还有，有些雇主也不能适应新技术，同样有可能退出劳动力队伍。

经济的运动和创造性破坏持续施压，迫使老企业退出市场，这也会造成就业岗位的减少。虽然新加入的企业在不断涌现，它们需要新的劳动力，但这样的需求不见得能与新的剩余劳动力的供给相匹配。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常见的一个是用资本密集度更高的设备来替代劳动力。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生产也会大幅扩张，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不过，这两方面的变化可能出现几种不协调，扩张的出现可能晚于过剩的产生，二者在地理分布上也可能出现差异。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每个国家内部的农业转型。各国的村庄里都会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却不能足够快地吸收他们。

劳动力需求的重组不但出现在国家内部，也发生在各国之间。随着某些落后国家发展的提速（如目前的中国和印度），这些地区的廉价出口商品对发达国家的许多厂商形成了挤压。中国和印度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德国和比利时的员工则在失去工作。这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于是，我们得出了本文最重要的结论之一：资本主义经济越有活力，这个制度的优点越是突出，结构性失业问题就越严重，制度上的不利倾向也越明显。

活力与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但必须补充说，技术进步的方向在事前往往无法预知。1930年代，当西方国家忙于建设钢铁强国的时候，谁会预见到半个世纪之后将出现一个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世界，需要何种

---

<sup>①</sup> 对于“结构性”的理解并没有一致看法。有人还把“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视为几乎相同的概念。它们没有严格的分界线。在本文中，我把“结构性”失业理解为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有关的现象，涉及产品、技术、部门、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资源的重新配置。

不同的专业技能？谁又曾预见我们今天看到的生产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重组？资本主义的辉煌、成就与快速扩张，同时又伴随着千百万人失去自己的工作岗位，仍然在岗的人也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 不匹配调整、摩擦性失业与需求

劳动力过剩和失业的出现还来自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摩擦。寻找岗位的劳动力的技能与空缺岗位需要的技能往往存在差异。在有些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克服的。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劳动力的卖方和买方能够实现匹配，却没有机会取得联系，这方面的问题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流情况密切相关。失业者在寻找合适的岗位，雇主在寻找合适的员工，这是个费时费力的过程，在此期间，寻找工作的人没有从事职业活动（有关摩擦性失业和寻找理论的研究，可参见 Kornai, 1970; Phelps 等人, 1970; Diamond, 1982; Pissarides, 2000, 第5章和第6章）。

各种社会经济制度下都会出现此类不匹配现象，无论劳动力市场是表现为短缺还是过剩。适应性摩擦是一种注定要产生摩擦性失业的运动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并不是某种制度特有的现象。然而，这样的机制仍然会受到外部环境，即市场整体状况的影响，下文还将详述。

上节分析的结构性失业和由于信息缺乏与搜索时间造成的摩擦性失业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交叉。如果市场双方都拥有完善的信息，包括对未来发展的准确预测，结构性变革带来的不匹配现象就会减少。反之亦然：如果结构性变化（技术、产业构成和地理分布等）停止，寻找工作与实现供需匹配也将变得更容易。

在中央高度控制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技术革新速度很慢，以上两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但主要问题还是由于技术发展的停滞造成的。而对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即使市场双方的信息都非常通畅，活跃的技术进步本身还是会造大量失业。因此，我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而信息问题所导致的摩擦性失业则不同。<sup>①</sup>

<sup>①</sup> 由于信息不畅导致的摩擦在两种制度下都存在，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对于失误所造成的损失会有更直接的感受。效率较低的社会主义企业在亏损状态下继续运转（软预算约束），雇员受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影响较小，因为工资差距普遍较小，在他们愿意的时候，也更容易换工作。

上文讨论的存在部分重叠的两个现象——持续的结构重组和匹配所导致的摩擦——使劳动力市场上同时出现了短缺和过剩现象。两种现象的同时发生在第2章和第3章也曾提到过几次，有关产品、服务和产能的配置。这里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上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表6的统计数据中得到更多启发，其中三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还以图示的形式表现为图9。

表6 经济不活跃人口的比例、失业率和空缺岗位率的国际比较（1989~2008年）

年份	日本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美国		
	<i>b</i>	<i>u</i>	<i>v</i>	<i>b</i>	<i>u</i>	<i>v</i>	<i>b</i>	<i>u</i>	<i>v</i>	<i>b</i>	<i>u</i>	<i>v</i>	<i>b</i>	<i>u</i>	<i>v</i>
1980	54.07	0.98	0.32	62.87	4.08	0.03	47.97	1.16	0.36	53.880	0.00	0.17	51.96	3.33	
1982	53.60	1.12	0.31	62.70	5.69	0.05	47.56	1.85	0.25	53.62	0.00	0.26	51.47	4.57	
1984	53.09	1.32	0.33	62.37	7.29	0.10	47.21	1.85	0.44	52.90	5.15	0.29	50.96	3.58	
1986	52.86	1.37	0.36	62.95	7.72	0.12	46.77	1.52	0.55	51.56	5.60	0.41	50.23	3.39	
1988	52.34	1.27	0.51	61.04	7.51	0.15	46.46	1.01	0.59	50.80	4.46	0.39	49.82	2.69	
1990	51.19	1.09	0.52	60.28	6.46	0.11	46.01	0.99	0.22	50.14	3.51	0.21	49.72	2.76	
1992	50.27	1.14	0.38	59.83	7.39	0.05	48.03	3.00	0.10	50.99	4.85	0.22	49.94	3.68	
1994	50.20	1.54	0.38	58.86	9.88	0.07	49.59	4.82	0.17	51.62	4.74	0.32	49.99	2.99	
1996	50.04	1.80	0.44	58.22	9.26	0.13	49.77	5.00	0.18	51.72	4.03	0.49	49.73	2.64	
1998	50.03	2.19	0.39	57.13	8.00	0.36	50.67	4.15	0.29	51.60	3.06	0.60	49.32	2.21	
2000	50.62	2.55	0.47	55.42	6.18	0.29	50.62	2.95	0.31	51.05	2.73	0.72	49.22	1.98	
2002	51.17	2.83	0.53	54.78	5.05	0.36	49.54	2.67	0.28	50.95	2.48	1.02	49.61	2.85	1.05
2004	51.72	2.44	0.65	52.98	5.21		49.33	3.32	0.25	50.69	2.27	1.05	5.08	2.72	1.10
2006	51.91	2.14	0.63	51.42	4.22		48.34	3.64	0.46	50.07	2.71	1.00	49.91	2.29	1.33
2008	51.97	2.08	0.41	50.43	5.82		47.90	3.32	0.29	49.90	2.86	1.04	50.06	2.86	1.07

注：三个指标都是根据劳动力市场指标和总人口计算得出的。根据表4的定义，表中的三列包含每个国家的下列指标：经济不活跃人口比例， $b = B/Q$ ；失业率， $u = U/Q$ ；空缺岗位率， $v = V/Q$ 。这三个劳动力市场指标都根据总人口数进行了调整，以进行更好的比较。表中只显示了整个时间序列数据的部分观测值。

资料来源：经济不活跃人口数、失业人口数和总人口数来自 ILO (2010)；空缺岗位数来自 OECD (2010)；英国和美国关于空缺岗位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自 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0) 和 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0)。

可以看到，表6和图9都支持上文的论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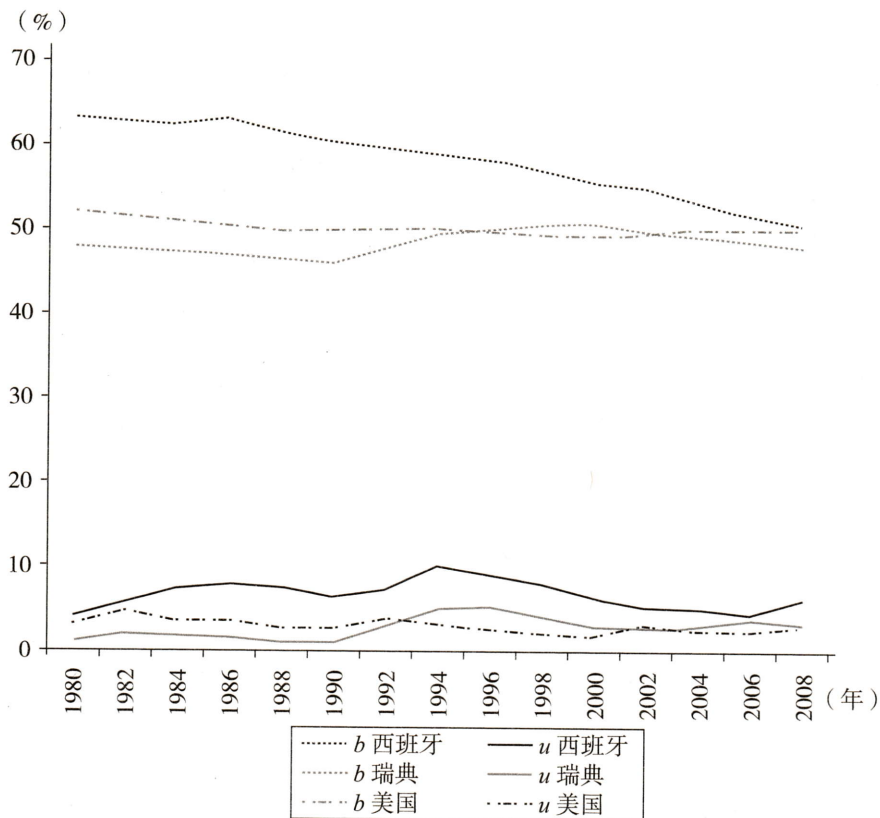


图9 三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不活跃人口比例和失业率 (1989~2009年)

注：根据表4的定义，西班牙、瑞典和美国的指标b和u的计算办法如下：经济不活跃人口比例， $b = B/Q$ ；失业率， $u = U/Q$ 。

资料来源：同表6。

(1) 短缺和过剩到处并存。

(2) 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过剩现象远比短缺现象普遍。<sup>①</sup> 瑞典等率先建立福利制度、试图降低失业率和增加经济活跃人群的国家也同样如此。

<sup>①</sup> 图6清楚地显示了影响经济参与率的两个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的影响。表5的时间序列数据生动地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影响。除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改变外，还有其他同时发生的因素在影响若干国家的参与率（经济不活跃人群的比例下降）。因此，如果不做补充分析，不能简单地把图6和表5的数据进行对比。

## 效率工资

另外一组导致持续产生失业的现象，与效率工资这一关键概念有关，其含义是雇主愿意向雇员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效率工资的出现不是雇主的利他主义的表现，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它受到几种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对怠工的预防。<sup>①</sup> 如果你要给每位雇员都配备一名监工，那是非常高的成本。因此，有必要把进行监督的成本与提供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成本做个比较，后者在很多情况下更为合算，尤其是在工作业绩难以量化、产品质量十分重要的情况下。某种工作的智力投入越多，对员工的智力表现的期望越高，就越不适合采用计件工资或计时工资来激励，对怠工现象的监督也越困难。相反，必须设计内在的激励机制，这就是效率工资所能发挥的作用。雇主提供的工资承诺如果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他在劳动力市场就能更容易地找到合适的职员。同时，雇员一旦获得了报酬较高的职位，往往也希望努力保留下去。

如果员工不仅担心失去高工资，还担心彻底丢掉工作，他们会更加努力工作，使效率工资的作用更为显著。确保劳动力处于长期过剩状态，符合所有雇主的共同利益，因为这将作为所有职场都能使用的武器。所以我们看到，即使那些最开明和最有社会责任感的雇主对于大力减少失业也不是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当然不希望劳动力市场的形势逆转，出现短缺。于是，对于丢掉饭碗的担忧会时刻萦绕所有的雇员。这种情况甚至还反映在夏皮罗与斯蒂格利茨的一篇著名论文的标题上：《以均衡失业作为约束员工的工具》。<sup>②</sup> 上面的论述听起来非常像“马克思主义”，但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在宏观经济学中，也存在著名的反对过于激进地消灭失业，尤其是反对“过度就业”的论点。其逻辑是，如果增加工资的动力过强，那么对劳动力的

---

<sup>①</sup> 效率工资理论的开创论文参见 Shapiro 和 Stiglitz (1984)，还有很多描述和因果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 Milgrom 和 Roberts (1992，第 165 ~ 195 页)。

<sup>②</sup> 该机制发挥作用的时候，并不需要雇主们都意识到维持失业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如果劳动力市场很紧张，就业率接近 100%，雇主们需要支付的效率工资将上升到无法承受的水平。当个别雇员在自己的工资谈判中提高要求时，他们也会在无意中把就业率压低到 100% 以下。

过度需求将推高成本和价格，引发螺旋式通货膨胀。这是一个合理的说法。<sup>①</sup>然而它并不能否定其他机制的作用：维持失业现象，以此作为对劳动力的约束，符合雇主们的共同利益。

在讨论效率工资理论的时候，那些曾读过马克思的“产业工人后备军”理论和《资本论》第一部的其他内容的人应该感觉很熟悉（*Capital*, Vol. I, 1978, 第25章）。后备军或者说过剩劳动力的存在的确有助于压低工资，加强劳动纪律，在雇主们希望扩大生产的时候提供可用的人力资源。我也不否认，效率工资理论与现代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思想有类似之处，他们认为资本家通过支付更高的薪水，收买了一批“工人贵族”的效忠。<sup>②</sup>学术道德要求我们，即便那些极不情愿甚至感觉耻辱的经济学家，也要承认这种思想上的亲缘关系（实际上还是首创权）。

劳动力过剩还有一个有利的影响：它的存在使调整变得更有弹性。如果劳动力的动员更加容易，生产的新建或改组也会更加方便。当然，这只是一种技术专家式的视角。闲置的产能和存货毕竟是死的，存放起来不会有多大损失，但劳动力的储备是人，让他们长期等待是一种煎熬。

我们需要暂停一下，回顾第4章的第1节所阐述的内容。在达到中等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中，出现了长期劳动力短缺，包括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普遍认识到这种外部环境对劳动纪律的侵蚀。员工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即使不努力工作甚至完全消极怠工，他们也不会被解雇。就算被解雇，他们也能轻易地找到另外的工作。所有的经理人和监工都在不断地抱怨这种现象。许多员工出于基本的诚实品质和对工作的认同仍在忠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在有些地方，如果能有效完成任务，还可能获得物质奖励。然而他们从来不会被失业的幽灵困扰。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环境对雇员也有一定好处。参与就业给人以安全感，有保障的就业就更是如此。从劳动力短缺跳跃到劳动力过剩对社会整体而言是有利有弊，而且这些利弊在各个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是不均等的。

现在做个小结。持续地产生劳动力过剩、长期失业和就业不足是资本主义制度令人痛苦的固有特征，它给失业者带来了物质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羞辱，

---

<sup>①</sup> 这一关系是“自然失业率”理论的核心，其开创性研究参见 Phelps (1968) 和 Friedman (1968)，在任何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介绍。

<sup>②</sup> “工人贵族”这一说法由巴枯宁首创，考茨基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有借用。

也给在岗者带来了失业的担忧。雇用哪些人和解雇哪些人的决定，经常隐秘地掺杂着种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歧视。

一方面要接受和支持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求或承诺实现“充分就业”，那是相当不切实际的。在政坛和研究领域，许多人都想玩弄“充分”这个词，其实毫无意义。对我而言，只有100%才是真正的充分，而不是97%或93%。不仅是严谨的研究人员应该这样理解，许多利害关系的人同样如此。一个外科手术只有在从无失败的时候，其成功率才可能是100%。医生或研究人员可以根据统计数据的结果宣布，97%的治愈率就能被认为是“绝对有效”，对药品而言已经是很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事实上，剩下的那3%的人却没有获得成功的治疗，将长期患病、残疾甚至走向死亡。

对于失业率来说，下降到3%可以被认为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巨大成就，但身陷3%之中的人们却不会因为“结构性失业”导致他们没有工作的说法而感到安慰。我们有可能也应该制定出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体系，来降低失业率，使其更能令人接受。这是一个现实的任务，值得为之奋斗。但我认为，宣扬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能取得“充分”就业的成绩，都是在误导。

## 5. 对实证描述和因果关系分析的总结

### “均衡”概念的实用性

阅读本文的经济学家们现在可能已意识到，我一直在尽量避免使用“均衡”这个术语。提到它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我在引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

很少有其他术语像“均衡”那样引起极大的混乱。不同的学派对这个术语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判断。当一个经济体或其中的某个部分实现均衡时，有些学派感到欢欣鼓舞，有些无动于衷，还有些甚至深感惋惜。这样的讨论可以残酷地称为“聋子间的对话”，因为大家的阐述都不理会其他人的观点，或者会对“均衡”、“非均衡”、“反均衡”和“不均衡”（equilibrium, disequilibrium, antiequilibrium and non-equilibrium）等词汇发生严重的误解。

我对此不抱任何幻想。我不相信本文及其对均衡问题的有限思考能够使上

述的概念混沌恢复秩序。如果读者们能清楚理解我本人在写作时对这个概念的解释，以及我如何看待其实用性，那我就很满足了。<sup>①</sup>

“均衡”一词的拉丁起源来自“天平”：如果两边的质量相同，天平虽然可能发生摇摆，但最终会静止下来。这就产生了均衡一词的通俗含义：在一个系统中，作用力方向相反而大小相同，使得整个系统保持静止。这样一个广泛的含义适合用来描述各种系统的状态，没有什么疑义。

在数学模型中，均衡的概念可以用严格的条件来描述。我们不需要去寻找一种普遍的定义。在许多模型中，均衡的概念可以被解释和定义，还可以发现均衡的某些特征。可是，不同的模型所采用的是不同的定义。在分析动态系统的数学模型中，有可能发现“稳定状态”或者“固定点”，它们是与均衡类似的概念。但是也存在一些数学模型，不可能在其中给出均衡的定义。

让我们回到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案例。均衡的概念被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们广泛采用，但我们还是主要看经济学领域。在现实社会的经济系统中，某些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均衡的特征（完美或接近完美的均衡）。例如，一个国家或企业的账本会显示，在给定时期内，收入等于支出；一家仓库的发货可能正好等于进货等。

我们把问题聚焦：生产和消费的协调、买方和卖方的协调以及资源的配置，是属于什么情况？执行协调和配置的特定机能的市場表现为什么状态？那里是否存在某种均衡？我的回答是响亮的：不存在。在现实的市場中，通过现实的协调和配置机制的运动，没有也不可能有某种稳定的状态。竞争和冲突的各种力量都在持续变化之中。事实上，变化才是本质。如果偶然出现静止，那也是无聊和无趣的事情。

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做这种阐述的经济学家。这是奥地利学派的核心论点之一，从米赛斯和哈耶克到柯兹纳，再到今天的继承者们。<sup>②</sup> 尽管在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这个极其关键的论点上，我毫无保留地和他们站在一起。

---

<sup>①</sup> 我强调说“本人在写作时”，也是一种自我调侃。因为我得承认，我自己对这个重要概念的认识也多次发生改变，如果这会让读者感到困惑的话，那只能表示遗憾。本文不会讲述我本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也许以后会有机会。这里只是介绍我目前的认识。

<sup>②</sup> 奥地利学派的多篇开创性论文都非常重视这方面的思想，如：Hayek (1948)，Kirzner (1973)，Lachmann (1976)，Lavoie (1985)，Cowan 和 Rizzo (1996)。

利用家庭和市场上使用的老式天平，把食品放在一端的秤盘上，把砝码放在另一端，天平会在一段时间内来回摇摆。假如放置的砝码质量合适，摩擦力会很快让摆动缓慢下来，使天平恢复静止。此时就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均衡，因为摆动的停止表明两端的质量相同。然而，经济生活的现实与天平有着本质的不同。上文的第2章曾试图阐述这个问题，技术进步在持续发生，今年的供给与今天的需求不但与去年或者10年以前的情况在数量上不同，更存在质量上的差异。如果必须找出哪位学者的观点来补充奥地利学派有关市场的永恒变化的论述，那应该是熊彼特。持续的创新过程还意味着“市场均衡”这个词很难得到解释。如果采用实证研究而非规范研究的办法，那问题就不在于“市场均衡”是否有用。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中都不存在均衡，也永远不可能出现。<sup>①</sup>

如果这个论点成立，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区分下面这些不同说法：“完全必要”或均衡的产能储备，和“过剩”的产能储备；完全必要或均衡的存货，和过剩的存货；完全必要或均衡的劳动力储备，和过剩的劳动力储备。这样做不是无知，我不采用如此的区分是因为它们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

但这并不意味着均衡的概念在对现实市场的实证分析中毫无作用。这个概念可以用于假想实验，作为参照点。请看下面两个例子。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借鉴瓦尔拉斯、阿罗和德布鲁以及他们的学术继承者们有关瓦尔拉斯均衡的决定条件的理论。瓦尔拉斯均衡的实现条件包括：在一个买方和卖方都掌握完全信息的市场，未来可以预测，任何调整都在瞬间完成，没有任何摩擦等。然后，我们可以分析现实的市场环境与这样的理想状态有哪些差距。

另一个例子是纽曼设计的增长模型，其中不存在技术进步，每个部分都以同样的速度在均衡路径上增长。我们可以观察，这种假设与每个经济体的实际增长表现有哪些不同，为什么有的产业会消失，有的会出现，为什么各个部分的比例在不停地发生变化。不过，一个抽象的数学模型只是针对虚拟世界的分

<sup>①</sup> 很明显，卡尔多正是因此认为，均衡经济学理论“与讨论的问题无关”（Kaldor, 1972）。我对此是认同的，但我还必须指出，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卡尔多当时被很多理论上的偏离激怒，以致丧失了客观判断，他拒绝承认有关均衡的数学模型可以在理论研究中发挥作用。卡尔多愤怒地撰写文章时所犯的错误，我自己也遇到过。我在自传里描述过当时的观点并进行了自我批评（Kornai, 2006, Chapter 10）。

析工具，纽曼均衡路径当然不能被视为对现实经济增长的描述。

我感觉有疑问的地方是，均衡这个概念被描述为系统成员处于“静止”状态。按照这一思路，如果成员们出于自身的利益，不再愿意离开均衡点，这个系统就达到了均衡。然而，该逻辑很容易导致概念上的同义反复。<sup>①</sup>

例如，不幸处于短缺经济中的买家没有办法在自己需要的时候、需要的地点买到称心如意的某种商品，最后，作为不得已的调整，他们购买了能够找到的某种替代品。他们对此只能自我安慰，因为大家都知道继续寻找的结果可能更糟。这种状态也可以被命名为一种静止状态、均衡状态，但这个术语却容易造成误导，而且是彻底的颠倒。

按照同样的思路，我对“失业均衡”这个概念也深感不安。我承认，在模型框架内，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所有参与者都无可奈何的失业均衡状态，但如果那些本来愿意从事工作，只是由于某种就业障碍（上一章有过详细讨论）而未能如愿的人，又怎能高兴起来？人们担心更坏的遭遇，从而接受某种结果，把这当成静止状态或均衡的定义，其心理和社会心理基础是相当脆弱的。

从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到今天的主流学派，在所有经济学家眼里，高度重视均衡概念的定义和地位的榜样就是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但在我看来，如果需要从自然科学那里寻找灵感，那我愿与其他某些经济学家一样选择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自然选择和生物进化与市场经济中的增长和技术进步有着发人深思的相似性。

每个新企业和新发明都可以视为随机产生的变异。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组织方式和新的企业机构都在为生存而战。有些能获得成功，不但存活下来，还能繁衍壮大，发明被广泛采用，企业扩充规模。有些变异则时运不济，发明没有被实际应用，企业倒闭关门。这也是一种自然选择。生与死的决定不是来自一个具有理性、远见和无上智慧的中央意志，而是取决于关键的生存力指标。运气也起着很大作用。总体而言，这个机制运转良好，但也并非一贯如此：有些失败的企业本来很有价值，而有些存活时间很长的企业却本可以被更好的企业取代。

---

<sup>①</sup> 从预期角度对均衡概念进行定义的理论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均衡状态被描述为理性预期的实现。本文没有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生物进化和市场经济的运动还有一个相似点：均衡对它们都没有意义。<sup>①</sup>变化是持续的，生存和繁衍的动力与环境提供的机遇之间存在差距，从而迫使其做出改变。不过，我们这里需要暂停一下这个类比。

达尔文曾受到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思想的深刻影响（Coutts, 2010; Jones, 1989）。<sup>②</sup>在达尔文看来，生物体要实现繁衍，但支撑它们的物质资源的供应有限。资源量是停滞的，增长速度慢于生物体的共同需要。这会加剧竞争，从而出现不断的变异和进化。用我的词汇来说，大自然在经历这千百万年的进化之后形成了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短缺经济体，没有中央计委、食品分配机构、警察或克格勃，每个个体都在为自己奋斗，争取尽量多的资源。<sup>③</sup>用标准的术语来描述，这是一个过度需求的经济体，自然资源的供给不足。

本文研究的市场经济的状态正好相反，它是个过剩经济体，而非短缺。重点在于供给方面。但是，两种重要的作用过程依然在推动进化，那就是供给过程和需求过程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和紧张关系。

我不是建议机械地套用进化论里的某个模型，而是借鉴其思想。经济学应该从达尔文理论的哲学、观点和方法中汲取灵感。马克思和熊彼特两人都是达尔文的崇拜者，他们通过达尔文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历史。我正在本文中努力追随他们的脚步。

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启发而产生的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已经有几十年历史，在早期的开创性研究（Veblen, 1898; Nelson 和 Winter, 1982）后有了重大发展，已成长为一个学派，与主流经济学的关系若即若离。<sup>④</sup>我感觉自己和他们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希望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者们能继续完善理论、发展数学模型、拓展实证分析的基础。

---

① 我在这里所讨论的长期进化是延续数百万年的变化过程。其他问题是生态学的研究领域，可以视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通常是针对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更短时期内的变化。多种生物体共生的某些系统可以用均衡分析的理论来描述，例如，森林中的动物群体形成了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共生关系。如果人为干预消灭了其中任何一个部分，自然的平衡都会被打破。捕食者会因为缺少猎物而消亡，被捕食者则会因为天敌的消失而过度繁衍（这种情况可以用 Lotka - Volterra 模型来描述，该模型也能用于分析经济现象）。

② 感谢 Andrés Simonovits 提醒我，学说史上存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事实。

③ 我在早期的著作中曾介绍过此类机制（aggressive coordination）。

④ 参见 Hodgson（1993）。



## 不对称性

对于市场及其对生产和消费、出售与购买的协调机制，标准的经济学看到双方的对称性，而我看到的却是不对称性。与我有同感的人并不少。有许多术语用来描述这种现象，表7中列出了其中最常用的一些。

在第一对术语中，前一个词汇（短缺经济）被广泛使用，本文则是在介绍后一个词汇（过剩经济）。第二对和第三对词汇目前尤其受到凯恩斯和卡尔多的追随者以及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青睐。第四对词汇不属于理论经济学，而是商业领域的用法。第五对词汇，我曾经在自己的《反均衡》一书中做过介绍，但并未被广泛采用。

表7 协调机制的两个方面——对术语的总结

术语	关注的机制特点
短缺经济 过剩经济	购买/生产和销售的愿望能否实现 短缺现象/过剩现象占据主导地位
限制需求经济 限制过剩经济	阻止生产扩张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什么？
过度供给经济 过度需求经济	在宏观层面：哪个总变量处于“过剩方”？ 在微观层面：哪一方出现得更经常、更激烈？
卖方市场 买方市场	哪一方在市场上居于优势地位？
压力 吸力	这是指市场参与者的努力： 是卖方在努力向买方推销产品？ 还是买方在努力争取产品？

哪一对词汇最后将被广泛采用，或者说会出现新的词汇，这并不重要。这五对词汇所反映的其实是同样的观点：供给过程和需求过程这两个方面存在持续的本质的差异，一方短缺，另一方过剩；一方更强，另一方更弱；一方对另

一方占有优势等。我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市场的持续的不对称状态。<sup>①</sup>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非均衡”（disequilibrium）模型的发明者有共鸣（Portes 和 Winter, 1980; Benassy, 1982; Malinvaud, 1977）。在某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上我们存在分歧（如数据加总等），但我们都特别关注在某个方向上偏离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状态。

我也赞同那些主张“失业均衡”（unemployment equilibrium）的学者的观点（Layard、Nickel 和 Jackman, 1991; Pissarides, 2000），他们的分析认为，失业是长期延续的，由于持续作用的机制造成，而不是因为货币等短期因素。尽管如上文所述，我对“均衡”一词有保留看法，但我依然赞同他们有关市场的不对称特征的看法。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围绕某个中间值作对称的摇摆，时而由雇主、时而由雇员占据优势地位。力量的不对称长期延续。

市场的对称观念在经济学家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这方面，与从事实务工作的商业人士更容易达成共识，因为生活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竞争。他们会对“竞争均衡”这样的荒谬说法感到困惑。如果所有的商品都能找到买家，而所有的买家都能找到满意的商品，还有什么竞争的动力呢？就像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给所有的参赛选手都颁发金牌一样。竞争和“过剩”的存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人们对于这种现象的称呼是“过剩经济”还是“卖方竞争”还是其他什么，取决于各自的偏好，但重要在于，它们都描述了一种不对称状态。同理，也存在与之对立的另一种不对称状态：“短缺经济”或者说有利于卖方的“买方竞争”市场。<sup>②</sup>

## 对两个新的市场体制的总结

我希望读者们到这个时候已开始形成有关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的总体框

---

<sup>①</sup> 经济学家们最近几十年来经常采用“不对称性”的说法，但通常是指“信息的不对称性”。虽然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将其纳入本文的讨论却可能使论述思路产生混乱。例如，医生们所掌握的诊断和治疗的信息远多于病人，但是在某些医疗服务种类上，依然可以形成“买方市场”：如果病人是用自己的钱来支付医疗服务的费用，他们就可以自由选择医生，而医生们将互相竞争，争取这些付费慷慨的病人。因此，我们这里暂不考虑信息问题，下文再作讨论。

<sup>②</sup> 均衡概念的考察可以从多个方向进行，这里仅举出一例：增长的均衡性？增长是否会导致经济中的比例扭曲？这是个有趣也关系政策设计的问题，有关的研究文献很丰富，我也进行过探索。但本文并未涉及。

架，我们现在来进行总结。

这两个概念描述了市场的两种持续的正常状态。我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使用了市场体制（market regime）这个说法（Kornai, 1992, 第 245 ~ 252 页），在我的术语框架中，它们代表相同的含义。

在一个重要方面，我改变了以前的概念结构，使其与本章的思路挂钩。为了简化解释，我们仅用一个指标来集中反映某个经济体在某个给定时间的短缺程度，用另一个指标来反映过剩程度。如果能找到第 3 章最后一节描述的理想“综合指数”，那是最好，但在没有的情况下，其他任何能反映主要短缺现象或过剩现象的指标也能发挥作用。例如，以空缺岗位数作为短缺指标，以失业人数作为过剩指标；或者排队等候住房的人数作为短缺指标，以空置房屋数作为过剩指标等。

短缺指标用“H”表示，过剩指标用“T”表示，我们暂时不考虑它们的具体内容或统计含义。

于是， $H = T$  就代表实际上的“均衡”状态。例如，空置房屋数等于需要住房的人数，或者空缺岗位数等于找工作的人数。其他内容通过图 10 来进行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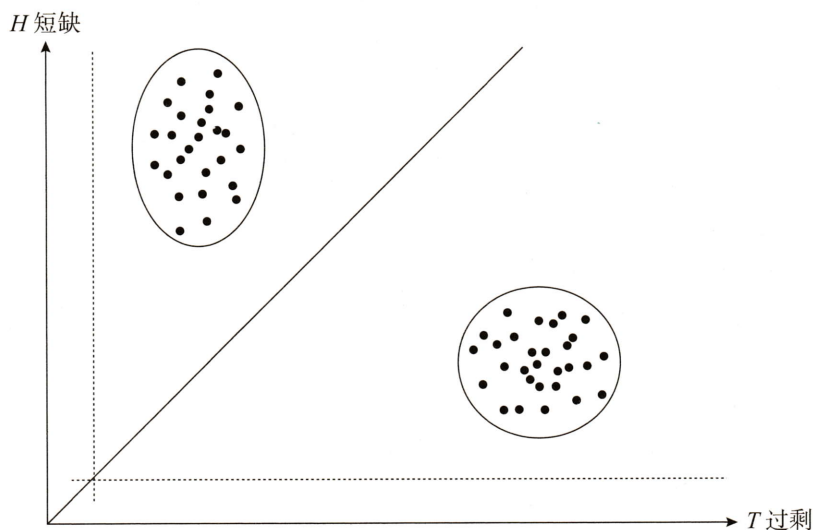


图 10 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的图解

图中的 45 度斜线代表“净过度需求”为零的市场状态。坐标原点是瓦尔

拉斯均衡点，在坐标轴的附近还有两条虚线，显示的是最低的短缺和过剩水平。仅仅是因为摩擦的存在，市场上就不可能存在瓦尔拉斯均衡。甚至在过剩经济中，短缺现象也必然会出现；在短缺经济中，也会零星地出现过剩现象。

图 10 可以用来进行两种比较分析。一种解释是针对短期：两个国家，一个是短缺经济，另一个是过剩经济。图中的点显示的是两个经济体在不同年份的表现，并不存在“短缺经济的均衡”或“过剩经济的均衡”，这些点并不围绕某个均衡点进行分布，现实中也不存在那样的均衡点。这里我只是进行描述，论证参见前文的第 5 章第 1 节。任何时点“ $t$ ”都对对应着一对参数  $H(t)$  和  $T(t)$ ，短缺经济的点都分布在左上方，过剩经济的点都分布在右下方，分别位于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的区域内。

图 10 的另一个用途是进行横截面分析。每个点描述的都是某一个国家在同一时间段的情况，落在短缺经济区域内的国家存在普遍的短缺现象，落在过剩经济区域内的国家则是以过剩为典型特征。其他解释则类似于以上对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描述。

这样的描述有助于给两种“市场体制”提供关键的定义。我没有能力也并不奢望预先给  $H$  和  $T$  设定精确的数量分界线，区分短缺经济或过剩经济。我在这里对它们的描述仅仅是泛泛地基于日常经验，经过冷静的分析，也可能找到量化的具体标准。例如，我想在某个城市的某个区域找到一套住房，尽管出租房很多，我可能还是要花几个星期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这几个星期的寻找时间并不意味着短缺经济，只是表明存在摩擦性的短缺。于是， $H$  这个指标仍然会落在右下方的过剩经济的范围内。但如果我必须等上 5 年，才能获得地方政府分配的住房，那肯定是生活在短缺经济中， $H$  这个指标会落在左上方的短缺经济的范围内。

生活在短缺经济中的人，看到市场状态的指标在左上方的区域内运动，会感觉很正常。而生活在过剩经济中的人，则习惯于看到指标在右下方的区域内运动。<sup>①</sup> 就像医学和其他研究生命体的科学那样，对于“正常值”的定义（如血糖或者血压的正常水平等）往往不是特别精确的某个固定值，而是一个

---

<sup>①</sup> 在早期的著述中，我曾采用“正常状态”来描述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现在决定放弃。“正常状态”实际上是稳态均衡的同义词，是数学模型里可以采用的概念，但不适合用来描述实际的经济状态。按照本文的思路，在过剩经济里，过剩指标落在一定范围内是“正常”的，但并不存在某个特定的均衡点。

可接受的区间。区间的划定或测量只能通过对实际情况的观察和经验来取得，加上统计分析工具的帮助。

现在对两种经济体制的定义进行总结。短缺经济是这样一种市场体制，短缺现象的出现是普遍、长期和频繁的；其中也可能出现过剩现象，但过剩的出现是孤立的、暂时的，尤其是罕见的。

过剩经济是这样一种市场体制，过剩现象的出现是普遍、长期和频繁的；其中也可能出现短缺现象，但短缺的出现是孤立的、暂时的，尤其是罕见的。

本文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反映实际的市场状态的指标从历史上看并不是集中分布在45度斜线附近，而是要么靠近左上方，要么靠近右下方。45度斜线代表市场中的对立面的一种完美的对称状态。如果市场表现为围绕某个均衡点进行对称的波动，其数值点应该散布在中间的斜线周围。图中的两个点集的位置则意味着真实的市场状态是不对称的，一个区域由短缺现象主导，另一个主要表现为过剩。

习惯采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们可能希望有更严格的定义，可惜我无法提供。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观察或许可以提供更严格的定义。但在此之前，我希望不要故作精确。曾经在“铁幕”两边生活的人们应该很清楚，图中左上方和右下方的区域都各自意味着什么。

图10中仅包含一种变量， $H$ 和 $T$ ，但实际上，在任何时间、任何国家都存在成千上万个此类变量。本文的论述意味着， $H$ 变量中存在很强的关联性， $T$ 变量中也是如此。这又是一个主要靠实证来回答的问题，我所知道的仅限于自己的观察。

这个问题有必要开展广泛的研究，完全有可能编制出中介指标或综合指数，用多于两个但又不至于上百万个（5、10或20个？）指标来描述各国的市场状态。我们的视觉想象仅限于三维空间，但熟悉数学方法的读者们知道，即使没有视觉上的表现方法，以上的观点还是可以用 $n$ 个代表短缺或过剩的指标来表现，一个国家的 $n$ 个指标对应着多维空间的一个点。

(A) 如果在 $n$ 维空间中，代表短缺和过剩程度的指标的多个点集中分布在高数值的过剩指标和低数值的短缺指标附近（相当于二维平面的右下方区域），那么这个国家的市场体制就属于过剩经济。

(B) 如果在 $n$ 维空间中，代表短缺和过剩程度的指标的多个点集中分布在高数值的短缺指标和低数值的过剩指标附近（相当于二维平面的左上方区

域), 那么这个国家的市场体制就属于短缺经济。

$H$  和  $T$  指标的分布会不会很分散, 还是集中成两个集群、分布在  $n$  维空间的两个预定区域内, 这必须通过实证计量来证实或否定。在过剩经济中, 短缺表现为例外情况; 反之在短缺经济中, 过剩是例外。

在实证检验完成后, 许多方面的限定条件必须加强。“例外”是什么意思? 指标的数值必须落在某个区域内, 具体是什么标准? 等等。我认为在本文中不必立刻进行这样的量化分析, 可以等这个领域的系统的实证研究开始后再展开。

以上有关两种市场体制的陈述所欠缺的不止是实证研究的支持, 也缺乏对短缺现象和过剩现象出现的因果关系的深入思考。引发短缺和过剩发生的机制在前文已多次提到, 下面进行总结。

###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导致过剩经济的产生: 因果关系链

我这里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来阐述这些命题。

**命题 1:** 只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才有能力产生和持续产生覆盖整个经济体的过剩经济现象, 只有资本主义能产生和持续产生导致长期过剩经济症的机制。

这个命题是可逆的。

**命题 2:** 如果某个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其经济运行必然表现为过剩经济。过剩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 并不因为政府执行了某种经济政策才出现。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和价格政策可以强化或减轻某些过剩现象, 但并不是过剩经济产生的根源。过剩经济的出现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组成要素之一, 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志。

这些是实证的描述。对于资本主义是过剩经济这个事实, 你可以感到高兴, 也可以予以谴责。规范研究将在下文再讨论。这里所陈述的内容仅限于: 哪里有资本主义, 哪里就存在过剩经济。

以上有关资本主义和过剩经济的命题是本文的核心内容, 下面我要再加上几条总结性命题, 针对我在早期著述中分析过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命题 3:** 只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有能力产生和持续产生覆盖整个经济体的短缺经济现象, 只有社会主义能产生和持续产生导致长期短缺经济症的

机制。

这个命题是可逆的。

**命题 4:** 如果某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其经济运行必然表现为短缺经济。短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特征，并不因为政府执行了某种经济政策才出现。计划和经济调节可以强化或减轻某些短缺现象，但并不是短缺经济产生的根源。短缺经济的出现是因为它是社会的组成要素之一，而且是最重要标志。有社会主义的地方，就有短缺经济。

这里我已经鲜明地表达了观点，后面将进行更细致的阐述，允许例外、混合类型和转轨类型的出现。但首先，我希望读者注意到，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经典”形态并没有向任何形式的“中间道路”趋同。<sup>①</sup>

我在上文多次使用了“命题”（proposition）一词，采用“推测”或“假设”或许更符合学术习惯，但我感觉不必那么谦虚。我所表达的观点有日常生活的万千事实作为支撑，试图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几乎有些多余。还有，本文包含的 6 个表格和 10 个图示从统计上也支持这些命题。我希望强调，读者能通过这些数据形成对上述命题的认同感，它们并不是严格的“证据”。

我的命题既不是空泛无物，也不是同义反复。它们完全有可能被反驳，我本人也必须抱着对自己观点的怀疑精神进行更多研究，批评我的人完全有机会推翻这些命题。

以上四个命题预示着一个因果关系的存在。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因，过剩经济或短缺经济的表现是果。然而在因果之间，还存在更复杂的中介性的因果关系链。在下面讨论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我会更详细地阐述其中的因果关系（如图 11 所示）。社会主义的因果关系链则可以参考我过去的著述。<sup>②</sup>

图 11 中仅包含本文已经讨论的部分因果关系，它们代表着复杂的作用机

---

<sup>①</sup> 如果我打算用均衡理论的数学模型来阐述自己的思想，那我需要设计的模型应包含两个均衡点，一个是短缺经济均衡，一个是过剩经济均衡。在模型的虚拟世界中，整个系统将围绕其中一个均衡点运动。这一模型将有助于显示，要让系统脱离一个均衡陷阱，进入另外一个，必须改变哪些参数。也许我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重新设计这样的模型可以大大帮助那些习惯于均衡模型的经济学家理解和赞同我的理论，他们很多人只能看懂那样的语言。还有，今天的很多模型已具有多个均衡点。

<sup>②</sup> 参见《社会主义体制》（Kornai, 1994）。短缺经济的因果关系链的描述在其中的第 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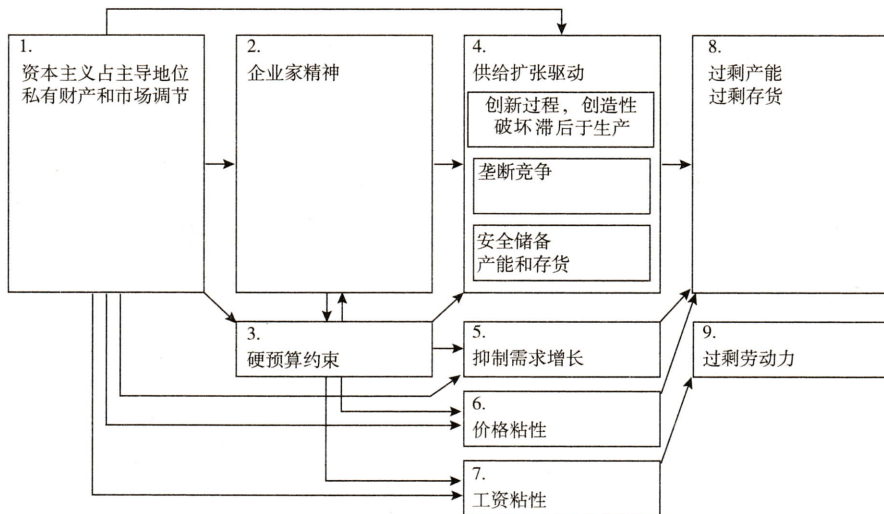


图 11 引发过剩经济的因素——因果关系链

制，该图的目的仅是提供一个概要介绍。

图 11 还远未完成，本文已讨论过几种因果关系尚未纳入其中，但即使如此，图示已经显得有些拥挤了。为清晰起见，代表因果关系的箭头都是从左至右（除一个例外）。那表示主要的作用方向，其实同时也存在反作用。例如，卖方竞争产生了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同时又在加剧竞争。为图示的清晰起见，反作用的箭头被省略了。

请注意，图 11 中的因果关系链从左方的共同因素开始，最后投射到右方的两个平行部分：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过剩经济。或者说，在我们考察资本主义制度时，实体经济领域的两个市场都表现为过剩经济。在同一个经济体系中，既存在长期空置的产能和存货，又存在长期失业，即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两种现象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起源。<sup>①</sup>

以上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前面几章的论述思路总结出来的，其真实性可以通过实证来检验。如果在产品和服务市场上存在广泛、频繁和持续的供给过剩，同时又存在广泛、频繁和持续的劳动力短缺，则可以将其推翻。但如果过剩现

<sup>①</sup> 这并非不证自明。宏观经济学领域就存在争论，例如有关当前的经济危机的起因，是因为上升周期的过度投资，还是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这两个因素都可以用本文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参见第 2 章第 4 节。



象虽然伴随着相反的迹象，但只要短缺是微弱、局部和过渡性的，该观点则不会被推翻（例如，在普遍的过剩经济中，某些特殊部门存在劳动力短缺）。

在图 11 所示的过剩现象的解释变量中，我只列举了那些与经济制度有直接关系的内容：一个国家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内容是本文的研究主题。但我并不否认其他因素也会对过剩和短缺现象的出现产生影响。

(1) 有一类因素关系与摩擦、失调和信息不畅有关，这在上一章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部分进行过讨论。

(2) 供给、需求和定价过程还受到政府的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财政和货币政策。这种情况在不同经济制度下都存在，但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作用方式、传递渠道和影响程度却存在本质区别。在“导言”部分曾指出，本文对此仅点到为止，而不做深入分析。

借用图 10 所反映的图形来说，第一类因素会影响点集的位置。摩擦越少，适应程度越好，整个点集就越靠近两侧的虚线（代表短缺和过剩的最低水平）。只有在理论模型刻画的虚拟世界中，才有办法达到坐标原点（零短缺和零过剩的瓦尔拉斯均衡点）。

第二类因素（如政府的经济政策）可能导致点集区域向任何方向移动，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sup>①</sup>（在讨论特殊情况的后面一章还会做简要讨论）。例如，政策有可能在典型的资本主义过剩经济中加剧过剩的程度，减少短缺的发生，导致点集向右下方移动，也有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不过，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迫使该经济体跨越到 45 度斜线上方，将其变成一个短缺经济体。那需要对整个经济制度进行改造，相当于俄国在 1917 年或者东欧国家在“二战”之后的程度，也就是说图 11 中的方框 1 中的内容要发生激烈变化，由公有制和官僚机构的决策来取代私有制和市场配置的主导权。类似的，没有任何财政和货币政策能把短缺经济的值域推过 45 度斜线。那需要反方向的根本性制度变革，由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占据主导地位。

---

<sup>①</sup> Leijonhufvud (1973, 2009) 在他的文章中用另外的比喻阐述过类似观点：宏观经济可以在一个“走廊”中运动，而宏观经济政策则试图产生巨大冲击，导致经济与墙壁发生碰撞，脱离走廊会产生严重后果。他的思想也不是关注某个特定的均衡点，而是认识到市场状态可能是在一定区域内变化（走廊内部），这也和本文一致。

## 遗传倾向

虽然我做表述时尽量小心翼翼，读者们还是可能从因果链的描述中感受到，我认为这样的因果关系是决定性的。给定解释变量的不同数值，就会决定被解释变量的数值。我并不否认这样的简单推理。

在本文和我以前的著述中，我用“特征”之类的说法来描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事实上，体制的固有特征是一种倾向，类似于一个人的遗传倾向。例如，我们的血管都会随着年龄增大而硬化和钙化，但这个变化倾向的力度对每个个体而言不尽相同。我们也不是完全听天由命，饮食习惯和其他生活方式都会影响这一进程。不过，整体的变化倾向却是由遗传密码内定的。

即使在斯大林或毛泽东当政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也各不相同，出现了很多差异，但它们的遗传倾向是先天决定的。从逻辑推导和实证检验都可以发现：政治权力垄断、一党制和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僚化的中央集权体制。

你可以同这种倾向进行抗争，但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它不但表现为每个人的内在倾向，还表现为从前人那里继承的家族倾向。例如，在某人的父母、祖父母和兄弟姐妹中，很多人都曾罹患过心脏和循环系统疾病，我们当然会担心这个人也带有此类疾病的遗传倾向。它可以视为一种随机性质的警告，患病的风险随着年龄递增。

在面临这样的风险因素时，我们不要奢望对其取得什么最终胜利。有的人很注意饮食，适当开展体育运动，不吸烟，也不会经常感到压力，他们在有效地与自己的心脏和循环系统的致病倾向进行抗争。然而，放松和危险仍随时可能发生。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可以被视为类似的倾向，它可能充分地表现出来，也可能被各种因素压制（如受到决策者、社会道德规范、法律和政府干预措施的调节等）。<sup>①</sup> 可是，内在的力量仍然在发挥作用，不可能通

---

<sup>①</sup> 这里我想再次提到阿克洛夫和希勒有关凯恩斯的动物精神的著作（Akerlof 和 Shiller, 2009, 中文版《动物精神》一书参见中信出版 2009 年版。——编者注）。两位作者对这一心理现象进行的解释，在几个方面（但并非全部）与本文所说的制度的“固有倾向”是类似的。

过社会控制或政府管制将其消灭，它们深藏在资本主义的基因之中。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资本主义的基因中包含一个创业倾向。它尽管会被官僚主义的束缚、繁琐的公司税收制度、危机后的信贷紧缩等外部因素压制，依然会顽强地再生。

资本主义还同样包含雇主抵制雇员的薪酬要求的基因。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会给某些雇员群体支付效率工资，或者会从慷慨的角度好心地提高一点待遇，如为了减贫等。但是，作为雇主的天然立场会使他们严格控制工资成本。这并不是不证自明的道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经理只有在上级的压力下才会选择同样的立场。

遗传倾向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差异，对于社会组织、系统和子系统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对于那些习惯用数学模型中的变量来描述经济组织和个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者而言，这尤其值得重视。例如，关于酗酒的行为模型可以假定，喝掉的啤酒瓶数是一个非负的整数“X”。生物学上的因素会给这个变量设置一个上限：任何人都没有足够大的胃口喝下20瓶啤酒。对于一个研究酗酒的动态模型而言，变量X是从0增大到10，还是从10减少到0并不重要，但我们却很清楚，酒精上瘾和成功戒酒这两个过程是非常不同的。标准的经济学模型还没有准确地表述这个现象。而行为经济学已经通过出色的心理学实验证明，获得100美元的收入与遭受100美元的损失对人们的影响程度不同，行为经济学家们将其称为“损失规避”（aversion to loss, Kahnemann 和 Tversky, 1979, 1991, McGraw 等人, 2010），它目前还没有被主流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家们接纳。

这个现象在本文的论述思路中极具重要意义，我这里做一些回顾。

-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创新在汹涌推进，参与创新的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满足。而破坏是一剂苦药，失败者会进行抗拒，对必然消亡的事物表现出心理依赖。至少暂时保留那些本应淘汰的东西，也符合他们自身的物质利益（或者他们会这样认为）。

- 赢得竞争的人感到快乐，至少在客观上改善了自身的境遇，如增加了市场份额等，于是扩张成为很强大的动力。但是对失败者而言，地位的丧失并不像体育比赛中那样会自动完成，与胜利者的扩张幅度相比，表现糟糕的人并没有大规模撤退，这正是过剩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

•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在调整价格时并不会因为提价而感到内疚，它们只是想获取更多利润。但降价却是个不愉快的事情，也更难执行。降价比涨价的难度更大。此类不对称性也是过剩产生的一个解释。

几年前我曾提出，市场状态（持续的趋势）带有不对称的特点，损失规避心理可以对此做出部分（但不完全）解释。这种倾向是单向作用的，反向作用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需要与强烈的自发力量相对抗，经常还只能取得部分成功。

这个观点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我们需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哪些现象或作用过程是属于“内在”的、“遗传”的倾向，哪些又是因为特定环境造成的。这些倾向的强弱程度也同样关系重大。

在政府和其他组织试图反抗那些强大的自发倾向的时候（在许多情况下有充分的理由），它们会清楚无误地看到：任何一种监管障碍或政府干预，都在被遗传倾向的拥有者们不断地挑战和规避。

## 6. 过剩经济的影响及其评价

### 影响的分析和价值的判断

本文的第2章到第5章采用了实证方法来分析过剩经济的现象及其产生原因。现在转向其影响的讨论。我会尽可能把对影响的客观描述与价值判断区分开，判断不可避免带有主观因素，任何评价都基于特定的价值观。对于每个项目我都会加上自己的评价，同时也提到与我不同的其他人的评价，尤其是那些在公共讨论中经常出现以及对公众观点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由于存在强烈的因果联系（图11），很难分清楚哪些影响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哪些又来自市场的过剩经济特征。我将重点分析后者，不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总体的评价，而是针对过剩经济（卖方竞争、产能和存货闲置、劳动力过剩等现象）的影响这一内容进行分析和评价。这意味着，我将忽略某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如民主、人权、宪政等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内容，因为它们与过剩经济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

## 创新

对于促进和制约创新的因素，能找到各式各样的大量研究文献。<sup>①</sup>人们广泛认为竞争是促进创新的主要动力，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尤其是通过最常见的垄断竞争的形式）会产生过剩，它与竞争互为因果关系，因为生产商希望更好地利用自己的产能，出售累积的存货，也希望通过新产品和新服务来抢走客户。可以很容易地从逻辑上推导出，没有过剩，就不存在卖家之间的竞争，因为缺乏过剩产品的压力。如果过时的产品型号还有人排队等候，那么汽车厂或电信服务商为什么要不辞辛劳地去搞创新呢？在过剩经济里，快速现代化的受益者包括所有通过技术进步使生活变得更加舒适、更有趣和更有效率的人，面世时价格昂贵的新产品持续降价，也会让更多的人得到好处。

这些思想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介绍，现在重提是为了对过剩经济进行评价。按照我的价值观排序，创新是过剩经济优越于短缺经济的首要特征。

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一判断，对很多人而言“消费社会”这个说法是个贬义词。他们认为，作为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层出不穷显得过于浪费、令人烦心。

不可否认，创新过程有着消极的一面：很难紧追潮流，人们在还没有熟悉老产品之前，就不得不去学习新产品的使用手册。这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来判断，是否值得为新产品的新功能去付出那样的努力。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创新和技术进步也伴随着危险：创新可以被用于伤害性的目的。但你不能用事后的眼光来看，我们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考虑到这点。

## 消费者做主还是消费者被操纵

可以迅速动员的大量存货和产能储备，让消费者拥有了广泛的选择，拒绝使用不合意的产品。过剩经济提供的这样一种选择权不仅是一种商业现象，本

---

<sup>①</sup> 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熊彼特 [Schumpeter, 1968 (1912), 2010 (1942)], 但其他许多人也对创新过程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我在一篇论文里回顾了主要的研究成果：《创新与活力》(Innovation and dynamism, Kornai, 2010a)。

质上更是对人类的自由权利的拓展。在短缺经济里，选择权受到限制，人们被迫使用替代品，降低了从消费中获得的满足。除物质层面以外，选择的缺乏还限制了人们的人身自由度。

生产商和服务商都希望尽可能开动自己的产能，向买家推销存货。过剩的存在诱使他们响应消费者的需求。针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可持续的生产调整，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是中长期的调整。但是能够迅速动用的存货和产能储备可以缓解这种时滞，过剩是一种“润滑剂”，可以减轻机器设备的调整摩擦系数。

我不希望把过剩经济中的买卖关系理想化。有人说，过剩经济（或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消费者的统治权，这有些夸张。作为臣民，需要向真正的统治者上供一切物品，但这里显然不是，主要原因是供给经常会激发需求，尤其是通过新产品和新服务。其次，作为整个图景的一部分，卖方不但在积极影响买方的偏好（通过提高清晰有效的信息），也在操纵买方。在短缺经济中，广告是非常无聊的浪费，但在过剩经济中则是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那些出于其他原因认为过剩经济优于短缺经济的人必须接受大量广告促销的存在，有些广告是诚实公正的，但也有些在误导，企图欺骗消费者购买。从全社会的范围来看，广告的成本规模高得惊人。表8反映了几个国家的情况。

表8 发达国家的广告支出占GDP的百分比（1975~2007年，%）

年份	阿根廷	日本	意大利	新西兰	美国
1975	n. a.	0.83	n. a.	n. a.	1.70
1985	n. a.	1.08	n. a.	n. a.	2.25
1995	n. a.	1.10	n. a.	n. a.	2.20
2000	1.20	1.22	0.69	1.34	2.52
2005	1.79	1.36	0.60	1.41	2.18
2006	1.99	1.37	0.60	1.33	2.14
2007	2.10	1.36	0.61	1.33	2.03

注：广告支出的指标包含以下内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直邮、账单和其他形式的广告。根据这些数据来源的说明，尚不能确认是否覆盖了所有形式的广告支出。n. a. 指数据不可得。

资料来源：GDP数据来自IMF（2010）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2010）；广告支出数据来自WARC（2007），CS Ad Dataset（2007）和Dentsu（2009）。

在 2000 年代，美国的广告成本相当于 GDP 的 2%，与某些政府支出项目相比，这一规模令人印象深刻：2007 年，联邦和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也相当于 GDP 的 2%，家庭和儿童扶持项目仅为 0.6%，警察和消防为 1%（Chantrill, 2010）。

但在这个方面说得过头，宣称生产商是实际的统治者，也不正确。不管厂商在操纵消费者方面有多精明，只要有过剩的存在，消费者们依然有可能拒绝某种产品或者服务。用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 1970）的话来说，存在一种“退出”策略：买方不需要强烈抗议，转身离开就可以。因此，如果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表达，过剩经济中的消费者并不是掌握绝对权力的君主，而是共和国的强势总统，他可以影响决策和进行否决。而在短缺经济中，并不存在这种“退出”选项：买方是臣民，向居于统治地位的卖方乞求商品和服务。短缺情况越严重，他们的态度就越是恭敬。

显然，从过剩经济与短缺经济的对比中，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各种类型的权力、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在发生相互作用。而在主流经济学的教学中，通常并不存在这样的论述思路。

## 生产率与合作

我刚刚介绍的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润滑作用，同样适用于生产过程内部。在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下，原材料和部件的供应都会遇到各种问题，有的投入品不能按时到货，玩忽职守的情况可能发生，等等。但这些问题在过剩经济中更容易得到解决，存货和产能储备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动用。不管是经理还是员工，任何在生产领域工作过的人，如果把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的日常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进行一番对比，都很容易感受到巨大的差别（前面章节的表 3 和图 5）。与面临普遍紧张的、僵化的短缺经济相比，过剩经济的弹性要高得多，运行起来更加平滑可靠，也更具适应性。

这些差异显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率和增长速度有帮助，但客观地说，也必须承认“润滑”意味着有很大一部分资本被存货和产能储备套住了。很多人厌恶地将其视为巨大的浪费。

通过企业运营研究模型，可以从公司层面计算存货和产能储备的成本，并与投入品供应波动和不能满足买方需求的成本进行对比。但就我所知，还没有

人尝试从整个经济体的层面进行此类测算。

经济制度的普遍特征并不依赖公司运营研究的精确计算。在对过剩经济进行此类成本收益核算时，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此庞大的存货和产能储备是物有所值，也可能认为大量积累存货和产能储备是资本主义过剩经济的天性，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价值观。

### 适应性

前文分别讨论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个人或家庭）的关系，以及生产商之间的相互作用。现在来看看全貌，经济体中所有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即使在短缺经济中也存在合作，几十年的生存历史证明了这点。

尽管过剩经济也存在摩擦，但它具有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合作关系更加顺畅、快捷和灵活，而短缺经济的适应性则显得僵化、笨拙和迟缓。有资本主义的许多赞赏者（例如大多数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把这种平衡和协调作用视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优势，有人甚至将市场经济的全部美德都归结于此。但在我看来，排在第一位的并不属于静态适应的灵活性，而是过剩经济的活力、不可抗拒的创新倾向。当然我也把静态的适应性视为非常重要的优势。

### 平等

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在过剩经济中随处可见，只要付了钱，你可以购买任意数量的任何物品，购买仅受限于买家自己的钱包。反过来，买不起的人就只能少买点。

相反，短缺经济具有平均效应，但这绝对不是彻底的平均主义。有很多因素在抗拒完全的平均化。收入分配是不平均的，报酬的差异是社会主义经济有意而为的做法，出于各种原因：对业绩的鼓励，对政治支持和忠诚的奖励等。于是会出现同样的规律：有钱的人能买更多东西。

不平均的现象还限于购买上面，配给体系公开地对那些与执政党关系密切或者有影响力和门路的人倾斜（如住房分配或短缺商品分配等）。

然而，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的工资和商品分配的不平均程度还是小得多。这给了我们一个不够精确但大致不差的印象：在短缺经济中



物品较为稀少，但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些。

平均化的效应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价格政策和福利体制实施的，最终会导致收入再分配。在短缺经济中，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免费的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包括那些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可能无力支付这些的贫困阶层。<sup>①</sup> 房租和食品价格通过大笔的政府补助压得很低，以照顾低收入者。

这样做的后果很自然地反映在市场的普遍状态上：免费或接近免费的产品和服务出现严重短缺。实现更好的平等，其代价是严重的短缺。短缺经济总体上是比过剩经济更加平均化，但为实现平均而进行的收入再分配进一步加剧了短缺程度。

## 物质主义与精神价值

过剩经济（消费社会）经常受到批评，使人“物质化”，诱使人们仅从物质的角度去考虑得失。<sup>②</sup> 很多人指责铺天盖地的广告、堆满商品的购物中心、仓促面世的新产品，说它们制造了扭曲的价值观，削弱了人们对精神价值的尊重。

从科学的角度对这个议题的考察应该让社会学家去完成，我这里只想基于过剩经济与短缺经济的观察冒险做出一番评论。20世纪70年代，我曾看到许多女性在莫斯科的百货商店中相互扭打、撕扯对方的头发，只是为了买到一款新上市的鞋子。与今天在众多鞋店里惬意地挑选过丰富多彩的鞋子的莫斯科女性相比，当年那些女战士们的拜物主义有丝毫逊色吗？

历史上还有更为惊人的例子。与今天的人们相比，在斯大林时期的乌克兰和后来的中国，在短缺经济最残酷的岁月里，那些面临饥荒威胁的人们难道会更不在乎物质（谷物、面粉、土豆和面包），而更关注精神层面的追求？<sup>③</sup>

如果说市场的一般状态（过剩经济还是短缺经济）与“物质主义”之间

---

① 现在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兴起，将在第7章讨论。

② 经济学说史专家们往往把对资本主义的此类批判追溯到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 1975 (1899)] 和加尔布雷思 (Galbraith, 1958)。这里所列举的批判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各种代号：消费主义、消费资本主义、经济拜物主义、丰腴社会、商业主义等。

③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在研究契诃夫的文章里 (1963, 第440页) 曾引用他的语言来反对托尔斯泰的说教：“常识和正义告诉我们，与纯洁的生活方式和吃斋相比，进步和蒸汽机中有更多人类的爱”。

存在什么因果关系的话，或许可以这样来解释。除其他影响以外，过剩经济还有助于信息和现代教育手段的传播（之前曾经讨论过），渴望知识、新闻和精神价值的人们拥有比以前多得多的选择。存货和产能储备的过剩也表现在出版商和书店的仓库里，表现在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单里，表现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里。在这样的供给过剩中，精化与糟粕并存。

## 腐败的方向

腐败存在于各种社会中，发生频率、严重程度和表现形式受多个因素的影响。<sup>①</sup>我不会在这里讨论那个仍然无法回答的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哪种制度的腐败问题更为严重。我只想关注与本文的主题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市场的一般状态对腐败是否有影响？

的确有。谁对谁行贿？这取决于市场是处于过剩经济还是短缺经济。尽量简单地说，短缺经济中的买方会用各种办法，包括腐败，去影响卖方。过剩经济的情况则相反：卖方会用各种办法，包括腐败，去影响买方。

短缺经济中的腐败案例往往很不起眼。家庭主妇们会给屠夫塞钱，只为割到一块好肉。更严重的情况则包括，企业的采购经理贿赂供应商的代表，以确保自己的企业得到稀有的物资或部件。但在这些无关痛痒的腐败现象泛滥成灾以后，社会将变得非常畸形。

在过剩经济中，如果卖方能捞到个人好处，而买方又是使用公共资金，腐败的情况往往会特别严重。此时不是小偷小摸，而是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流入私人企业的账户。有人不惜给政府机关或其他公共机构的负责人数百万美元的好处，以确保自己能得到合同。对卖方来说，这数百万美元不过是交易的零头，但对受贿的公务员而言则相当可观。可以买通的人比比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环境所能产生的强大动力，前面我提到过卖方竞争带来的好处，但竞争同样会带来腐败的巨大诱惑。

---

<sup>①</sup> 布达佩斯学院 (Collegium Budapest) 在 2002 年 3 月组织了一个作为跨学科的国际研究群体，由罗斯—阿克曼 (Susan Rose-Ackerman) 和我领头，命名为“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的诚信”。研究成果收录在两卷本的 40 篇论文中 (Kornai 和 Rose-Ackerman 编，2005；Kornai、Rothstein 和 Rose-Ackerman 编，2005)，其中包含腐败问题的详细的文献索引。

## 资本主义竞争的优点与缺点，以汽车产业为例

我希望通过经济史和经济政策领域的一个案例，来展示过剩经济和资本主义竞争的优点与缺点：汽车产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sup>①</sup>

在所有汽车制造国，长时期里都会出现非常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图 12 显示，过剩产能的比重在 12% ~ 27% 之间，并且从 1990 年到 2008 年呈现上升趋势。在这个产业里讨论长期的产能过剩是完全合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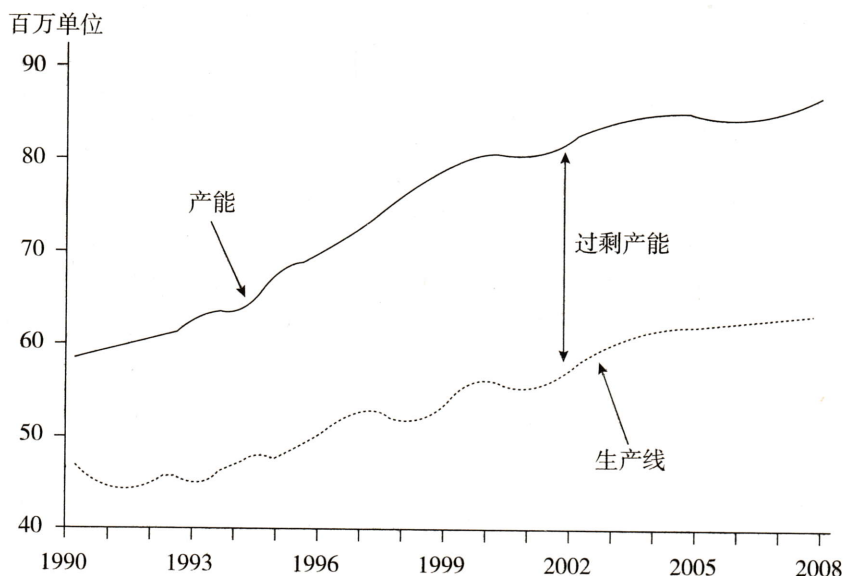


图 12 汽车产业的过剩产能 (1990 ~ 2008 年)

注：数据是指全球汽车产业，尤其是轻型汽车（在欧洲是指重量小于 3.5 吨的汽车）。

资料来源：Francas 等人（2009，第 2 页）。

此外，汽车工厂和汽车经销商那里还储备着大量的现车。<sup>②</sup> 这个产业的所有分析师都清楚存在巨大的闲置产能和库存汽车，并不时发出警告。请看图 13。

<sup>①</sup> 其整体描述参见 Haugh 等人（2010），OECD（2009）和 Orsato 和 Wells（2006）。

<sup>②</sup> 虽然汽车工业的主要特征是过剩，某些豪华汽车在市场上却需要数月的排队等候，这是第 3 章描述的现象的一个生动案例，过剩和短缺可以并存，其中一个占据主导，另一个属于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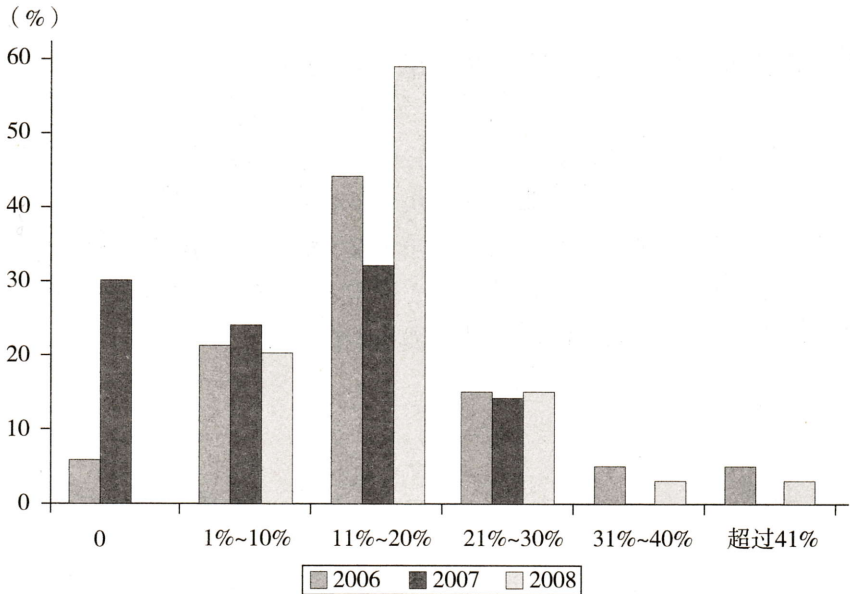


图 13 汽车产业的高层经理人对全球过剩产能的估计 (2006 ~ 2008 年)

注：横轴上对于过剩产能的估计被划分为 6 个值域。纵轴显示估计的比例分布，例如在 2007 年，32% 的受访者认为过剩幅度约为 11% ~ 20%。

资料来源：KPMG (2009, 第 15 页)。

尽管所有的工厂经理都知道，从全球来看存在极其巨大的过剩产能，他们仍然无法遏止自己的扩张冲动。每家企业都希望从竞争者手中抢走市场份额，更多的产能不断涌现。其结果导致，2008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汽车制造业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产业之一，尤其是在美国。

汽车公司产量的下降会产生严重的乘数效应，因为它们的供应商及相关产业在整个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出现了强大的救助亏损汽车制造商的压力。政府实施了巨额的救助方案，也增加了未来对于软预算约束的预期。第 2 章讨论过的阻碍创造性破坏进程的因素，在汽车产业中鲜活地表现出来。

规模的扩张一方面意味着可怕的浪费，整个产业存在巨大的产能过剩，汽车还污染了大气，交通事故十分普遍。另一方面则是，汽车产业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快速而舒适的交通工具，汽车厂和它们的原材料及零部件供应商提供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产业竞争是技术革新的动力，让今天的汽车比二三十年前的更舒适、快速和安全，汽车能源早晚会上来革命性的突破。那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几个强大的遗传倾向在同时推动更新变化的过程，有利和不利

的影响都会出现。

我们可以对资本主义过剩经济与社会主义短缺经济再做一番对比。巨大的产能储备和存货当然占用了巨大的资源，但消费者只要有购买力，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获得满意的车型。即使不愿意马上付款，金融机构、汽车厂商和经销商也可以提供信贷。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汽车短缺程度令人压抑。在1980年代末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汽车供应缺口达到约400万辆，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过剩产能的三分之一。<sup>①</sup>在有的东欧国家，人们需要排队等候14~16年才能获得某些想要的车型（Kornai, 1992, 第236页）。非但没有购车信贷，许多国家的购买者还必须提前支付全部或部分车款，或者说，消费者向生产商提供信贷。

在过剩经济中，汽车制造商积极推动创新。每年都会出现新的汽车性能：安全装置的改善，空调的改进，配备雷达预警系统等新型电子设备，娱乐设施（收音机、游戏机和电视机等）的安装，减少排放的技术革新等。在短缺经济中，技术进步则几乎陷于停滞：民主德国的特拉贝特和瓦特保、苏联的拉达等车型差不多数十年不变，最多会在很长的迟滞后才从西方引进一些新性能。汽车车型虽然已严重过时，但如果人们还需要排队数年才能得到，又何谈技术革新的动力呢？

## 支持资本主义和过剩经济的立场

对过剩经济的评论及其与短缺经济的对比，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能得出怎样的基本价值判断？再次重申一下本文开篇的警示：本文只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方面，即市场的一般状态、市场制度和过剩经济。研究不是针对细节，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某些本质性的重大优缺点的分析。当然，对资本主义制度做总体上的价值判断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例如，资本主义制度对雇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以及对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资本主义制度与不同类型的政府组织形式（民主还是专制）之间的联系等，可以添加的内容还很多。

然而，我不希望彻底回避问题。我已经在其他著述中对于其他方面做出了某些结论，总是发现对资本主义有利的一些方面，当然我也从来不希望忽视其

---

<sup>①</sup> 这一估计的根据是 Zsuzsa Kapitány (2010)。

消极的方面。在这里，我要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通过两个主要理由来证明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

第一，对民主的认同列在我的价值观排序之首。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民主。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不但提供了建立民主制度的充分条件，还提供了成功维护民主制度并对抗其反对势力的充分条件。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也是维护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对于资本主义的这一支持理由，我在这里仅能点到为止，在其他著述里已有过深入的讨论 [参见我的论文选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Kornai, 2008)]。

第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通过过剩经济的运转机制，这个制度可以驱动和维持快速的、不停顿的现代化、创新和技术进步。这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关系到对社会运动的规律和某些力量的共同作用的价值判断。这个理由让我们回到了本文的主题。在我看来，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摆脱饥荒、掠夺和贫困，正在接触技术进步的成果，正在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是令人欣喜的进步。而这样的进步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过剩经济带来的。

我曾经列举的过剩经济的其他优点，都排在以上两大理由之后。我同时也抱有严肃的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利的看法。但从我的价值观出发，基于以上关于民主制度和技术进步的两大理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我选择支持资本主义制度。

其他许多人也会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中间做出同样的选择。但这并没有完全回答其他若干重大问题。

几十年前，我在都柏林举办以伟大的爱尔兰统计学家基尔里 (Roy C. Geary) 命名的讲座。我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短缺经济，并指出它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带来的巨大痛苦，但我也谈到，他们并没有失业的忧虑。在随后的讨论中，基尔里教授问到，爱尔兰能否在保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的丰富产品的同时，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避免失业问题的办法。我当时的回答与本文结论相同：不可能。产品短缺和劳动力短缺是长期性的短缺经济的联合产品。相反，过剩的产能、过剩的存货和过剩的劳动力则在过剩经济中相伴产生。选择某个制度的优点也就必须接受它的缺点。

与很大一类经济学家相似，我是从客观、现实的角度支持资本主义。但这

个群体并非完全同质，其中一个子群体是“天真的改革派”，<sup>①</sup> 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的所有固有缺陷都能被治愈，其中大多数人把国家干预当成药方。

另一个子群体（我把自己也划归其中）则不认为那些缺点可以完全根治。资本主义是个包含矛盾的有机体，其优秀和缺陷的品质都很突出，都是其天性。并不是由于政治家和官僚机构及参政专家们的努力，才让其优点突出地表现出来，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恶意、自私、愚蠢或意识形态的错误，才把邪恶释放。优点和缺陷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倾向，源自根深蒂固的利益驱动、行为模式和本能。

人们必须与这个制度无法治愈的先天缺陷共生。我们必须承认，有过剩经济的地方，就有商品存货的堆积，就有广告的泛滥，就会在公共采购中出现腐败的可能等。

我发现，典型的美国精神是天真的乐观主义，认为所有问题最后都能找到解决办法。欧洲人（法国人？匈牙利人？犹太人？）则抱有更多怀疑，会承认有些问题可能没办法解决。

后面这种心态并不必然意味着无可奈何，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办法减轻过剩经济的有害影响，例如：

- 企业可以制定采购和存货策略，使企业间的物流更加顺畅。在这方面我们能想到日本企业常用的即时生产策略，此类策略的作用越显著，既定安全水平和客户满意度所要求的过剩储备的水平就越低。

- 政府可以通过监管和检查来确保企业间的公平竞争。

- 通过制度化的犯罪调查来反对腐败，通过防范措施减少腐败发生的频率。

- 还有一个可能不合时宜的建议：中长期的计划手段。这不是指已经失败的社会主义的指令式计划体系，而是经过改进的指导性计划（类似于法国用过的类型）。在必要的试点后，这样的计划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实现需求预期和新增产能的协调，或许可以防止大企业的过度投资催生更多的闲置产能。

以上建议仅是几个例子，以显示通过对资本主义固有缺陷的冷静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建设性的思考及实施有力的政府监管和改革。

---

<sup>①</sup> 读过我以前的著述的人可能会熟悉这一说法，很久以前，我曾用这个词汇来称呼那些希望通过体制改革来根除社会主义的所有弊端的人。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的某些不利特征也是遗传性的、内在的、先天的和无法治愈的，就像资本主义的某些不利特征一样。

## 理论综合的范围及其局限

本文参考的文献涉及多个研究方向，列表中包含彼此观点相去甚远的学者、不同的学派和亚学派，其中既有正统也有异端，既有主流也有非主流。我曾经在以前的著述中讨论过如此多元化的学术继承关系，把自己描述为折中主义者。在本文中，我仍然不拒绝这样的说法，此外还有了更宏大的目标。

我相信，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实证描述和解释后，有可能对不同的思想流派进行一番理论综合。从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角度去观察同一现象的学者，有可能得到同样的结论。我不是说，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所有的有价值的观点都能融合为一个大统一理论，这里要做的理论综合远没有那么广泛。然而就正在讨论的领域而言，还是有可能把我提到的各个学派的思想综合起来。本文不是要完成这个理论综合，而是试图勾画一个大纲。<sup>①</sup>我希望称其为实证综合 (positive synthesis)，实证的含义是，观点不同甚至对立的人们可以对某个事实的理解和解释达成一致，并应用于政治选择和目标设定上。

表9 “短缺经济—过剩经济”的实证综合的要素

主题	学者和学派	本文参考的内容 (章节)
垄断竞争	张伯伦, 罗宾逊, 垄断竞争理论	2 供给形成过程
产能过剩	不完全竞争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学派	
创新	熊彼特	
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	
供给储备	运筹学的供给模型	
规模收益递增	卡尔多, 阿瑟	

<sup>①</sup> 我不是第一个看到此类理论综合的可能性的人 (如 Flaschel, 2009; Helburn 和 Bramhall, 1986)。进行理论综合的人往往把两三位大人物的名字合起来作为代表, 如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等, 或者用“新” (neo-) 作为前缀, 如萨缪尔逊的“新古典综合”。或许“实证”是个更好的表述, “实证分析”可以覆盖更多的分支和学派。



续表

主题	学者和学派	本文参考的内容(章节)
需求形成过程	非均衡理论学派	2 需求形成过程
雇主和雇员的利益冲突	马克思	
价格和工资粘性	凯恩斯,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2 定价过程 4 凯恩斯式失业
凯恩斯式失业	凯恩斯, 非均衡理论学派	4 凯恩斯式失业
结构性失业	菲尔普斯	4 结构性失业
搜寻理论	菲尔普斯, 搜寻理论	4 不匹配调整、摩擦性失业和搜寻
效率工资	斯蒂格利茨—夏皮罗模型	4 效率工资
市场的不平衡性	奥地利学派	5 “均衡”概念的实用性
演化理论	纳尔逊—温特模型, 演化经济学	5 “均衡”概念的实用性
遗传倾向	凯恩斯, 行为经济学, 阿克洛夫—希勒模型	
损失规避	行为经济学	

表9的内容并不想面面俱到, 甚至没有全部包括那些曾经在本文中提到的学者和学派, 也没有给出名字或主题的索引。尤其不足是, 没有把可以纳入这个新的实证综合理论的所有著作、理论和命题都包括进来。不过这个表或许可以为理论综合的范围提供一些提示。

编辑这个表的目的并不是清晰地展示理论的发展史或“功绩”。中间一栏的名单并不必然代表是谁首先提出或发表了某个观点。表中记录的名字和其他内容, 是为了让读者知道我所参考的研究方向。

表中没有专门列出制度经济学的部分,<sup>①</sup> 因为我的整个研究的观点和理论框架都与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保持一致。这个学术传统在我过去的著述中也一贯如此。

<sup>①</sup> 制度经济学有很长的发展史, 最近几十年里的重要地位应主要归功于诺斯的研究成果: Douglass North (1990, 1991)。

我试图在表中强调，在构筑本文的思想框架的时候，我从其他学者那里借鉴了哪些元素。遗憾的是，这个蓝图也仅是半成品，整个理论框架还远未完成。不过我可以高兴地说，我所阐述的观点不乏知音，许多学者抱有类似的进行理论综合的目标。

在成功的可能性方面，看起来在劳动力市场实现这类实证综合的机会远高于其他研究领域。这或许是因为很少有人怀疑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具有过剩经济的特征，也不可能忽视失业问题的存在。其他过剩现象当然也存在，但不像劳动力市场这么引人注目。

在讨论理论综合的范围时，我几次提到实证这一特点。我从不回避现实。整理和综合的范围应该止于实证描述与规范分析（价值判断和政策建议）的分界线。跨越这条界线后，会出现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对于什么是“美好的社会”会有不同的观点和信仰。那将不再是保持客观性的问题，哪怕最迟钝的老学究也几乎不可能保持完全公正。

熊彼特是我的研究最主要的灵感来源之一，他的政治立场倾向于保守主义。米塞斯、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继承者们有关市场运转的解释给了我很多启迪，他们的政治立场属于右翼。凯恩斯是自由派政治家。尼古拉斯·卡尔多的思想与我有强烈的学术联系，他在英国工党的左翼十分活跃。新凯恩斯主义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在美国政坛上支持自由派的民主党。在分析过剩产能的时候，他们与今天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例如 James Crotty, 2001, 2002）有很多共同点。克罗蒂和该学派的主要成员是公开的左翼人物。本文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还借鉴了马克思的观点。

研究市场理论的经济学家们，有些类似于几位医生共同检查某个病人，他们得到了同一诊断结论，但对如何开具药方却出现了重大分歧。有人主张平静的化学疗法，有人主张进行手术干预，还有人认为既然病人反正会死，因此没有必要进行徒劳的治疗。<sup>①</sup>

对此我不再深入。例如，我不会对政府怎样应对当前的经济衰退提任何建议，虽然它与本文讨论的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我坚持认为，对于一个有清晰定义的科研领域进行实证描述和解释，才是本文的目的。我相信对理论、科学解

---

<sup>①</sup> 主张把实证研究方法 with 规范研究方法区分开的一篇著名文章是：Heilbroner (1986)。文中指出，马克思、熊彼特和哈耶克三人的行动方案有巨大差异，这不是因为他们对现象的实证描述有多大不同，而是由于各自的政治信仰。

释和研究方法进行广泛综合是可以实现的。

## 呼唤具有解释力的数学模型

在准备理论综合的思想清单中，有些理论带有数学工具，有的则没有模型。在这方面我并不希望在进行实证综合的时候有任何歧视。本文采取的是纯语言的表达方式，但如果理论研究者受到启发，尽可能地把这些思想设计成模型，那会是非常有益的。

有人认为，数学模型是经济学研究走上错误轨道的元凶，我对此并不赞同。但我同意，数学模型的采用和数学化的经济理论传授有很多缺点，给这个学科造成了伤害。但对这个复杂问题的深入讨论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列。

我不反对用数学模型来分析本文讨论的现象。相反是欢迎和鼓励。很多时候，重大的新问题是文字形式首先提出的，文字讨论可以对实际现象进行细致而多角度的描述，但这些只是科学理解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必须对概念进行更准确的定义，对其中的关系进行更严格的表述，从逻辑上清晰地显示何种条件对应何种结果。这些正是数学模型的用武之地。

我还没有在研究文献中发现有哪个模型能适用本文的思想，如果能找到，我会热心地学习，并用来检验和澄清我的命题。如果数学推导发现了某个严重错误，我会大胆地修正自己的思想。

但我认为，本文所关注的整个问题恐怕很难在单个模型中进行分析。如果一个模型能够对大问题的一个方面或分支进行检测，我就可以满意，下面是几个例子。

第2章在讨论供给、需求和定价过程的时候涉及动态系统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过程共同导致了过剩的产生。我认为，这一理论可以通过微分方程组来描述。模型可以揭示怎样的参数集可以消除过剩，或者打破系统的平衡，使其转向短缺经济状态？怎样的参数集会引起反方向的变化，使系统最终由于过剩的不断扩大而崩溃？这个系统模型的哪些特征可能使瓦尔拉斯均衡不稳定，使市场的长期状态表现为短缺经济或过剩经济？探索的方向或许是使用突变理论或分岔理论的数学方法。

我和其他几位研究者（Béla Martos、András Simonovits、Zsuzsa Kapitány）

曾设计过一些模型（参见 Kornai 和 Martos, 1971, 1981），模型中可以出现过剩现象，存货的增加和减少是过程控制的主要信号，我们用的数学工具是微分方程。研究结果确认，这样的系统是可行的，容易受到控制。当然我们当时简化了设计，把技术和生产结构作为不变量处理，也没有关注本文的中心思想：持续变化和更新、熊彼特的创新课题等。

有一些重要而有趣的模型（其开创性研究参见 Aghion 和 Howitt, 1998）展现了熊彼特的思想，但它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创新现象，大多数模型都没有内在的激励和迫使创新的机制。

前文提到过研究规模经济递增的数学模型（Arthur, 1994；Helpman 和 Krugman, 1985），这些模型有很多优点，但还没有被用于研究熊彼特的创新过程。

这方面的课题在数学上很难处理，在我看来，它们与液体和气体流动、气象变化或基本粒子运动等物理现象有相似之处。我还提到，它们与生物进化过程存在明显的相似性。或许那些学科的数学方法可以为这方面的模型设计提供参考。最适合的数学方法可能来自随机过程理论。

或许我们需要一个约翰·冯·诺伊曼（John Neumann）那样的天才来设计一套新的数学工具，以准确表达我简要描述的内容？在这样的天才出现之前，其他经济学家们可以选择两条研究道路。第一条，把研究主题限于经济学家们现有的数学知识可以回答的问题上，放弃为本文的大多数问题建立研究模型。第二条，不回避那些极其困难的问题，但只是用文字描述的方法来回答。我们知道这样的回答是临时性的、不完整和不精确的，但仍然有助于加深我们的理解。我本人所选择的就是后面一条。

## 7. 对特殊情景的讨论

到目前为止，本文一直在尝试对过剩经济进行一般性讨论。过剩的规模、比例和结构在各个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从表 2 中可以看到，各国的产能利用率集中在 80% 的平均水平附近，彼此的差异源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过剩产生的机制构成在各国不同细节。

本文并不分析各国的差异，当然这个内容并非不重要。本章要讨论的是过剩经济的市场状态和机制的临时变化，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划分时间界限。

## 商业周期的波动

产量水平不管高低，都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处于波动中，这个事实人所共知。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详细分析了需求、供给和价格在短期内的共同调整，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本文的主题不在于此。

经济学各流派对于商业周期的波动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是指中期的波动。对波动的准确测算以及某些重要概念的定义（例如，衰退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已取得了共识，但有关周期的成因、影响的评价以及作为应对的政府经济政策，争论已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在最近一轮的经济衰退发生后（或许将延续到下轮衰退之前），争论更加激烈。在政治家、经济顾问和学者们中间，观点尖锐对立。

有关商业周期波动的争论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理论价值，但本文的主题不是市场的中期运动，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永恒的、制度性的特征。当我着手执行这一艰巨任务时，曾经考虑到，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们会被中期问题所困扰，忙于向政治家和商业领袖提供克服衰退的实际建议，但我还是坚持下来去研究长期的持续现象。经济学家们中间有劳动分工，必须有人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我自愿承担这个任务，因为我的研究专长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这为探索它们之间的长期差异提供了基础。

在上述申明之后，下面将发表几点评论。我希望说服读者，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衰退、复苏和周期问题上的时候，我的思考也和这些问题有关。中期的经济波动的原因和影响，其实与它们所处的长期持续的市场状况密不可分。

即使在高度波动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市场状态依然位于过剩经济的界定范围内（参见第5章）。即使在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当优秀企业的订单已排满，存货减少，产能利用率提高，失业率降到很低，许多地方甚至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过剩经济也不会跃迁到短缺经济。

我们再看看前文的图2：美国在1965~2010年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其中灰色的区域表示衰退时期。曲线出现强烈波动：产能利用率在衰退时期降到很低水平，但从未有哪个年份实现产能的充分利用，只在少数几年达到88%~90%的高度。利用率曲线以上的区域表明，存在持续的工业产能过剩，幅度在

12% ~ 35% 之间波动。

一般地说，商业周期的波动局限在持续的过剩经济的范围内，这个范围是有边界的。如果经济迅速增长，就可能达到甚至突破最高界限，打破过去的纪录。<sup>①</sup>但是在靠近乃至超越边界的时候，各种保护性的机制将发挥作用。有些机制是自发产生的：某些市场泡沫会自行破灭，其快速下滑还会拖累其他市场，过多的需求会导致价格和工资上涨，引发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研究周期波动时所说的上升周期（中期现象），与本文总结的过剩经济的特征（长期现象），对这些现象有着一致的描述。

有关普遍过剩为何能在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争论，可以追溯到数个世纪之前。教条主义者援引“萨伊定律”，试图证明任何供给都会创造出等量的需求。如果这个说法正确，显然就不可能存在普遍“过剩”。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诞生后，这一古老的争论重新提起。我要强调，当时的争论是关于整体经济在短期内是否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凯恩斯主义认为有可能。本文则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固有特点就是长期持续的过剩经济。

即使不考虑时期长短问题，也还有一个区别需要注意。本文一直避免使用“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的说法，如果严格地采用“持续的生产过剩”这一说法，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总产能足以提供的产量远远超过所有购买者的购买力之和；（2）过剩的产能被全部或几乎全部利用起来；（3）经济增长率导致这一失调现象长期持续。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会导致存货的超额增长，存货相对于产量的比例持续提高。“库存的咖啡被倒入大海”，这样噩梦般的景象会让人想起当年的大萧条。

我在这里试图更精确地描述生产、消费、供给和需求的动态过程。很大比例的闲置产能长期存在（机械、设备、厂房或劳动力），但这些只是“潜在产量”，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产品过剩”。经济运行中有大量存货储备，可以给买家提供选择，促进竞争，帮助减少机器设备的调整摩擦。但它们并不伴随着持续的存货扩张，至少因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会淘汰一部分产能和存货。

下面谈谈对因果关系的一致看法。

---

<sup>①</sup> 我这里要再次提到“走廊”理论（Leijonhufvud, 2009），我所说的过剩经济的值域界线，相当于走廊理论中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在正常条件下的运动范围。

本文用来解释过剩现象持续存在的原因，与某些危机理论用来解释短期过剩现象的原因是相同的。本文对需求过程持续落后于供给过程的描述，与凯恩斯及他的众多门徒所说的需求不足是短期危机的原因有相似之处。我希望，尽管存在很多相似，但大家已经清楚，本文的观点与那些理论是在回答不同的问题。

我所陈述的理论并不表示，这是一个更庞大的宏观经济供给受到更庞大的宏观经济需求约束的案例。如前文所述，我提出了很多有关概念和测算的问题。我试图将研究主要建立在微观基础上。在垄断竞争中，生产商和销售商在增加供给产品数量的同时改进了质量，开发了技术。许多厂商经常会在微观层面遇到需求的约束，尤其是在技术上落后于竞争对手或由于其他原因不受客户欢迎的时候。在有些情况下，某种创新会使市场上出现短缺，但过剩现象最终会变得更普遍、更频繁。

研究中中期周期波动的经济学家们密切关注的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实证分析以及经济政策建议。我的论述没有涉及后者，而是致力于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过剩经济。不过既然已接触到周期波动议题，我想指出，有关持续性过剩经济的研究可以为反周期政策的设计提供某些参考。

我们应该深入思考一下，生产、投资和信贷的扩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遗传倾向来解释？剩下多少是来自政治家、政府、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的错误和过失？即使承认前者是主要因素，也并不意味着必然采取消极的立场。然而在行动时需要认识到，经济的上升期是由巨大能量推动的，试图抗拒这种能量需要杰出的智慧和专业知识。

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更普遍的认识：扩张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在扩张最终遭遇环境制约的时候，就会出现收缩，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波动倾向。

承认这些并不表示监管没有意义，但试图帮助决策者设计监管体制的经济学家们应该抛弃幻想。在1960~1970年代的匈牙利改革争论后，人们发明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法：“监管谬误”（regulation fallacy）。<sup>①</sup>政府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监管和偶尔的干预来控制事态，然而企业层面的决策者却知道如何钻政策的空子，这就仿佛一场军备竞赛，新武器的发明会不断招致更新的对抗武器。

或许这方面最主要的启迪是，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影响并不全是有害或痛苦

---

<sup>①</sup> 这一术语来自 László Antal (1980)。

的，有些影响是积极的、推动进步的。康德拉季耶夫（N. D. Kondratiev）和其他人的先驱研究以及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的名著（1939）都认为，技术进步在经济扩张期间呈现加速趋势。用今天的经济学术语来说，在每次光辉的增长期不应该只看到越来越多不负责任的企业的相互勾结，还应该看到更多更快的创新。在互联网泡沫时期情况即是如此，泡沫的高潮伴随着信息通讯产业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创新的过程意味着尝试，每一次成功的背后可能有十次甚至百次失败。事后来看很容易说不应该把钱花在失败的项目上。过于严格保守的货币市场或许能够在短期内保持微观上的平衡发展，但也会束缚创新，因为创新总是伴随风险，有时甚至是非常高的风险。

反周期政策在周期的下行期间也是把双刃剑。第2章讨论过创造性破坏，它会淘汰大量的过时产品，消灭很多就业岗位。但在衰退期间，社会的团结精神和政治的选举机制会带来保护就业的要求，这会给革新造成阻力。

熊彼特和凯恩斯的较量是学说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今天来看，凯恩斯所说的“长期”已经足够长，他们二位也都早已作古。我们现在应该看看能够从他们的思想中整理出哪些内容，他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补，在哪些方面又是不可调和。

我这里要再次区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方法。看起来，熊彼特和凯恩斯的某些思想可以综合起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转。<sup>①</sup>但这里简单描述的实证综合还不能对此得出明确的结论。

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回顾两位大思想家的著作，具体分析他们为当时提供的政策建议，我考虑的是那些高举凯恩斯或熊彼特旗帜的人们所做出的贡献。本文对某些问题的思考与凯恩斯主义的某些重要观点一致，但并不等于支持庸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如，不惜代价放松总需求约束，以更多地利用产能）。本文的思考也和熊彼特主义的某些观点一致，但同样不等于鼓励庸俗熊彼特主义的经济政策（如，让危机随意肆虐，因为创造之后必然带来破坏）。

我的分析发现了某些深刻的伦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两难困境。我并不打算向华盛顿、柏林或布达佩斯的决策者们提供什么建议，我只想就本文的研究思路向经济顾问们提出告诫：所有可能的干预手段都可能有不确定的后果。

---

<sup>①</sup> 把凯恩斯和熊彼特的理论综合起来已经成为时髦，一系列研究成果都在文章标题中作了宣告。



本文还给经济决策者们提供了另一个及时的启发。有关危机的国际讨论的焦点一直放在金融产业，原因几乎都归结于金融产业的监管松弛、监管机构的组织缺陷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扭曲上。实体经济的运转机制如何，哪些领域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闲置产能，经济体的各个产业部门如何能够更好地协调发展，这些问题受到的关注太少。

## 战时经济

在战争期间，所有社会活动都会受到影响，包括经济的运转。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有多少资源被用于战争，它反映在几个指标上，特别是多大比例的 GDP 和劳动力在为军事部门提供直接服务。如果比例较小，资本主义经济将依然是一个过剩经济，仅会出现零星的短缺现象。军事活动的需求越大，战争的全面性质越突出，短缺现象的倾向就越严重。政府将对家庭实行配给，市民需要排队领取食物，官僚机构负责分配稀缺的原材料和半成品。随着战争的延续和破坏区域的扩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将更加强烈。<sup>①</sup>

“二战”就让世界上很多国家品尝了短缺经济的滋味，它们在战争期间依然保持着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战时经济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过剩经济”这条因果链不能机械地或无条件地套用。战争时期的临时状况会制约或阻止产生过剩经济的机制，启动产生短缺经济的机制。

历史经验显示，一旦和平恢复，短缺经济或快或慢将重新让位于过剩经济，因为资本主义的基础犹在。例如，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建立了强大的官僚化的中央经济控制体系，还遭受了战争的惨烈破坏，供给非常紧缺，但不过数年时间联邦德国就从短缺经济恢复成典型的过剩经济。

相比之下，在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私有财产被广泛没收，市场经济机制受到破坏，它们还来不及从战时的短缺经济中恢复过来，就陷入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短缺经济。

---

<sup>①</sup> 有关战时经济的研究文献，我要特别提到 Galbraith (1952)、Milward (1979) 和 Olson (1963)。

## 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变化和持续倾向

本章的第1节讨论的是短期波动，第2节涉及战争引起的短缺经济，它可能延续数年，但仍然是短期现象。下面讨论持续性的倾向：稳定的、连续的、有阶段性的变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全部影响表现出来，但这些变化非常深刻，会给社会与经济的运转带来本质上的改变。影响也表现在本文所分析的运动过程上。

### (1) 福利国家的成长

作为20世纪福利国家的基础的社会服务体系，起源于19世纪后半叶欧洲的某些发达国家。各国的福利体系的范围和程度不同，但在所有发达国家广泛存在。

我这里并不想卷入有关福利国家通常由哪些要素构成的概念和统计上的争论，毫无疑问，其中包含若干免费或廉价的服务，例如医疗、教育、儿童看护、残疾人和老年人护理等等。这些活动都是由公共资金支持的，来自税收或强制捐献等准税收。

在免费或接近免费的公共服务的配置和使用中，普遍存在短缺现象。整体的经济环境基本上是过剩经济，伴随着所有常见的副作用，但在过剩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能看到短缺经济的孤岛：医生的诊所人满为患，病人可能需要等候数小时，手术和诊疗的排队名单可以达到数月之久（表10）；病人选择医生或医院的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事实上，有的医疗制度完全不给病人这方面的自由选择，必须接受指定的医生和医疗机构；强制替代的概念也适用于医治过程，病人可能得不到想要的药品、治疗或医生，而被迫接受分配的结果。

表10 西欧国家医疗服务的等候时间（2004年，星期数）

国家	专家门诊	门诊手术	住院手术
奥地利	1.83	3.11	7.91
丹麦	5.27	10.24	9.44
法国	3.14	3.30	8.14
荷兰	3.47	5.63	11.48
意大利	2.93	12.00	9.40

续表

国家	专家门诊	门诊手术	住院手术
德国	1.84	3.08	6.49
西班牙	4.94	17.60	24.10
瑞典	9.65	18.46	28.14

注：表中指标的计算依据来自 Survey of Health, Ag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SHARE)，包括 9 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样本。数据来自该调查的第一阶段的成果。受访者需要回答如下问题：

- (1) 为接受专家门诊需要等待几个星期？
- (2) 上次门诊手术等待了几个月？
- (3) 上次住院手术等待了几个月？

为进行比较，答案都被换算成了星期数。

资料来源：Siciliani - Verzulli (2009, 第 1299 ~ 1300 页)，SHARE (2010)。

需要注意，这样的短缺现象并不限于政府直接管理和资助的福利网络，那些大型的、机构化的、受到严格监管的私人保险制度的客户也可能有类似经历。美国的医疗体制能提供这方面的经验。在美国的医疗体制中，存在各种等级的服务，一个极端是少数有能力自掏腰包，请最有名的专家、去最昂贵的私人医院的人，我们此时又能看到过剩经济的典型特点：服务商有强烈的经济激励来做好自己的工作，客户则有充分的选择空间等。另一个极端是完全没有保险的人，很多人只能求助提供免费服务的紧急医疗机构，即使他们的病情并非危急，也会去那里尝试医治（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计划有可能大幅减少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这个部分是典型的短缺经济特征：拥挤，排队，往往会受到傲慢和粗鲁的接待等。在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其他等级，短缺经济与过剩经济的特点交织出现。许多雇主会给雇员提供一份费用清单，让他们从中选择保险计划。较廉价的选项可以降低缴费标准，但没有更多的医生和医院可供选择。指定的医生在诊断、开药和手术建议时也会遇到各种限制。保险计划越是昂贵，病人就越能感受到过剩经济的好处。最昂贵的保险计划可以提供几乎无限的医生和医院选择，承保人会为医生和病人同意的服务埋单。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虽然政府管理和资助的公立医疗部门所占的比例很大，但医疗产业中也包含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纯粹商业化经营的私人部门。其中包括私人拥有的医院、疗养院和诊所，独立执业的医生以及营利性的实验室，还可以包括制药产业、医疗设备制造商和药店等。私人医疗部门的运转具

有典型的过剩经济的特点。<sup>①</sup>这在制药产业尤其突出,存在激烈的垄断竞争、活跃的创新、丰富的选择、汹涌的广告、对消费者的操纵,以及经常被藏在暗处的对处方医生的贿赂等。

医疗服务的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相反,某些教育服务的需求却可能已被过分满足。各国的法定教育年限存在差异,但是对法律规定的年龄段,教育需求的规模应该是已知的。<sup>②</sup>市场的一般状态导致的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突出,一旦高等教育免费或者廉价提供,短缺经济的常见症状就会出现:申请人太多。可以接受的学生人数要么受到严格限制,要么在招生人数太多后,导致教室的过分拥挤和教师的超额工作。高等教育机构会变成文凭工厂,以牺牲质量作为代价。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比例过高。<sup>③</sup>

而在那些没有把高等教育视为普遍权利、必须收费的国家,机构和服务的提供以及申请人数则表现出接近过剩经济一般状态的特点。过剩现象也伴随着短缺,例如申请名牌大学的学生太多。过剩经济的产生机制在发挥作用:垄断竞争、创新和供给方的活力等。希望得到并有支付能力的人将获得高等教育,没有支付能力也未能获得奖学金的人则将失去机会。

应该如何界定免费的福利国家服务的范围?适用怎样的条件?这方面的选择会遇到某些严重的伦理和政治两难。一方面是改进效率和提高质量的需要,另一方面要考虑人权平等和社会正义。

我在其他研究中从规范分析的角度讨论过福利国家的问题(Kornai and Eggleston, 2001),本文主要是对极其重要的历史倾向的实证分析。在一个过剩经济体中,与福利国家制度有关的免费服务的范围越广、水平越高,短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于是我们听到,反对福利国家制度的保守主义者在高呼,“我们被社会主义占领了!”幸运的是,那只是口号,而不是实情。免费的公共服务的确带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特征,会产生深刻影响,有好有坏,有进步,也有破坏,

---

① 哈佛大学的瑞尔曼(Arnold Relman)研究了美国医疗体制的商业化现象,发现没有监管的“企业家主义”(entrepreneurialism,这是瑞尔曼的说法)导致了过度供给和过剩产能(Relman, 2010)。

② 但是在质量较差的学校,教育的供需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缺口,因此我们能在义务教育领域看到过度供给和过度需求并存的现象。

③ 文凭工厂的产量超出许多国家对高学历劳动力的需求,高素质的员工经常从事低端的工作。免费的教育服务导致需求膨胀、产量增加,毕业生过度供给。

包括短缺现象，但这不是事情的全貌。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开始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和高等教育服务时，议会民主制度并没有崩溃，也没有秘密警察组织的横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压制式的政治权力集中和垄断。福利国家制度则是在民主政治的宪政框架内建立的，其运行与民主制度协调一致。

## (2) 预算约束的软化

建立在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个主要特点是“软预算约束”综合症。<sup>①</sup>这一特点加上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了短缺经济的出现。

可是，软预算约束并不限于社会主义制度。我已经几次提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同样会出现，例如，在政府出手拯救那些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时候，包括医院、大学、小农场、银行以及地方政府等。这样的救助行动往往会引起广泛的关注。

救助的影响不限于受救助的对象，还会波及其他经济当事人。救助行动越是频繁和重大，各种机构的负责人就越是相信，自己在遇到麻烦之后也会得到政府的援手。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我得到的印象是，预算约束的软化成了一个长期的趋势。在资本主义启蒙时期，人们都抱着铁石心肠去收债。后来，财务纪律开始松弛下来，救助行动越来越常见。由于担心少数大企业、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破产，会引发连锁式的企业倒闭和清算风波，政府进行救助几乎不可避免。

这样的预算约束软化会如何影响整体经济的过剩特征呢？

可以预计，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都指向过度供给的方向。第一个影响在第2章有关供给过程的部分已经做了解释，认为闲置产能的出现和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影响被削弱是过度供给的原因之一。即使预算约束依然严格，受到创新冲击、在竞争中失利的企业仍然会尽可能久地支撑下去。例如，在塑料制品得到普及，机械设备小型化降低了对钢铁产品的需求之后，“锈蚀地带”的产业依然维持了很长时间。老板们接受了利润的缩水，员工们也愿意忍受低工资，不希望彻底失去工作。我在前文指出，求生的本能自然就会产生闲置产能。还要考虑到雇主、雇员和当地居民给政府施加压力，拯救和维持那些夕阳产业。这些施压往往能获得成功。或者说，预算约束的软化阻挠了破坏过程，过剩产能没有被及时消灭。

许多国家在农业领域遇到过类似情况。市场竞争会淘汰许多农场，尤其是

---

<sup>①</sup> 理论和文献综述参见 Kornai、Maskin 和 Roland (2003)。

技术过时的小农场。然而，农业领域的游说集团可以通过政府补贴在很长时间内维持这些亏损的农业组织的运营，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大量剩余的出现和持续。

预算约束软化的第一个影响是减缓产业退出，改变供给过程，第二个影响则是加速产业进入。

这里我要超越本文原先设定的范围，讨论一下金融产业的贷款业务。预算约束的软化和救助预期的反复强化，导致银行对贷款业务的责任心下降。太多时候，轻易得到的贷款形成了新的产能，结果导致过剩产能的持续膨胀。

如果在企业失败的时候很有希望获得政府救助，借款人和贷款人都会产生过分冒险的倾向。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受到硬预算约束的遏制。预算约束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软化后，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带着社会主义投资决策者的气魄进入高风险投资项目，许多果然没有失望。本次经济衰退中，我们也看到，在汽车制造等产业的庞大过剩产能和滞销导致财务崩溃后，美国和欧洲国家给许多大企业扔去了救生圈。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讨论经济政策中的救还是不救的两难问题，每个救助决策背后都关系到严重的宏观经济和社会问题，牵涉到政治和伦理上的困境。我想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指出的，仅仅是这种长期倾向的存在。

作为对预算约束软化的总结，让我们回到一个实证的观点：尽管软化的趋势很明显，硬预算约束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 (3) 全球化

为简化起见，之前的论述并未涉及国际贸易。不过，在讨论垄断竞争的时候，一个生产商显然不但需要与国内对手较量，还要对付进口产品。进出口贸易已有数千年历史，到今天，由于全球化这一复杂而广泛的变化进程，国际贸易的作用已大大提升。

让我们看看进口的影响，它和“可以立刻动用的过剩产品”非常类似。进口产品不需要摆上货架或者仓库，已足以让国内厂商感到竞争压力。如果能通过进口获得质量相当，甚至更好，或者价格更为便宜的产品，就足以引起过剩经济现象。

全球化的一个影响是，过剩产能的分布在全球范围内不停地改变。许多出口产品的生产正在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兴起，欧洲和北美提供类似产品的企业则遇到销售难题。它们不会马上关门，有的会调整产品类型，继续生存，有些早晚会被淘汰。总之在剧变时期，它们的产能大量闲置。

许多曾经落后的经济体在迅速成长，形成新的产能，并把目标市场主要瞄准发达国家。然而，发达国家的市场扩张速度落后于投资者的预期，过剩产能也会出现。<sup>①</sup>

#### (4) 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在讨论快速进步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买卖双方关系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互联网时代之前的情形，回顾第4章所讨论的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几个话题。买方和卖方必须相遇，这被称为匹配问题。生产商需要了解用户的信息，卖方需要了解买方的信息，以及相反的信息流等。前文曾指出，这个问题不是某个制度特有的。所有的经济制度都要求生产商与消费者、卖方与买方的匹配，所有人都需要信息。但制度特点却会影响作用过程，过剩经济和短缺经济这两个经济体系，在信息获取成本由哪方承担和信息获取的程度上，存在重大差异。

在短缺经济中，主要靠买方去获取信息，买方可能在第一家商店找不到自己需要的物品，再去其他商店寻觅，如果运气好，或许能如愿以偿。类似的，生产企业的采购员必须努力搜索需要的原材料和半成品。

有些信息收集工作是由官僚组织负责，在计划经济体系内，对某些关键投入品进行分配。生产商和销售商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很舒适。它们完全不需要亲自去寻找客户，官僚组织会给它们安排销路，或者客户自己会找上门来。

在过剩经济中，寻找必要的信息流的任务则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官僚组织不发挥作用，大多数努力来自卖方。庞大的广告工具采用轰炸的办法给客户传递基本真实的信息，当然前文也曾指出，有些信息是单方面甚至完全误导的，试图操纵消费者。

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前，过剩经济中的买方也不是完全不承担搜索信息的任务。与社会主义经济不同，市场上的价格不是统一的，买方会基于自己的利益去搜索最低廉的报价。卖方的竞争并不限于价格，它们会提供额外产品或特殊产品、不同品质的产品，甚至全新的产品。某家商店中没有的商品可以去其他商店找，或找到非常类似的，或许更好、更便宜的替代品。的确，作为过剩经济的突出优势之一，丰富的选择是促使买方搜寻信息的另一个动力。<sup>②</sup>

---

<sup>①</sup> 其中一篇文章是：“China: the vicious circle of excess capacity” (Artus, 2009)。

<sup>②</sup> 我夫人曾经在1970~1980年代和我一起经常往返于匈牙利和美国，她经常说你在布达佩斯必须逛商店，因为有短缺，需要追踪有哪些商品出现。其实我们在美国也要花同样多的时间逛商店，但主要是想找最合算的价格，发现促销机会，或者在很多的选择中挑选出最合意的。

互联网的到来使这种传统的劳动分工发生了巨大变化。买方如今可以更轻松地获取更多的供给信息：有哪些物品在销售，价格如何，什么地点等？不再需要亲自去各个商店，也不需要打很多电话，屏幕上可以显示大量的信息。

卖方也认识到了这个变化，它们不但利用网络来传播信息和操纵消费者，还把寻找合适产品的更多任务转嫁给客户。这部分是出于财务上的考虑，也是诚实的商业手段，例如，买方通过网络订货的话，卖方可以提供更好的价格优惠。但除了这种正确的节省成本的策略外，经常也有不诚实的动机：卖方试图把所有的信息搜集成本都转移给买方。例如，有些厂商让客户很难通过传统的渠道做生意，这对于那些不善于使用电脑和网络的人来说尤其麻烦。

在现代社会中，所有这些都改变第6章第3节中曾讨论的买方和卖方的相对力量对比和负担分配（客户掌握主导权还是被操纵）。

##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导向改革以及后社会主义时期的转轨

目前有大量的研究文献描述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市场导向改革，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中国的案例。后来的书籍和文章则关注了苏东地区的国家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转轨。我这里是从一个主视角来看待世界历史的这个改变：市场的一般状态所发生的变化。

让我们从1949年开始，南斯拉夫那时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传统形态的短缺经济统治着从民主德国到中国的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少数国家（以南斯拉夫为首，然后是匈牙利）开始偏离完全由中央控制、导致持续短缺经济的体制，于是在短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出现了过剩经济的孤岛。<sup>①</sup> 例如，1970年去布达佩斯市中心的食品商场，商品的丰富多样会令人感到窒息，但同时，这个城市的人们却要为了电话、汽车和住房排队等候数年之久。

1989~1990年的政治剧变也带来了经济上的强烈变革，改革的次序和速度在各国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对国有企业迅速实行了私有化，有的则是缓慢推进。过剩现象和短缺现象到处并存。某些地方快速和激进地实现了市场化，有些地方则拖延进行。两种现象的相对比例与所有制和调节机制的改革大致保持同步：过度需求与过度供给，短缺经济与过剩经济。

---

<sup>①</sup> 我在前文曾用同样的比喻来说过过剩经济中的短缺经济孤岛。



随着经济转轨接近尾声，过剩经济明显占据主导。这一历史变革从传统的斯大林式的短缺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过剩经济，或许是对本文所表述的思想的最生动的展现。<sup>①</sup> 为清晰起见，我附上了表 11，重新分析了第 2 章讨论过的电话服务业的案例。表 11 显示，体制转轨前存在的电话短缺现象是多么严重，那也是短缺经济中最痛苦的案例之一。但在 1989 ~ 1990 年之后，短缺很快消失，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使用迅速普及。

表 11 中东欧国家的电话排队情况 (1971 ~ 2007 年)

时间	保加利亚	捷克	匈牙利	波兰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1971 ~ 1975	n. a.	25. 10	36. 60	33. 60	n. a.	n. a.
1976 ~ 1980	n. a.	30. 20	47. 20	45. 70	n. a.	n. a.
1981 ~ 1985	n. a.	11. 30	55. 50	57. 10	n. a.	n. a.
1986 ~ 1990	23. 50	18. 69	58. 99	73. 20	77. 84	n. a.
1991 ~ 1995	20. 36	25. 49	41. 72	51. 20	98. 38	8. 82
1996 ~ 2000	11. 09	7. 19	2. 89	10. 39	56. 75	3. 77
2001 ~ 2005	3. 21	0. 77	0. 51	3. 75	23. 13	0. 44
2006	1. 95	1. 01	0. 46	1. 30	6. 34	0. 21
2007	0. 20	0. 81	0. 52	n. a.	4. 87	0. 15

注：表中数据显示的是排队等候安装固定电话的人数与已有固定电话用户数的百分比。“捷克”一列的数据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数据。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在“1986 ~ 1990”一排的数据是指 1990 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转轨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的数据来自：Kornai (1993, 第 238 页)。其他数据来自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09) 和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2006, 第 104 ~ 112 页)。

在为本文收集数据的时候，我必须遗憾地总结说，虽然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居民都感受到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却没有多少时间序列数据足以表现出来。对于发达国家经常发生的反复的周期波动，我们有上百个经济、商业和金融指数进行追踪。但对于经历了如此特殊的、不会重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轨的东方国家，却不得不说只有很少的统计调查和时间序列数据可用。<sup>②</sup>

<sup>①</sup> 后社会主义时期体制转轨的实证研究，可以参见文献综述：Djankov 和 Murrell (2002)。那些最完整可靠的研究都得出了下面的结论：企业部门重组和生产率提高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卖方竞争的加剧 (第 20 ~ 21 页)。

<sup>②</sup> 一个例外是达托格在匈牙利做的生产制约因素的调查 (Kopint - Datorg)，这个时间序列始于转轨前的 1987 年，一直延续至今，没有中断或改变方法，可以进行跨时期比较。其调查结果的图示见图 5，完整的数据见附表 A. 1。

这样的历史机遇将永不再有了。

## 8. 后记

本文从讲述我的直观印象开始，最后又回到这里。

对短缺问题的研究从我的第一本书开始，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1956年，那也是我的博士论文 [Kornai, 1994 (1959)]。自此，短缺问题一直受到我的关注，也是后来的两本书的主题。我当时的看法迄今没有改变，并且一直看到，短缺经济有它的对立面。我希望自己在描述和解释这个现象时所用的分析工具在本文中已有所改进，可以更完整和更公平地评价两种市场状态的优缺点。但我还是坚持自己最初的观点。

我想，处于后社会主义转轨地区的很多人同样感受到了市场的这一变化。我知道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是用其他概念思考，他们看到市场的均衡，而我没有，我只看到市场状态幸运地从短缺经济跃迁到过剩经济。我喜欢借用的一个类比是埃舍尔 (Escher) 画的天鹅。从同一幅画中，有人看到从左向右飞翔的白天鹅，有人看到从右向左飞翔的黑天鹅。

另外一个与此有关的类比是我曾经在多马的论文中读到的内容。<sup>①</sup> 印度的一个故事说，国王让几位盲人去摸大象，讲讲各自的感受。结果每个人都只摸到大象的一个部位，讲述的内容大相径庭。摸到象腿的人说是柱子，摸到象鼻的人说是又细又长的软管……大家彼此争吵，都自以为正确。

我已准备好迎接争吵，但在此之前还是得谦虚地说，我其实也是盲人。大象是如此宏伟，我只能探索到很小的一部分。

(余江 译)

---

<sup>①</sup> 多马的论文题目就是《盲人与大象，对“主义”的评论》(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t: An Essay on Isms, 1989)。他谈到，给他讲这个故事的人是著名的印度裔美国籍苏联问题专家帕德马·德塞 (Padma Desai)。

## 附 录

表 A.1 制约匈牙利工业生产的因素 (1987~2010 年)

季度	调查 时间	无 制约	需 求不 足	劳 动 力 短 缺	高 素 质 劳 动 力 短 缺	原材料、零部件供给不足				不 清 楚 的 经 济 管 制	不 确 定 的 经 济 环 境	
						国 内 来 源	进 口	从 卢 布 区 进 口	从 美 元 区 进 口			产 能 不 足
1987.1	1987年4月	13.0	26.0	22.2	41.2	42.6			7.2	31.2	0.0	42.8
1987.2	1987年7月	10.3	27.4	23.7	42.3	46.7			6.7	24.3	28.5	42.9
1987.3	1987年10月	11.2	21.3	24.1	46.6	50.4			8.2	22.1	22.0	42.1
1987.4	1988年1月	17.0	24.1	15.8	39.4	41.8			4.6	20.4	20.4	45.8
1988.1	1988年4月	10.7	28.0	15.7	50.0		50.0	32.8	6.3	32.7	24.8	45.3
1988.2	1988年7月	10.8	28.3	24.7	44.1		44.1	35.3	7.9	36.4	27.1	42.2
1988.3	1988年10月	11.8	27.3	23.0	45.3		45.3	64.0	8.6	35.0	31.2	47.6
1988.4	1989年1月	16.5	30.7	19.3	38.5		38.5	22.4	6.1	40.1	25.3	46.9
1989.1	1989年4月	10.8	38.0	21.5	37.6		37.6	17.9	4.7	49.6	23.9	46.6
1989.2	1989年7月	14.7	40.1	22.0	28.7		28.7	11.8	7.1	46.1	22.0	41.5
1989.3	1989年10月	12.7	40.4	21.9	27.5		27.5	8.9	5.2	46.8	24.6	42.6
1989.4	1990年1月	13.6	51.2	13.4	21.4		21.4	6.3	0.7	49.4	21.2	54.6
1990.1	1990年4月	10.8	51.3	12.1	13.8		13.8	3.9	3.6	57.8	16.4	50.9
1990.2	1990年7月	8.7	56.1	13.9	13.0		2.2	3.3	45.2	1.6	47.3	
1990.3	1990年10月	6.9	51.0	10.3	15.3		15.3	5.2	2.5	51.9	17.2	54.1
1990.4	1991年1月	8.9	54.5	4.3	11.3	3.7	2.7	48.7	20.4	54.7		
1991.1	1991年4月	6.0	60.6	4.3	9.4		9.4	2.6	3.4	53.2	12.6	47.9
1991.2	1991年7月	5.5	70.1	4.0	7.1		7.1	2.4	1.3	54.1	9.9	43.0
1991.3	1991年10月	7.0	66.8	3.3	6.2		6.2	2.0	1.8	52.7	13.5	40.4
1991.4	1992年1月	0.0	65.9	3.0	7.2		7.2	1.0	2.7	47.3	13.7	42.3
1992.1	1992年4月	7.0	65.1	3.3	5.8		5.8	1.0	2.3	51.0	15.1	47.2
1992.2	1992年7月	6.9	62.2	7.4	5.9		5.9	1.5	3.7	45.9	15.0	43.0
1992.3	1992年10月	6.8	56.1	4.4	10.5		10.6	3.1	2.8	47.8	18.2	51.3
1992.4	1993年1月	9.2	54.5	4.8	8.7		8.7	2.3	3.3	42.9	15.6	45.9
1993.1	1993年4月	7.4	57.7	2.2	6.1	1.3			2.4	45.5	13.9	40.4
1993.2	1993年7月	6.4	68.8	3.0	8.0	3.2		3.2	47.3	11.0	44.0	
1993.3	1993年10月	9.6	67.9	3.7	7.5	3.1		4.5	46.6	10.6	42.4	

# 比较

(第五十七辑)

Comparative Studies

续表

季度	调查时间	无制约	需求不足	劳动力短缺	高素质劳动力短缺	原材料、零部件供给不足				产能不足	财务问题	不清楚的经济管制	不确定的经济环境
						国内来源	进口	从卢布区进口	从美元区进口				
1993.4	1994年1月	10.9	62.5	4.3		9.4	2.4		4.6	47.3	14.4	46.6	
1994.1	1994年4月	11.4	59.0	4.3		9.5	2.4			4.5	44.7	11.9	38.5
1994.2	1994年7月	11.7	59.5	6.7		7.1	2.9			6.5	42.4	10.7	39.8
1994.3	1994年10月	12.7	58.2	6.5		11.1	3.0			7.6	44.4	11.3	41.2
1994.4	1995年1月	13.2	55.0	7.8		10.1	2.2			5.4	40.0	14.6	40.9
1995.1	1995年4月	9.8	55.0	4.3		13.5	2.6			6.9	44.8	17.0	46.0
1995.2	1995年7月	8.1	60.2	7.4	10.2	5.1	7.1	42.4	16.8	43.1			
1995.3	1995年10月	9.8	54.2	8.5	12.9	2.8	4.6	45.0	16.2	45.2			
1995.4	1996年1月	11.1	56.2	4.1	9.4	2.6	6.1	41.0	18.7	45.8			
1996.1	1996年4月	9.9	65.3	5.1	14.4	8.0	4.8	4.1	37.3	13.6	34.6		
1996.2	1996年7月	11.5	65.7	4.6	12.1	5.5	3.2	4.6	36.9	11.8	32.6		
1996.3	1996年10月	12.1	58.0	6.0	17.0	7.4	4.8	5.5	30.8	14.0	36.0		
1996.4	1997年1月	10.9	61.6	3.6	14.9	7.1	2.1	5.0	30.1	17.1	33.6		
1997.1	1997年4月	14.0	61.0	3.7	13.5	7.9	2.8	4.5	30.1	16.0	34.0		
1997.2	1997年7月	15.2	63.0	4.4	15.0	5.3	1.5	4.1	27.9	16.1	30.2		
1997.3	1997年10月	19.0	56.1	6.6	18.2	7.1	2.1	7.9	24.6	11.4	26.0		
1997.4	1998年1月	25.4	53.3	5.5	21.1	8.1	2.3	6.9	23.7	13.0	21.4		
1998.1	1998年4月	21.3	49.5	5.2	20.3	8.0	0.3	7.0	22.4	11.5	17.5		
1998.2	1998年7月	22.5	58.9	5.1	16.1	4.0	1.4	6.5	22.3	11.5	20.3		
1998.3	1998年10月	18.0	57.4	8.9	19.5	3.6	1.9	5.3	22.8	10.6	25.1		
1998.4	1999年1月	24.0	58.4	7.0	19.8	3.3	1.2	6.4	21.6	9.7	22.5		
1999.1	1999年4月	15.7	70.6	4.9	13.0	4.5	0.7	3.8	23.8	10.5	25.5		
1999.2	1999年7月	13.2	71.4	5.0	11.0	3.8	0.6	3.5	23.3	11.0	31.1		
1999.3	1999年10月	16.0	65.7	6.3	14.8	5.2	1.8	5.5	23.6	7.4	24.0		
1999.4	2000年1月	18.0	60.6	4.4	18.6	3.5	2.0	4.7	24.6	9.8	25.2		
2000.1	2000年4月	18.4	63.1	6.1	15.2	3.7	2.0	5.3	22.1	8.6	26.6		
2000.2	2000年7月	16.9	55.1	7.4	18.9	6.8	3.4	10.1	25.0	12.2	21.6		
2000.3	2000年10月	14.8	49.6	9.4	22.2	8.6	3.0	10.2	25.2	10.9	22.6		
2000.4	2001年1月	23.0	53.6	7.9	23.0	7.1	4.4	8.7	23.0	13.9	23.4		
2001.1	2001年4月	17.0	55.8	6.2	19.0	3.5	1.9	8.1	29.8	11.6	32.2		

续表

季度	调查 时间	无 制 约	需 求 不 足	劳 动 力 短 缺	高 素 质 劳 动 力 短 缺	原材料、零部件供给不足				产 能 不 足	财 务 问 题	不 清 楚 的 经 济 管 制	不 确 定 的 经 济 环 境
						国 内 来 源	进 口	从 卢 布 区 进 口	从 美 元 区 进 口				
2001.2	2001年7月	12.1	61.7	6.6	19.1	3.9	2.3	5.5	26.6	13.7	31.6		
2001.3	2001年10月	15.7	64.3	5.5	18.4	6.3	1.2	4.3	24.7	8.2	33.3		
2001.4	2002年1月	14.8	67.0	3.5	15.7	2.6	1.7	2.2	23.0	10.4	30.4		
2002.1	2002年4月	16.1	64.8	3.0	16.6	4.0	1.5	2.5	21.1	8.0	26.1		
2002.2	2002年7月	14.3	67.9	6.3	16.0	3.8	2.5	5.1	23.6	3.4	27.0		
2002.3	2002年10月	16.3	66.1	4.0	20.3	4.0	2.6	5.7	18.5	7.9	25.0		
2002.4	2003年1月	12.2	68.3	3.6	14.5	3.6	1.8	3.6	14.5	9.0	29.9		
2003.1	2003年4月	12.4	70.3	3.2	15.1	4.3	2.2	2.2	21.6	4.9	30.3		
2003.2	2003年7月	8.7	66.9	4.9	12.5	4.2	1.0	7.0	24.0	11.5	37.6		
2003.3	2003年10月	11.7	59.9	7.8	20.8	7.2	3.3	6.8	25.4	17.9	38.1		
2003.4	2004年1月	9.3	64.0	5.4	17.8	5.0	3.9	4.7	23.6	15.9	43.8		
2004.1	2004年4月	16.0	58.0	6.1	16.7	7.9	3.9	5.3	26.8	13.6	37.7		
2004.2	2004年7月	14.0	54.0	7.1	19.9	11.2	6.2	8.3	25.7	11.6	34.4		
2004.3	2004年10月	13.0	59.8	7.0	24.0	9.2	4.4	6.3	28.4	9.2	33.9		
2004.4	2005年1月	9.1	59.6	7.7	19.7	7.2	4.3	5.3	26.4	15.4	34.6		
2005.1	2005年4月	8.8	65.4	3.2	19.3	4.6	1.8	7.8	27.2	12.9	36.4		
2005.2	2005年7月	8.5	69.7	3.8	23.7	6.6	2.4	5.7	25.6	18.0	37.0		
2005.3	2005年10月	10.9	61.7	7.1	22.4	6.6	3.3	8.2	29.0	16.4	37.2		
2005.4	2006年1月	10.3	60.9	3.3	26.6	4.3	3.8	7.6	28.3	14.7	33.7		
2006.1	2006年4月	12.6	56.5	6.8	26.2	4.7	4.2	8.9	24.1	12.0	34.0		
2006.2	2006年7月	11.7	53.2	8.3	30.2	4.9	5.9	8.3	19.0	21.5	46.3		
2006.3	2006年10月	10.4	52.0	10.4	30.2	9.4	6.9	8.4	23.8	21.3	48.5		
2006.4	2007年1月	9.6	47.8	10.1	30.3	8.4	5.1	9.0	25.3	19.7	44.9		
2007.1	2007年4月	13.9	50.3	11.9	29.1	6.0	6.0	11.3	21.9	15.9	36.4		
2007.2	2007年7月	7.3	47.6	9.8	32.7	7.8	3.9	8.3	32.7	26.3	53.2		
2007.3	2007年10月	6.0	56.0	7.5	41.8	5.2	2.2	9.7	29.9	26.1	57.9		
2007.4	2008年1月	8.5	56.8	9.0	36.2	8.5	2.5	7.5	28.1	30.2	48.2		
2008.1	2008年4月	5.3	50.6	8.4	41.6	7.4	4.7	4.7	31.1	27.9	55.3		
2008.2	2008年7月	10.3	49.7	10.8	38.5	5.1	4.6	9.2	27.7	27.2	54.4		
2008.3	2008年10月	3.7	69.4	4.5	20.8	4.2	1.5	3.8	40.0	29.4	66.4		

续表

季度	调查时间	无制约	需求不足	劳动力短缺	高素质劳动力短缺	原材料、零部件供给不足					不清楚的经济管制	不确定的经济环境	
						国内来源	进口	从卢布区进口	从美元区进口	产能不足			财务问题
2008.4	2009年1月	4.5	75.0	2.3	14.0	4.2	1.9	1.1	40.5	35.6	65.9		
2009.1	2009年4月	3.9	78.6	0.9	12.7	4.3	2.2	2.2	39.7	62.4			
2009.2	2009年7月	4.7	76.3	1.4	13.0	4.7	1.4	1.9	39.1	30.7	58.6		
2009.3	2009年10月	4.5	76.8	2.3	11.4	2.3	0.8	3.8	36.4	28.0	64.4		
2009.4	2010年1月	8.0	79.1	1.0	13.9	2.0	0.9	2.5	37.3	30.4	58.9		
2010.1	2010年4月	5.4	78.4	2.7	9.9	3.3	1.6	2.7	39.6	26.1	52.3		

注：受访者接受的问题是，“您的企业的生产遇到的最大制约因素是什么？”有几种答案可供选择，参见表格的表头。表中的数据显示的是答案所占的相对比例（全体受访者=100）。

资料来源：Direct communication by Kopint - Tárki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Market Research.)。前文的图5是本表的图示。

## 参考文献

Aghion, Philippe - Howitt, Peter P. (1998):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MIT Press, Cambridge MA.

Akerlof, George A. - Shiller, Robert J. (2009):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Allain, Olivier - Canry, Nicolas (2008): *Growth, Capital Scrapping, and the Rate of Capacity Utilisation*. Working Paper. 12th Conference of the Research Network,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erlin.

Antal László (1980): *Fejlődés kitérővel. A magyar gazdasági mechanizmus a 70 - es években. (Development with a Detour. The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in the 1970s.)* *Gazdaság*, Vol. 14. No. 2. pp. 28 - 56.

Arthur, William Brian (1994):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Artus, Patrick (2009): *China: The Vicious Circle of Excess Capacity*. Natixis, Economic Research.

Atkin, David J. - Lau, Tuen - Yu - Lin, Carolyn A. (2006): *Still on hol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ompetitive Implications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 on its 10th Year*

Anniversary.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Vol. 30. No. 2. pp. 80 – 95.

Ball, Laurence – Mankiw, Gregory N. (1995): *A Sticky – Price Manifesto*. NBER Working Papers, 467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artelsman, Eric J. – Haltiwanger, John – Scarpetta, Stefano (2004): *Microeconomic Evidence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in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enassy, Jean – Pascal (1982): *The Economics of Market Disequilibrium*.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Bhaduri, Amit (2007):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Innovations*. Routledge, London – New York.

Bils, Mark – Klenow, Peter J. (2004): *Some Evidence on the Importance of Sticky Pri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2. No. 5. pp. 947 – 985.

Blanchard, Olivier – Gali, Jordi (2007): *Real Wage Rigidities and the New Keynesian Model*.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9. pp. 35 – 65.

Blinder, Alan S. – Canetti, Elie R. – Lebow, David E. – Rudd, Jeremy B. (1998): *Asking about Prices: A New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Price Stickines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

Brabant von, Jozef M. (1990): *Socialist Economics: The Disequilibrium School and the Shortage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4. No. 2. pp. 157 – 175.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0): *Job Openings and Labor Turnover Survey (JOLT)*. [www.bls.gov/jlt/#data](http://www.bls.gov/jlt/#data) (downloaded: 11. 10. 2010. ) .

Chamberlin, Edward H. (1962) [1933]: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Chantrill, Christopher (2010): *US Government Spending*. <http://www.usgovernmentsspending.com/numbers#usgs302> (downloaded: 30. 11. 2010. ) .

Chikón Attila (1984): *A vállalati készletezési politika. (Inventory Policy of Enterprises.)*.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Budapest.

Chopra, Sunil – Meindl, Peter (2003):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J.

Clavel, Laurent – Minodier, Christelle (2009): *A Monthly Indicator of the French Business Climate*. INSEE, Paris, [http://www.insee.fr/fr/publications-et-services/docs\\_doc\\_travail/G2009-02.pdf](http://www.insee.fr/fr/publications-et-services/docs_doc_travail/G2009-02.pdf) (downloaded: 12. 01. 2011. ) .

Clower, Robert W. (1965): *The Keynesian Counter – Revolution: A Theoretical Appraisal*. In: Hahn, Frank H. – Brechling, P. R. (eds.): *The Theory of Interest Rates*. Macmillan, London, pp. 103 – 125.

Clower, Robert W. (1967):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onetary Theo-*

ry.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6. No. 1. pp. 1 – 8.

Corrado, Carol és Joe Matthey (1997): Capacity Uti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1): pp. 151 – 167.

Corrado, Carol és Joe Matthey (1997): Capacity Uti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1): pp. 151 – 167.

Coutts, David A. 2010. Darwin's Views on Malthus. [http://members.optusnet.com.au/exponentialist/Darwin\\_Malthus.htm](http://members.optusnet.com.au/exponentialist/Darwin_Malthus.htm) (downloaded: 03. 12. 2010. ) .

Cowan, Robin – Rizzo, Mario J. (1996): The Genetic – Causal Tradition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 *Kyklos*, Vol. 49. No. 3. pp. 273 – 317.

Crotty, James (2001):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urrent Capitalism: A Keynes – Marx – Schumpeter Analysis. <http://people.umass.edu/crotty/india-rev-May25.pdf> (downloaded: 01. 12. 2010. ) .

Crotty, James (2002): Why There is Chronic Excess Capacity. *Challenge*, Vol. 45. No. 6. pp. 21 – 44.

CS Ad Dataset (2007): US Internet (online) advertising expenditure in millions of U. S. dollars. <http://www.galbithink.org/cs-ad-dataset.xls>, (downloaded: 01. 12. 2010. ) .

Davis, Christopher – Charemza, Wojcieh W. (eds.) (1989): *Models of Disequilibrium and Shortage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Chapman and Hall, London.

Dentsu (2009): Advertising Expenditures in Japan 1999 – 2009. <http://www.dentsu.com/marketing/index.html> (downloaded: 01. 12. 2010. ) .

Diamond, Peter A. (1982): Aggregate Demand Management in Search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0. No. 5. pp. 881 – 894.

Djankov, Simeon – Murrell, Peter (2002):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Transition: A Quantitative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0. No. 3. pp. 739 – 792.

Domar, Evsey D. (1989): The Blind Man and the Elephant: An Essay on Isms. In: Evsey D. Domar (ed.):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Serf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 29 – 46.

Erkel – Rouse, Helene – Minodier, Christelle (2009): Do Business Tendency Surveys in Industry and Services Help in Forecasting GDP Growth? A Real – Time Analysis on French Dat. INSEE, Paris, [http://insee.fr/fr/publications-et-services/docs\\_doc\\_travail/G2009-03.pdf](http://insee.fr/fr/publications-et-services/docs_doc_travail/G2009-03.pdf) (downloaded: 12. 01. 2011. ) .

Etter, Richard – Graff, Michael – Müller, Jürg (2008): Is 'Normal' Capacity Utilisation Constant Over Time? Analyses with Micro and Macro. Data from Business Tendency Surveys. ETH Zurich, KOF Swiss Economic Institute, Zürich, [http://www.cesifogroup.de/portal/page/portal/ifoContent/N/event/Conferences/conf\\_nd/2008-11-20-Third-Workshop-MacroeconomicsandBusinessCycle/work-makro3-graff-m.pdf](http://www.cesifogroup.de/portal/page/portal/ifoContent/N/event/Conferences/conf_nd/2008-11-20-Third-Workshop-MacroeconomicsandBusinessCycle/work-makro3-graff-m.pdf) (downloaded: 01. 12. 2010. ) .

Federal Reserve (2009):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http://>



[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17/Current/default.htm](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17/Current/default.htm) (downloaded: 01.12.2010.) .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2010): 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http://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series/GDPA?cid=106> (downloaded: 03.12.2010.) .

Federal Reserve Statistical Release (2010):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17/current/table11.htm> and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17/current/table12.htm> (downloaded: 01.12.2010.) .

Flaschel, Peter (2009): *The Macrodynamics of Capitalism: Elements for a Synthesis of Marx, Keynes and Schumpeter*. Springer, Heidelberg.

Francas, David – Kremer, Mirko – Minner, Stefan – Friese, Markus (2009): Strategic process flexibility under lifecycle dem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Vol. 121. No. 2. pp. 427 – 440.

Freedom House (2010):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0 Survey Release*. [www.freedomhouse.org](http://www.freedomhouse.org) (downloaded: 03.12.2010.) .

Friedman, Milton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8. No. 1. pp. 1 – 17.

Galbraith, John K. (1952):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Galbraith, John K. (1958): *The Affluent Society*.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Grover, Varun – Lebeau, Jon (1996): U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in Transition.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Vol. 13. No. 4. pp. 213 – 231.

Haugh, David – Mourougane, Annabelle – Chatal, Olivier (2010):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and Beyond the Crisi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745.

Hayek, Friedrich (1948): The Meaning of Competition. In: Hayek, Friedrich (ed.) .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London, pp. 92 – 106.

Heilbroner, Robert L. (1986):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Marx, Keynes and Schumpeter. In: Helburn, Susanne W. – Bramhall David F. (eds.) : *Marx, Schumpeter, Keynes*. ME Sharpe, Armonk, NY, pp. 13 – 25.

Helburn, Suzanne W. – Bramhall, David F. (eds.) . (1986): *Marx, Schumpeter, Keynes & A Centenary Celebration of Dissent*. ME Sharpe, Armonk, NY.

Helpman, Elhanan – Krugman, Paul R. (1985):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Hodgson, Geoffrey M. (1993):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s*. Polity Press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MI – Cambridge, UK. <http://>

www.timesonline.co.uk (downloaded: 04. 11. 2010. ) .

ILO (2010):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r Market. EAPEP Databas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Genf.

IMF (2010):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ww.imfstatistics.org/imf/, (downloaded: 03. 12. 2010. ) .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2006): World Telecommunication/ICT Development Report: Measuring,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enf, pp. 104 – 112.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2007): Telecommunication Indicators. Telephones, Cellular Phones, and Computers by Country; 2006. [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cats/international\\_statistics/telecommunications\\_computers.html](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cats/international_statistics/telecommunications_computers.html) (downloaded: 03. 12. 2010. ) .

Jones, Lamar B. (1989): Schumpeter versus Darwin: In re Malthu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56. No. 2. pp. 410 – 422.

Kahneman, Daniel – Tversky, Amos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 47. No. 2. pp. 263 – 291.

Kahneman, Daniel – Tversky, Amos (1991): Loss Aversion in Riskless Choice: A Reference – Dependent Mode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6. No. 4. pp. 1039 – 1061.

Kaldor, Nicholas (1972): The Irrelevance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 Vol. 82. No. 328. pp. 1237 – 1255.

Kaldor, Nicholas (1981): The Rol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echnical Progress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 *Economie Appliquee*, Vol. 34. No. 6. 593 – 617. o.

Kapitány Zsuzsa (2010): Számítások a szocialista gazdaságok 1989 előtti autóhiányáról. (Calculations on car shortage in Eastern Europe before 1989. ) Manuscript.

Keynes, John M. (1967)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London.

King, John L. – West, Joel (2002): Ma Bell's Orphan: US Cellular Telephony, 1947 – 1996.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Vol. 26. No. 3 – 4. pp. 189 – 203.

Kirman, Alan (1992): Whom or What does the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 Repres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6. No. 2. pp. 117 – 136.

Kirzner, Israel M. (1973):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London.

Kirzner, Israel M. (1985): *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pp. 119 – 149.

Kornai János (1994) [1959]: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Kornai János (1971): *Anti – Equilibrium*. North\_Holland, Amsterdam.

Kornai János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North – Holland, Amsterdam.

Kornai János (1982): *Growth, Shortage and Efficiency*. Basil Blackwell and Berkeley, Oxford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s Angeles.

Kornai Já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Kornai János (2006): *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Massachusetts, Cambridge and The MIT Press, London Kornai János (2008):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Budapest.

Kornai János (2009): Marx through the eyes of an East European intellectual. *Social Research*, Vol. 76. No. 3; pp. 965 – 986.

Kornai János (2010a): Innovation and Dynamism; Interaction between Systems and Technical Progres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18. No. 4; pp. 629 – 670.

Kornai János (2010b): Hiánygazdaság – Többletgazdaság. (Shortage Economy – Surplus Economy.) *Közgazdasági Szemle*, Vol. 57. No. 11 – 12. pp. 925 – 957, 1021 – 1044.

Kornai János – Eggleston, Karen (2001): *Welfare, Choice and Solidarity in Transition; Reforming the Health Sector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Kornai János – Martos Béla (1971): *Gazdasági rendszerek vegetatív működése. (Autonomous Control of Economic Systems.)* *Sigma*, Vol. 4. No. 1 – 2. pp. 35 – 50.

Kornai János – Martos Béla (eds.) (1981): *Non – Price Control*. North-Holland, Amsterdam.

Kornai János – Maskin, Eric – Roland, Gérard (2003): 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1. No. 4; pp. 1095 – 1136.

Kornai János – Rose – Ackerman, Susan (eds.) (2004): *Building a Trustworthy State in Post – Socialist Trans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Kornai János – Rothstein, Bo – Rose – Ackerman, Susan (eds.) (2004): *Creating Social Trust in Post – Socialist Trans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KPMG (2009): *Momentum; KPMG's Global Auto Executive Survey 2009*. <http://www.kpmg.com/Global/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Momentum/Documents/Momentum – AutoExec – 2009.pdf> (downloaded: 17. 12. 2010.)

KSH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Hungarian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2010): *Data o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http://portal.ksh.hu/portal/page?\\_pageid=38,599806&\\_dad=portal&\\_schema=PORTAL](http://portal.ksh.hu/portal/page?_pageid=38,599806&_dad=portal&_schema=PORTAL) (downloaded: 12. 11. 2010.)

Lachmann, Ludwig M. (1976): From Mises to Shackle; An Essay on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Laissez-faire Socie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4. No. 1. pp. 54 – 62.

Latvijas Statistika (2010): *Popul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Indicators*. <http://www.esb.gov.lv/node/30604> (downloaded: 14. 12. 2010.)

Lavoie, Don (1985):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

bridge.

Layard, Richard – Nickel, Stephen – Jackman, Richard (1991): *Unemploy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Lee, Frederic S. (1998): *Post Keynesian Price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ijonhufvud, Axel (1968): *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Leijonhufvud, Axel (1973): *Effective Demand Failures*.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y*, Vol. 75. No. 1. pp. 27 – 48.

Leijonhufvud, Axel (2009): *Out of the Corridor: Keynes and the Crisi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3. No. 4. pp. 741 – 757.

Malinvaud, Edmond (1977):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Reconsidered*. Blackwell, Oxford.

Mankiw, Gregory N. (1985): *Small Menu Costs and Large Business Cycles: A Macroeconomic Model of Monopol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0. No. 2. pp. 529 – 538.

Mann, Thomas (1987) [1954]. *Versuch über Tschechow*. In: *Meine Zeit – Essays 1945 – 1955*. Frankfurt a. M. : S. D Fischer.

Marx, Karl. (1978) [1967 – 94]: *Capital*. Volume 1. Penguin, London.

McGraw, A. Peter – Larsen, Jeff T. – Kahneman, Daniel – Schkade, David (2010): *Comparing gains and los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pp. 1438 – 1445.

Milgrom, Paul – Roberts, John (1992): *Economic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Prentice Hall, NJ.

Milward, Alan S. (1979):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 – 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Morin, Norman – Stevens, John J. (2004): *Diverging Measures of Capacity Utilization: An Explanation*. Working Paper. Federal Reserve Board,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Washington, D. C. : pp. 3 – 4

Nelson, Richard R. – Winter, Sidney G.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Nilsson, Ronny (2001): *Harmonization of Business and Consumer Tendency Surveys World – Wide*. OECD, Paris.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North, Douglass C. (1991): *Institution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5. No. 1. pp. 97 – 112.

OECD (2003): *Business Tendency Surveys: A Handbook*. <http://www.oecd.org/dataoecd/29/61/31837055.pdf> (downloaded: 12. 12. 2010. ) .

OECD (2009): Responding to the Economic Crisis: Foster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Renewal. OECD.

OECD (2010):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and Job Vacancies.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MEI\\_LAB\\_REG1](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MEI_LAB_REG1) (downloaded: 14. 12. 2010) .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0, Job vacancies – ONS Vacancy Survey <http://www.statistics.gov.uk/STATBASE/Product.asp?vlnk=9390> (downloaded: 13. 10. 2010) .

Olson, Mancur (1963): The Economics of Wartime Shortage.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NC.

Orsato, Renato J. – Wells, Peter (2006): U – turn: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 15. No. 11/12. pp. 994 – 1006.

Phelps, Edmund S. (1968): Money – Wage Dynamics and Labor – 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6. No. 4/2. pp. 678 – 711.

Phelps, Edmund S. – Archibald, George C. – Alchian, Armen A. (1970):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 Norton, New York.

Pissarides, Christopher A. (2000):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Theory*. MIT Press, CambridgeMA.

Portes, Richard – Quandt, Richard E. – Winter, David – Yeo, Stephen (1987): Macroeconomic Planning and Disequilibrium: Estimates for Poland, 1955 – 1980. *Econometrica*, Vol. 55. No. 1. pp. 19 – 41.

Portes, Richard – Winter, David (1980): Disequilibrium Estimates for Consumption Goods Market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7. No. 146. pp. 137 – 159.

Prékopa András (1995): *Stochastic Programming*. Kluwer, Budapest.

Ramey, Valerie A. – West, Kenneth D. (1999): Inventories. In: Taylor, John B. – Woodford, Michael (eds.):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1. kötet, Elsevier, Amsterdam, 863 – 923 o.

Relman, Arnold (2010): *Health Care: The Disquieting Trut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7. No. 14. pp. 45 – 48.

Robinson, Joan V. (1969) [1933]: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Macmillan, London.

Samuelson, Paul A. (1980 [1948]): *Economics*. McGraw – Hill. New York – London.

Schumpeter, Joseph A. (1939): *Business Cycles*. McGraw Hill, New York – London.

Schumpeter, Joseph A.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Schumpeter, Joseph A. (1968) [1912]: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Business Cyc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Schumpeter, Joseph A. (2010)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Democracy*. Routledge,

Milton Park.

Scitovsky Tibor (1985): Pricetakers' Plenty: A Neglected Benefit of Capitalism. *Kyklos*, Vol. 38. No. 4. pp. 517 – 536.

Shapiro, Carl – Stiglitz, Joseph E. (1984):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4. No. 3. pp. 433 – 444.

Siciliani, Luigi – Verzulli, Rossella (2009): Waiting Time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mong Elderly Europeans: Evidence from SHARE. *Health Economics*, Vol. 18. No. 11. pp. 1295 – 1306.

Statistikos Departamentas (2010):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atistics. <http://www.stat.gov.lt/en/pages/view/?id=2326> (downloaded: 14. 12. 2010. ) .

Stiglitz, Joseph E. Sen, Amartya Fitoussi, Jean – Paul (2009),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http://www.stiglitz-sen-fitoussi.fr/documents/rapport\\_anglais](http://www.stiglitz-sen-fitoussi.fr/documents/rapport_anglais) (downloaded: 28. 02. 2010. )

Toomey, John W (2000): *Inventory Management: Principles,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Kluwer, Norwell, MA.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0): The 2010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http://www.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2010](http://www.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2010) (downloaded: 03. 12. 2010. ) .

U. S. Census Bureau (2010): Vacancy R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965 to 2010. [www.census.gov/hhes/www/housing/hvs/qtr210/files/tab1.xls](http://www.census.gov/hhes/www/housing/hvs/qtr210/files/tab1.xls) (downloaded: 15. 12. 2010. ) .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09): Fixed telephone lines per 100 inhabitants. <http://data.un.org/Data.aspx?q=telephone&d=ITU&f=ind1Code%3a91> (downloaded: 03. 12. 2010. ) .

Veblen, Thorstein B. (1898): 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 No. 4. pp. 373 – 397.

Veblen, Thorstein B. (1975) [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Macmillan, New York and London.

Weitzman, Martin (2000): On Buyers' and Sellers' Market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In: Maskin, Eric – Simonovits András (eds.): *Planning, Shortage, and Transformation*, MIT Press, Cambridge, MA, pp. 127 – 140.

Wikipédia (2010) Economic Shortage. <https://secure.wikimedia.org/wikipedia/en/wiki/Shortage> (downloaded: 03. 12. 2010. ) .

World Bank (2010):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Step=2&id=4&DisplayAggregation=N&SdmxSupported=Y&CNO=2&SET\\_BRANDING=YES](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Step=2&id=4&DisplayAggregation=N&SdmxSupported=Y&CNO=2&SET_BRANDING=YES), (downloaded: 12. 11. 2010. ) .